

李浴日著

國父革命我理

之研究  
于右任



## 邹序

国父于学孜孜不倦，于书无所不窥，尝有问 国父究治何种学问者， 国父语之曰：「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学也。凡一切学问，苟有以助余革命智识及能力者，余皆以为研究之资料，俾以组成余革命之学也。」 国父于学勤博如此，自立体系如此，故不论何种学说，皆能取其精而用其宏，咀其华而含其英，融汇之，贯通之，今读遗教，无所不包，靡学不具，治遗教者，各以其所治而求之，莫不各有所得，如入百宝库藏者，必能恣其所悦而怀宝以归，绝无求而不获者也。李君浴日夙治兵学，见解独到，近取 国父有关兵学遗教，著《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一书，将 国父各种战争理论，分别阐述，其研究可谓勤而有获者矣。夫革命者，应乎夫，顺乎人，而革故鼎新之大业也。质言之，用生存战、政治战、经济战以蕲战胜敌人，而达到平等、自由、和平，以竟革命之全功也。国父之生存战，以民族主义为武器；政治战，以民权主义为武器；经济战，以民生主义为武器。犹忆民国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在广州欢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时，讲演「主义战胜敌人」，即以此训示党员。复申言：「有此主义为武器，又必须坚信其可以获致胜利。革命鬪士，有此信念，乃能一以当百，如黄花岗、镇南关、武昌、河口各役，迭次起义，类皆以少敌众，莫不以几十人或几百人败清兵数万，为兵家之所咋舌称奇也。」昔皇甫肱曰：「太公论将，曰勇智仁信忠；孙子论将曰智信仁勇严。」太公以勇为首，孙子以智为先，诚以勇非智无以成，智非勇无以行。 国父则以智勇均为革命军人所必备，又以实行三民主义为革命军人之仁，故能以

少敌众，以寡胜多，实比姜太公与孙子为进步。李君此书，首言国父战争思想，次言战时政治经济宣传诸端，并以精神力为决胜之本，是已深得 国父革命战理之真蹄，于目前加强反共抗俄之贡献，尤不鲜也。

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六月十日 邹 鲁序于台北

## 自序

「当今之世，能战则存，不能战则亡。」这是 国父的名言。国父又说：「拿历史来证明，从前宋朝怎样亡国呢？是由于崖门一战，便亡于元朝。明朝是怎样亡国呢？是由于扬州一战，便亡于清朝。拿外国来看，华铁路一战，拿破仑第一之帝国便亡。斯丹一战，拿破仑第三之帝国便亡。」这些胜败存亡之事理，大家在今日总可彻底了解吧！

蒋百里先生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这是指出我民族国家五千年来强弱兴亡的症结所在，到了今日，大家还不觉醒吗？

所以我们在今日不要害怕战争，更不必讳谈战争，我们要习惯战争，参加战争，更要把我们正确的战争理论建立起来。

伟大的反共抗俄战争，是一个长期的战争，也是一个新型的战争，最忌空谈，尤忌盲动。它要有理论的基础，更要有正确的理论来做行动的指针。这便是我今日出版这本书的动机。

国父战争理论是中国历史的产物，是由研究到实践的结论，博大精深，阐扬匪易，尤其散见于全部遗教之中，未成体系，整理确要相当时间。记得民国三十一年，我基于研究《孙子兵法》的启示，及创办「世界兵学」杂志的机会，在韶关一个山岗上或作或辍，费时一年，并经博访周谘，写成本书的前身《中山战争论》，出版之后，曾承中宣部嘉奖。胜利还都，由某出版社印行，校对不精，错误惊人。现以时代的需要，爰将修正补充，并配合反共抗

俄，易名《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适为俗物困扰，未能尽量发挥。校对时，虽欲增添，已受限制。至于体系的构成，数据的处理，几经考虑，不知绞尽了多少脑汁。

对 国父革命战理作有系统的研究，尚无第二部著作。我不敢说本书已臻于完善，不过读者于本书里，对 国父战争思想的正确，国防计划之宏伟，战时政治经济宣传的重视，还有：建军方略，精神重于物质，对外抗战应采取的战略，以寡击众的非常战术，以及 国父怎样成为一个大军事家，知难行易在军事上的价值等等，自可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由认识进而实践，亦即说我们能够切实遵照 国父这套最明智而正确的战理来反共抗俄，必可争取最后的胜利，且可缩短胜利的时间。

于先生右任为中国现代文武兼全的人物，亦即「中山型」的人物，本书此次出版，作者晋谒于其寓邸，承赐鼓励，并亲题封面。邹先生海滨追随 国父多年，功高党国，著述等身，忆前写《中山战争论》时，在渝迭荷指示，此次又承赐序，均使本书增色不少，感激之余，谨此志谢。

又，本书此次出版，慎重再三，各章均分别敦请友好评阅一过，并承指正，感激无既。为求完善起见，谨以至诚希望读者赐予教正和批评，以便他日重订。抛砖引玉，尤所企望。

李 浴 日 民国四十一年七月一日序与台北

## 一、绪言——国父确是一个大军事家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国国民党的手创者，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建设者——国父孙中山先生，向来一般人都一致推崇他为现代中国一个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却很少认识他也是一个大军事家，在遗教中建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战争理论。这个整理和阐扬的任务，正待我们今日来把它完成。

国父一生虽没有机会进过军事学校，却常和军事专家研究军事，并自修古今中外的兵书，尤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在西医学校时代科学修养的精湛，更助他成为一个大军事家的所在。国父原是爱好和平的，但为完成国民革命，不得不采用战争手段，亦即「革命的手段」，一个健全的革命领袖固要擅长政治，亦须兼长军事。退一步说，纵不一定要有用兵的天才，起码亦需懂得军事。

现在我们研究国父的革命战理，首先应知道国父研究军事及指挥军队的经过实情，因为这是国父成为一个大军事家的所在，亦即国父战争理论的渊源。

### 一、国父研究军事的经过

根据我们的考证：国父的研究军事应溯源于太平天国灭亡后十年，国父十一岁在村塾读书时，村中有一个太平天国的遗兵，常到塾里为学童讲述洪杨革命的故事，国父听得，深慕洪秀全之为人，推翻满清之志，不禁油然而生，遗兵对国父特加爱许，一遇无事，便和国父详谈当年战事，如洪秀全怎样起义，怎样从广西打到湖南，打到武汉和南京等等。并以洪秀全第二勉国父，国父得此徽号，引为无上荣耀，亦辄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国父自决心致力革命之后，对于军事学术即特别留意，一八八七年（丁亥）入香港西医书院研习医学，常置巨幅中国地图于楼壁，对之而筹思攻守之方。此为兵要地理研究的开始。又与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昕夕往还，亦常研究军事问题。一八九四年（甲午）北上上李鸿章书，并「游东北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自传》）此为政治军事的实际考察。

一九〇三年（癸卯）夏，国父由安南东渡日本，致力外交活动，结识日野熊藏少佐，日野留英多年，为日本军事专家，以研究南非洲波亚人（注一）抵抗英军所采用的散兵战术，及发明日本式盒子炮，闻名于时。国父认此种战术最适用于揭竿起义的中国革命军，乃与日野研究，除笔记其口述外，并购置英文的英波战史及图书百数十卷，日夕观摩，孜孜不倦。同时为实施同志以军事训练，又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延聘日野为校长。小室健次郎大尉为助教，学科除普通兵学及制造盆子炮炸药外，尤注重波亚人散兵战术的传授。第一期学生共十四人，开课之日，国父亲临致训，听者深受感动。至于国父当时为推翻满清，在粤桂边境及各地所组织的革命军或称「民军」，类似今日的游击队，战斗所用的战术，即是散兵战术（亦称「波亚战术」）。往后国父于民元发表「钱币革命通电」，曾暗示采用散兵战术以抵抗帝俄。迄民十一于「军人精神教育」的讲词中又主张采用游勇战术（即散兵战术），以与北方军阀交战，可见国父对散兵战术的心得，及起义军事所受散兵战术的影响。

国父的学问博而精，对古今中外有用之书，无所不读，兵书尤为爱好。加以他的虚怀若谷，又常与外国军事专家，像上述的日野，便是其一。此外还有美国「天下最杰出军事家」堪马利将军（注二）、俄国嘉伦、李糜及英、德、法将校多人。

国父对普通军事书籍，如典范令及各种教程，莫不熟读。在《民权初步》的自序中曾提及《步兵操典》说：「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浏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军人精神教育》里亦提及游勇战术的伏击技能「与操典中所谓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对于外国军事名著更为爱读，据一位老同志最近给我的信说：「总理所读各国兵书，以德著英译为多。据言：军事学以德著为第一。」又说：「总理对外人用兵者最崇拜拿破仑，书架上满置各国名人关于拿翁之著作。癸卯年（民前九年）曾语人谓：拿翁韬略，百年后始大放光明，盖欧人研究拿翁战略之佳本，多出版于百年以后也。总理对拿翁每次战役，皆了如指掌，有条不紊，据言：诸役以攻奥一役为最神妙，于战史上最有价值。」

（注三）其对于我国古代各兵家兵法，亦有精湛研究，就中以《孙子兵法》为最。曾评该书说：「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民权主义第一讲）又对同志说过：「拿破仑的作战，深得孙子的蕴奥。」（注四）原来拿翁在欧陆作战，阵中常披阅法译《孙子兵法》。当对同志讲解太平天国战史及其它攻守之事，辄引孙子的原理原则来说明，有时并很详细地指出那原理原则见于《孙子兵法》中第几篇第几页第几行。（注五）



此外，国父于各种演讲中常喜以军事为喻，他说：「不像兵船操典，过了十年，便成无价值的废物。」（《民权主义》第五讲）又说：「譬如练兵打仗，便要用军事家。」（第六讲）又说：「亦犹之军人上阵战争，必须明白其枪炮之效力，及其用法。……譬之军人提枪射击，若命中，其人必死，否则亦伤。」（《军队战胜与党员奋斗》讲词）又说：「这次的大会（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浴日注）好像是一个大军事会议，定了种种作战计划，下了许多攻击命令，交各将领带回去实行作战一样。又好像是一个大兵工厂，制了许多枪炮，出了很多子弹，诸君在此领了很多枪炮子弹，回到本地地方去，便要分给到各位同志去补充他们，各位同志得了补充，便要他们实行攻击，不可空耗了这些补充，到了实行攻击的时候，必须审察敌情，临机应变，对于敌人要能够收效，那才算是枉费了这补充。」（「党员之奋斗同于军队之奋斗」讲词）于此，亦足见国父对于军事的兴趣与研究。

## 二、国父指挥军事的经过

国父致力革命，认为欲扫除革命的障碍，不是单采取和平手段所可完全奏效，必须假以军政时期，断然采取战争的手投。在历史上，像我国的汤武革命，美国的独立运动，法国和俄国的大革命。

国父于一八八五年（乙酉）中法战争结束之时，即决意致力于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正如自传所述：「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以医术为入世之媒。」而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以图推翻满清，系肇端于一八九五（乙未）广州之役（第一次起义）。如《自传》说：「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干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

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为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予则通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之第一人。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补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帅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因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出至香港。」这一役，国父是在广州亲自指挥的，这是他第一次指挥军事的光荣记录，虽不幸失败，国父的英勇已可概见。

自此而后，国父更积极地策划军事的进行，由他直接发动同志起义的，有一九〇〇年（庚子）惠州之役（第二次起义），一九〇七年（丁未）潮州黄冈之役（第三次起义），惠州七女湖之役（第四次起义），钦廉之役（第五次起义），镇南关之役（第六次起义），及一九〇八年（戊申）钦上思之役（第七次起义），云南河口之役（第八次起义），就中惠州之役，国父由日本到台北，（按 国父到台北共有两次，此为第一次，尚有一次在民国二年），亲自策划，一面令郑士良在惠州起义，一面就地加聘军官备用，依 国父的计划，惠州的革命军要沿着海岸向东推进，以厦门为目标，国父则由台渡海，亲临督战。旋因日本政变，计划遂遭破坏，但台湾在中国革命史上已写上光荣一页。钦廉之役，国父派王和顺率领二百余人破清兵于王光山，当时安南的法文报纸曾论此役说：「此次革命革，不知用何战术，能一战而去清兵四分之

一，可称奇捷。」尤以镇南关之役，国父亲临督战，以一当十，更表现了革命统帅的英勇和伟大。

镇南关是桂省南部的一个要隘，向有「第二旅顺口」之称，这一役可以称为小规模的要塞战。国父当时欲夺取镇南关，以壮革命声势，乃派黄明堂于十月二十六日率领百余人袭取该关。当将所有镇中镇南镇北三座炮台完全克复。国父在河内接得捷报，兴奋异常，乃率同黄克强、胡汉民、胡毅生、及日本志士池亨吉（新闻记者）、法国退职炮兵上尉（佚名）等，于二十九日从河内搭乘火车直达同登站（距镇南关只有数里）下车步行抵关，时已入夜，当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防御计划，并指定何伍坐守镇南，李裕卿坐守镇中，自己与明堂、克强等坐守镇北，检查所俘战利品，为数无多，不足以增强我军的战斗力。而清军陆荣廷等却率二千余人浩浩荡荡地来围攻。国父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沉着指挥守军抵抗，又亲自督率法国炮兵上尉发炮，轰击敌阵，使敌人不敢仰攻。惜因众寡悬殊，未能由守势转为攻势，给敌人以包围歼灭。到第二天国父为遄返河内，筹款购械，以图大举，便偕同行者乘黑夜绕道下山。惟仍令明堂等继续抵抗，因粮尽弹绝，及活跃于十万大山的友军道远不能来援，一直抵抗到十一月四日，才突围而出。（注六）

可是，上述各战役，在军事上，虽然收效甚微，在政治上，却得到伟大的成功，震撼鞑虏的心胆，树立大汉的声威，造成革命的时势，促进全国各地的起义。然而国父愈挫愈勇，再接再厉，虽以清廷的严缉，远避海外，乃命国内同志到处发难，于是便有一九一〇年（庚戌）广州新军之役（第九次起义）及轰动全国的一九一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第十次起义），因而促成

是年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国父在海外闻讯，奔驰回国，各省代表于十一月十日齐集南京，选举国父为临时大总统，民元正月一日宣誓就职。这时清帝溥仪，仍负隅北京，国父毅然主张用武力澈底解决，积极进行北伐军事，每召集各军将领指示机宜，置地图于桌上，按图指示，如何进军，如何攻守，均合用兵原则，并强调革命军不怕武器的拙劣，只要攻击精神旺盛，便可以寡击众，百战百胜。起初一般将领以为国父没有进过军事专门学校，不懂军事，及至领略这一番训示后，大家都深深地佩服他兵学的精湛，尤佩服他那种审慎而虚心的指示态度，这是一位亲历其境的老军官告诉我的（注七）。至于决定的北伐计划：「现在用兵方略当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巢。」（「覆黎元洪指示北伐方略电」）这时由津浦路前进的北伐军，所向无前，连战皆捷，初次粤军姚雨平及苏军合败敌军张勋于固镇，敌方增援而来，战于南宿州，又为姚军及淮军陈干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张勋等只得放弃徐州，各路亦正谋分进合击，直捣幽燕。清廷见势危急，授权袁世凯议和，同时我方主和者亦居多数，遂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中止北伐军事。这是民国成立以来国父首次指挥军事的经过。

可是满清虽告推翻，而继满清之后的封建遗孽及反革命势力，却此仆彼起，变本加厉。国父目击心伤，认为职责所在，非重整旗鼓，继续讨逆不可。十余年间，由讨袁之役（民二及民四两

次），而护法之役（民六声讨冯国璋、段祺瑞），而讨莫荣新之役（民九），而讨陆荣廷之役（民十），而讨陈炯明之役（民十一至十三），而讨沈鸿英之役（民十二）及削平广州商团之变（民十三）等，就中除讨袁之役，避居日本，遥为指挥各省同志起兵讨伐之外，其它战役均以广州为根据地，就近指挥。在这个时期，国父于民六被选为海陆军大元帅，民十被选为非常大总统，每次均揽党政军的大权。民十二由沪重返广州主持讨陈，因各将领之推戴，又暂就陆海军大元帅职。可是国父原以贯彻护法、实现国家统一及完成国民革命为职志，自不能局促于南方一隅，亟宜兴师北向，铲除北洋军阀。因此国父先后在广州发动了两次北伐：第一次在民十一年，国父于民十以两广底定，亲至桂林，整理军队，准备于十一年春督师由桂取道湖南，大举讨伐非法总统徐世昌及直系军阀。不料，北伐军于是年初陆续出发到达湖南边境时，陈炯明竟在后方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既断绝北伐饷械的接济，且从而阻挠北伐军的前进。国父不得已，由桂班师返粤，罢免陈炯明职务，改道江西北伐，于是年五月六日亲临韶关誓师。这次作战计划：第一期夺取赣州，第二期夺取南昌九江，义师所指，节节胜利，经将赣州克复，北伐军前锋到达吉安泰和，但又因陈炯明在后方捣乱，嗾使部下围攻总统府，只得回师靖乱了。第二次在民十三，国父以曹琨、吴佩孚朋比为奸，毁法祸国，遂于九月率师重莅韶关，发表宣言，檄告天下，名正言顺，声威大震。旋以曹吴倒塌，及北方国民军领袖诸同志纷电入京共商国是，国父应召离粤北上，改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纠纷，遂中止北伐。

国父于讨贼各役中，以指挥讨伐陈逆之役，其沉着大胆，刚毅果断及机智，比之中外古今的名将，毫无逊色，洵为我国今后军人的楷模。却说 国父因陈炯明的阻挠北伐，由桂返粤，乃免其粤军总司令及省长兼内务总长等职，念其前劳，冀能悔过自新，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旋为利于北伐起见，复畀以办理两广军务，而陈却野心不死，竟愈演愈凶，于民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嗾使部下叶举围攻总统府，欲置国父于死地，实现其独霸广东的阴谋， 国父当时接得这个谋害的密报，在叛军的刀光剑影中，从容退入楚豫舰，转登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以为纪念），便造成「广州蒙难」的一幕，这和「伦敦蒙难」，同样的悲壮险绝，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两大奇迹。

国父登舰后，即召集各舰长商议应变戡乱的策略。这一役就海军作战说：假如海军力量强大的话，就应使陆战队单独登陆，占领据点，进击敌军。反之海军力量薄弱，不能单独登陆作战的话，就应发挥炮火协同陆上部队，夹击敌军。 国父当时因海军陆战队，力量很小，只得采取后一策略，一面令卫戍总司令魏邦平率所部集中大沙头，策应海军进攻陆上叛军，一面亲率坐舰永丰及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等舰，于十七日由黄埔出动，经车歪炮台驶入白鹅潭，炮击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等处叛军，各弹多中目标的，叛军闻声落胆，纷纷弃械逃遁，死于炮火之下者达数百人。惟因陆上部队，未能如期发动策应，炮击之后，叛军仍散而复聚，其乱未获平，然已足表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致本党同志书」）

国父见情况如此，遂率各舰驶回黄埔镇守，这时各舰舰长均主张舰队移往西江。国父却认为只有袭取车歪炮台，驶进白鹅潭，等候北伐军回师夹击，较为得计，旋于七月十日文亲率坐鉴及楚豫、豫章、广玉、宝璧等舰，从海心冈驶往三江口，向车歪炮台轰击，叛军亦发炮还击，一时炮声震天，双方均有损失，各舰舰长目击叛军炮火占优势，畏缩不敢前进，国父以身作则，令座舰驶于先头，一致攻击前进。而叛军在该炮台两岸布置野炮有二营之多，一见舰队驶近，便构成交叉火网，实施封锁射击，歼灭射击，弹如雨下，各舰均受微伤，坐舰连中六弹，官兵死伤十余人，国父一面指挥各舰作战，一面观书舱内，雍容镇定，大有古代儒将之风。正如国父说：「此役也，以兵舰数艘，处叛军四集环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进至省河，以慑叛军之胆，而壮义士之气，中外观听，亦为之耸。」（「致本党同志书」）国父在白鹅潭，一直支持到八月九日，见李烈钧、许崇智等北伐军回师讨逆的失利，认为孤守省河，于事无济，方离粤赴沪，再图讨伐。于此，值得大书特书的，当坐舰寄碇白鹅潭时，陈逆曾运动海军发动叛变，以威胁国父，施放水雷鱼雷，以谋害国父，遣派飞机，盘旋于坐舰之上，以恐吓国父，又用民船钢板小轮及敢死队，图袭国父战舰，这时全体官兵均惊惶失色，国父却屹然不动，这是由于秉持「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总统为民国而死，分所应尔」，「我辈既为国牺牲，当置死生于度外，方寸既定，逆军其如予何？」（注八）的伟大精神所致，这种精神，正和英国海将纳尔逊于伐拉加的大海战中，身为敌弹所伤，仍负伤指挥，直至绝命为止的精神，先后辉映。

让我于此补述 国父对于海军的研究： 国父对于往昔水战上所谓「风沙水线」的知识，无不通晓（注九），对于英美各国出版之海军名著，无所不读。据说： 每年都订有英国海军年鉴，常置案上，以供参考，并屡对同志详论海军在国防上的重要性（注十）。像在这一役中，当肇和、海琛、海圻三大舰为陈逆运动，驶离黄埔时，叛军以为这三大舰他移之后，则 国父所停止在黄埔各小舰，均在鱼珠炮台监视之下，并为黄埔后方的海心冈，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舰必不能通过，那不为鱼珠炮台所轰毁，亦必为其所封锁，任凭为所欲为。却不知道 国父对于海图，了如指掌，他为应付这个突变，即派员往测该处河水的深度，一听得水深达十五呎的报告，私心大喜，叹为果不出所料，立即督率各舰从黄埔上游，经海心冈驶出三河口，绕道驶往新造村附近，使叛军无所售其奸。这一个断然的处置，使全体海军将士，为之心折，就是叛军方面，也深惊其神算。至于对各舰舰长主张舰队不可移驻西江，列举五大理由：（一）以西江水浅，各舰移至西江，仅留三大舰在黄埔，则海军以势分而力弱，大舰或为逆军所买，则将来更难取胜。（二）以大本营一离黄埔，则长洲要塞必失，广州附近水性形势，尽入逆军范围之中，牵制更难，贼焰必张。（三）以总统移驻西江，其地面较广，活动虽易，然黄埔为广州咽喉，且有长洲要塞，其地点重要，非西江可比。且总统驻于黄埔，广州虽失，犹易恢复，威望仍在。如移西江，地势偏僻，无以系中外之望。（四）海军如往西江，重来省河较虽，如北伐军回粤，不能奏水陆夹攻之效。（五）移驻西江，而弃长洲天然之要塞，另谋陆上根据地，能否占领，尚不可知，且西江各部陆军，态度不明，能否为吾所用，尚未可必。如果陆上毫无根据，陆军又不奉命，则海军势绌，可立而待。有此



五害，故动不如静，坚持北伐军速来，以备水陆夹攻省城，则贼亡有日也。」又说：「各舰由此出动西江，经道牛山、鱼珠之叛军炮台，又有三大舰已在沙路港口，监视我各舰行动，叛军炮台或可鼓勇冲过，而沙路港口之三舰，监视严密，其妨碍我行动，阻止我通过无疑。故我舰队此时惟有袭取车歪炮台，驶入省城之一策，其余皆非计也。」（注十一）这真是一个英明的指示及决策。民十三致蒋中正先生的亲笔信说：「闻仲恺说：械船到时，拟在金星门内起卸，以避耳目，我以为不必如此，若为避人耳目计，则金星门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门之对面，即伶仃关，该关有望楼，有缉艇，凡到金星门附近之船无一目了然，实在不能避，而反露我们欲规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舰之干涉。因英舰已视此等海面为其范围，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门外年年淤浅，此时之水路，当较数年前海图，必差数尺，恐致搁浅，此二不可也。又在该处搬运，实花费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风雨盗贼之危险，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来黄埔，公然起卸为妙。」当时依照此指示而行，果得安然起卸。足见国父的熟悉海上形势。又说：「好像外国的旧兵舰，从前如果是装了十二门大炮，便分成六个炮台，要瞄准放炮，打什么敌人，都是由许多炮手去分别执行，做指挥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现在的新兵船，要测量敌人的远近，在桅顶便有测量机，要瞄准放炮，在指挥官的房中，便有电机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敌人，不必要许多炮手去瞄准放炮，只要做指挥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测量机的报告，按距雏的速近，拨动电机。要用那一门炮，打那一方的敌人，或者是要十二门炮，同时瞄准，同时放炮，都可以如愿，都可以命中，像这种海军炮的使用，是叫做直接管理。」（民权主义第六讲）足见国父对于海军炮兵的研究。此外 国父对于古代水战亦很注意，他

说：「从前庄子说：『宋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泔澼絖为事，客问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之曰：「我世世为泔澼絖不过数百金，今一朝而鬻百金，请与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则与越人水战，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泔澼絖，则所用之异也。』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保护手在冬天不至破裂的那种药，宋人用之不当，世世仅供漂布后涂手之用，吴人用之适当，使供水兵冬天耐战之用，而得一国。」（「国民要以人格救国」讲词）

前面说过 国父自讨逆未果，乃离粤赴沪。可是 国父于到沪之后，依然筹划讨陈事宜，不数月（十一年底），陈逆便为滇桂各军驱出广州，各将领见粤局稍定。乃电迎 国父于十二年二月重返广州主持大计，惟此时陈逆仍盘据于惠州，国父认为「孔明欲出中原，先擒孟获，吾欲出长江，非先灭陈不可。」（注十二）遂于是年夏季，亲自督师东征，其经过情形有如下述：

国父为铲除陈逆炯明以除后患，乃决计亲征，设大本营于石龙。于八月廿三日乘大南洋轮船为座驾，十二时向东江进发，下午九时，抵达石龙。时天气奇热，船复湫隘，所处之室，仅容一席，而 国父居之泰然，按图握管，决策定计，昼夜不少息。及至许某某由博罗来谒，请示机宜，并谓逆军分三路来袭，李易标已抵距此二十里之汤村，敌将接近，不意帅座冒险来此也。时滇桂各军，已与陈逆激战数日，迄未得胜。廿五日，博罗方面，又告失败，林某即率逆军向石龙进犯。廿六日，博罗飞鹏岭失守，逆军占铜鼓岭等地。 国父乃命飞机出发博罗，使守城者知有援应，并亲函许某某坚守，更命差舰载粮冒弹前进，以资接济，又电广州促援军急速来

援，羽檄如雪片，而军行转缓，盖广州滇军待饷乃发，不问博罗被围之急与不急也。因之博罗之围，终不得解。廿七日，情势亦恶，及至深夜，尚不见援军之至，国父乃遣古应芬回省，催促滇军福军与吴铁城所部开进。李福琳即率所部偕朱培德赴前方，同时吴铁城部亦开抵增城。廿九日，国父由石龙向博罗前进，从礼村至苏村，沿途风雨急骤，船阻难行，甚至李福林、吴铁城两部负侦察任务之骑兵，均不得进，座驾小舟，颠簸动荡，势颇危险，然国父正襟危坐，策画军事，并以民元以前之革命史，昭示同行官佐，而披阅图籍，未尝一日辍也。卅一日，国父由铁冈泊池地抵松村，博罗时被围已久，守将刘震寰拚死坚持，城下水涨急，军不得近，仅以炮远射而已。适谭延闿入湘之军，由败转胜，捷报传来，国父喜形于色，乃命各军攻击前进。九月一日，座船至第七碛，命福军滇军登山警戒，并饬副官于山颠燃火为号，使城内知主帅亲自来援。次日，国父亲登北岭，事事均躬为之，于致胡汉民书曾云：「吾今日兼尽一排长之职务，凡侦查敌情，考察地势，吾悉为之。」惟其时滇军大部份尚未集中，且骄不受命，国父不得已，重返石龙督促，虽许滇军禄国藩以重赏，而无效果，悍将骄兵，殊可恨也。三日，东路军所属师长张民达，与逆军战于淡水，大破之。四日，张至石龙捷报请训，国父命福军滇军分左右两翼进攻，滇军第四次要挟军饷未得，全军引退，止之无效。得南路邓本殷攻陷北海讯，国父命永丰舰往援。七日，许某某决突围，但以援军不克，早八时，福军与逆军大部接触，滇军田中毅，粤军张某某等部开雄鸡拍翼布阵。国父亲自登山督战，左翼福军，初犹小胜，及逆军大部冲进，福军退去，逆乃乘势闯进，沿义和墟而苏村，欲断福滇军之归路。是夜，退至石龙。八日，重进苏村，张部

等会同福军，进攻义和墟之逆，破之。九日，国父由雄鸡拍翼至谭公庙，率属登山督战，各军奋勇分途追击，鏖战甚烈，自朝至午，进退数次，双方均有死伤。十日，博罗守军杨廷培，突围至铜鼓岭，逆军死伤枕籍，向派尾向水退却，博罗之围，乃得以解。国父即乘舰赴梅湖视察重炮兵阵地，以备进攻惠州。博罗之围解后，国父命福军及张部等分途追击，十一日，克平山。十二日，命飞机队往惠州城投弹。十三日，国父入梅湖，亲发重炮（由虎门运往之十五生的要塞炮）五弹，轰击陈逆所盘据之惠州城。次日返广州，得增城报捷讯。十八日，国父复至前方。二十日，至飞鹅岭筹攻惠州，上午十一时至炮兵阵地，被逆军发见，敌即不断发炮向国父射击，弹落身旁，距不寻丈，从者多为国父危，而国父但谕以无恐，并谓敌炮射程已止于此，纵密发，必不及。此种大无畏精神，与料敌之准确，军事专家叹为罕见。旋以事返梅湖，留程清等御敌，行至中途，忽闻爆炸声甚烈，后知白沙堆所泊电船自炸，飞机队长杨仙逸，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鱼雷局长谢铁良均遇难。廿一日，复至梅湖重炮阵地亲发六弹攻惠城。次日复攻，虽不破敌，逆胆已寒。廿三日午，合各军并进，作冲锋之搏击，战至二十四日拂晓，以鱼雷炸城基，飞机掷炸弹，亦不克。午后，逆军反攻死亡过巨，不支而退。十月卅一日，两军相战，互有胜负，刘震寰于是日退出飞鹅岭，十一月六日，国父恐博罗失守，重行出发亲征，激战之余，虽告胜利，而惠城仍然在逆军之手。八日，逆军倾巢而出，各军均受挫。九日，国父急悬重赏，严督反攻，无如各军各顾地盘，不肯力战。十一日移大本营于石滩车站。十二日，逆军迫近石滩，被滇军击退，旋闻蒙兰、铁墙方面战急，讨逆军不支，国父即令新到之李根沅部沿广九路前进，不移时，闻战大

败，溃兵沿铁路纷奔，讹言四起。国父即率古应芬，李烈钧等急下车制止，以图反攻。不料溃兵多不从命，向后纷退，车遂倒行，侍从秘书副官黄惠龙等乃强国父上车，旋改登机车，直开广州，而李烈钧等已不及赶上，特另乘车到石滩布防。时逆军乘势尾随，几及石滩。然而范石生一闻败耗，不待炊毕，急奔赴援，大破之于石滩以东，逐逆军洪兆麟部于石龙。逆军之势乃稍戢，事后各路逆军复以重兵自广九路围迫广州，广州形势危急，不堪言状，国父仍本其大无畏之精神，坚持一兵一枪之奋斗，又急电湘军豫军驰援，豫军樊钟秀部日夜兼程赶到广州，徒步出击破之，广州赖以保全。是役也，国父之危，不减于白鹅潭之役，而坚刚勇迈之气，视白鹅潭之役殆尤过之，从其役者，谈及此番战事，莫不神往。

（注十三）

以上记载，自然不够详尽。虽说战斗以歼灭敌人战斗力，迅速获取胜利为旨，国父在这一役中，以八十余天的短期间，因陈逆凭据惠州的天险，及我方杂牌军队未能用命，致不克将其包围歼灭，却给予重大的消耗，并摧毁其斗志，尤以国父亲临前线督战的精神，足以感召我全体革命将士，造成他日东江大捷的因素。就通例说，国父以大元帅的地位，五十有九的高龄，对于讨贼军事，本应坐镇后方的广州，遥用电话电报来指挥，却不顾一切险阻，毅然挺身到前线去，如设大本营于石龙，亲到炮兵阵地发炮轰击陈逆，及敌炮对其射击，弹落身傍，而不退避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实与拿破仑在法奥之役，举旗前进的精神，同出一辙。

此外，在此役中尚有两点，值得一述如下：

一、是披阅图籍：我们知道，不能判读地图，固然不配做指挥官，而地图又常为指挥官必携的工具，指挥官不能抛弃地图而指挥作战，正如航海者不能抛弃罗盘针而航行。否则，在战场上就变成瞎子，既不辨东西南北，也不辨地形地势，固不会適切地运用战略战术，更无从判断敌军的企图，位置与配备。国父对于舆图向极重视，民前十三年冬在日本曾自制中国地图，并在自跋中强调说：「萧何入关，先收图籍，所以能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卒佐汉高以成帝业者，多在此云。」据说：在这次东征中，常吩咐参谋秘书或亲自携带地图，到野外时，平铺地上，站着用手杖指点判读，并指示部属。在军营中，悬挂壁上，或平置桌上，用红蓝铅笔划出记号，以为指挥作战的根据。登山视察地形时，用望远镜瞭望之后，又对照地图，判别有否误差，对图上所示路程的远近，山川的高低广狭，都能迅速计算出来。对于地图上一个很小地名，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注十四）。虽在督战时，一有余暇，便手不释卷，一种好学的精神，真为常人望尘莫及。考拿翁在作战时，他不论自己担任职务怎样重大，凡关于预定战地，必先在历史上和地图上仔细研究，并自行严密整理各种地图，出发时，在龙驹的革囊中常携带必要的地图和书籍，以精娴拿翁韬略的国父，也许受其影响。

二、是使用空军助战：空军的大量使用于战场上开始于第一次欧洲大战，从此战争的形态，便由平面变为立体，空军在现代战争上几取陆海军的地位而代之，没有拥着强大的空军，而被迫参加现代新型的战争，其吃亏将不堪设想。国父对空军的认识，在中国实为第一人，民元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任内，已设立航空队，并购

「飞船」。（「覆黎元洪告已购飞船及各物电」）民六致南洋同志书说：「飞机为近世军用之最大利器」，并鼓励同志学习飞行，派遣同志到外国学习航空，提倡「航空救国」，及在广州大沙头设置航空局，有飞机六架，水上飞机一架，他说过：「像飞机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飞的，是经过许多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像大沙头的那般青年飞机师，从前不知道怎么样飞，只是请外国的技师来教，所以学到现在，便飞得很好。」（「国民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讲词）国父在这次东征中，为导致战局于有利的形势，曾派空军到前方助战（注十五），虽说当时拥有的军用机连练习机仅有十余架，未能实行「杜黑主义」，使用强大的空军，协同地面部队，一举而歼灭逆军，且机上所装置的机关枪，系步兵使用的手机关枪，所投掷的炸弹，系改装的水雷或迫击炮弹，一切都是很幼稚的（注十六），但却可以看到 国父已抛弃陈旧的平面战争的观念，踏上崭新的立体战争的大道了。于此应附带一说的： 国父亦已从事于现代装甲部队的建设了，装甲部队以战车为主体，它具有优越的运动力、攻击力与防御力。而这号称为「地上雄狮」的战车，系出现于第一次欧战，并在战场上表演了惊人的奇迹。自此以后，各国竞相建立装甲部队，加以英国装甲部队理论家富勒将军的鼓吹，更使装甲部队的建设与空军的扩张，俱成为今日世界军事的两大主流。 国父对于第一次欧战很有研究，对于欧美鼓吹建设装甲部队的理论，自必受其洗礼，所以在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之下，仍勉力设置一个「甲车队」，设计者为擅长甲车战术的俄国顾问李縻君（注十七），虽说这个甲车队亦同飞机队一样的幼稚，使用于铁路上的改装钢甲火车（据说使用于广九、广三、粤汉铁路上收效颇大），使用于公路马路上的改装铁甲汽车，均为数无

几，及拥有的坦克两辆尚在试验中（注十八），但此举却开了中国装甲部队建设的先河。我们今后的建军，应澈底地接受 国父这两个伟大的遗规吧！

还有： 国父于同盟会时代的一九〇五年，亲订军事规章：《军政府与各处民军关系条例》，《军队之编制》、《将官之等级》、《军饷》、《战士赏恤》、《军律》、《招军章程》、《略地规则》和《因粮规则》等。于中华革命党时代的一九一四年，又亲订有：《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内分《军政府》、《限制勋纪》，《军律军法》，《因粮征发及其它则例》等，其中大部份亦属于军事规章，从这些规章看来，非对于兵学及军事法规素有研究，曷克臻此。其次是 国父鉴于历次革命的失败及苏俄建军的成绩，以为今后欲扫除国内反革命势力，尤其为巩固中国国防及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决不是利用乌合之众的民军，可以成事，因为他们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缺乏战斗的能力，也不是利用旧军阀的武力，所可济事，因为旧军阀以争权夺利为目的，不听命令，不守纪律，随时可以干起反革命的勾当来，像陈炯明、陆荣廷、沈鸿英之流，何莫非一度投机参加革命，但终变成与革命为敌的反动军阀。所以非从新建设强大的革命武力不可，尤非从新养成大批新革命干部不可，这便是 国父设立黄埔军官学校。（原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原因。 国父为设立这个军官学校，于民十三年派蒋中正、廖仲恺两先生负责筹备，旋任蒋氏为校长，廖氏为党代表。开学之日， 国父亲临致训，勸勉全体学生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从此积极训练，一面授以军事学术，一面施以政



治训练，因而养成无数革命的干部，在现代中国建军史上写下最光荣的一页。

西人论将帅的条件：「一曰无畏的大勇，二曰创造的智慧，三曰强健的体魄。」德国名将鲁登道夫也说过：「主帅的地位，应为第一等艰辛，第一等天才，第一等坚强意志。」国父实足以当之无愧。国父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武合一的大人物，也是现代一个智仁勇兼全之天才的大军事家！

**注释：**

（注一）波亚（Boers）人为荷兰农民移殖南菲，分居杜兰斯亚及阿伦治自由邦，国父在「钱币革命通电」中所称「杜阿二国」，即指此。在《军人精神教育》中所称「杜国」即指杜兰斯亚。在《民权主义》里所称：「波人」，即波亚人。

（注二）堪玛利将军 Homerlea（976—1012）美国军事专家，著有《无知的勇气》一书，风行各国。与国父结识于旧金山，共同研究军事，旋与国父经欧来华，曾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国父誉为「天下最杰出军事家」。

（注三）据冯自由先生于民国三十年七月由渝给我的信。

（注四）、（注五）、（注十四）及（注十六）据李仙根先生口述。

（注六）据胡毅生先生（是役参加者）口述，修正坊木记述写成。

（注七）据张先生口述。

（注八）及（注十一）见蒋中正先生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国父语。

（注十）据张溥泉先生口述。

（注十一）见邹海滨先生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国父语。

（注十三）参照胡去非编纂：《总理事略》第十一章六十节写成，并承参与是役两位老同志校正。因该文据古应芬著：《孙大元帅东征日记》写成，而古著与事实略有出入。

（注十五）据 国父《促王棠速办攻惠军需书》说：「新飞机日内可到，必照应着航空局赶将飞机配好，赶来前敌应用。」

（注十七）国父致蒋中正先生函云：「前李縻将军要取手机枪拾八枝，为配甲车之用，务要照发。……李君专长甲车战术，一切须由其配备乃能灵捷，且敌人已来窥翁源、河头，欲断我省韶铁路之交通，我日内往韶关，则此铁路之防备更为急要。」

（注十八）据赵超先生口述。

### 参考书：

胡汉民先生编：《总理全集》，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总理全书》，吴秩晖先生著：《总理行谊》，张其昀先生著：《党史概要》，冯自由先生著：《革命逸史》，陆辑：《孙中山先生外集》，中宣部编：《国父孙中山先生年谱》等书，及克劳塞维慈《战争论》，鲁登道夫《全体性战争》，拙作《孙子兵法新研究》等书，又，本书全文所参考书籍达一百二十种，论文二百十五篇，为节约篇幅，未能尽录，合并声明。

## 二、战争思想

思想是行动的指针，是力量的根源，一种战争必有一种战争的思想。德国兵学大师克劳塞维慈在其不朽的杰作《战争论》一书说：「战争是起因于战事爆发时所存在之各种思想观念等关系，复因此等关系，而使战争有种种形态。」

中国过去的历史是战争起伏的历史，今后的历史，在世界未大同前，当然也免不掉战争的发生，但今后的战争思想，是不容再分歧或错误了，分歧则力量分散，难期胜利，错误则轻举妄动，祸国殃民。所以必须建立一种正确的战争思想，以为今后战争行动的南针。

尤其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主义思想的战争，正如日本军事家土居明夫说：「下次战争是主义与世界观的战争。……下次战争倘若是主义思想的战争，物质的战争，长期的战争，则主义思想的光明正大者，资源生产、科学技术优越者胜利，在综合此种战力的总体战上，能胜者胜利。」（注一）足见这个无形的战争，与有形的军事武力的战争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在主义思想的战争中，其光明正大者必可获胜，反之必败，稍一检讨过去我们北伐的胜利，及法西斯德、日、意在二次大战中的失败，已可得到答案，这更使我们非从速把我们的战争思想建立起来不可。

纵观现代世界的战争思想，自德、日、意失败之后，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思想体系经已崩坏，迄今犹存的，可分为两大体系：一为民主主义的战争思想体系，一为共产主义的战争思想体系，前者以

自由与和平为目的，美国为其代表，后者以侵略与奴役为目的，苏俄为其代表，两相比较，已可推断苏俄在来日三次大战中是必败的。

今日我们所要建立的战争思想，当然是反对俄式共产主义的战争思想，而应与美国诸民主国家的民主主义的战争思想相协调，相一致，始为「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自传》）

大凡战争思想是政治思想的反映，国父的三民主义是我们的政治思想。自然我们的战争思想也是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即为实行三民主义，造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而战的战争思想。但为实现三民主义，在现阶段，首要反共抗俄，可见今日世界各民主国家亦莫不正在反共抗俄，可见反共抗俄是国际性的，非一二国家的事，亦唯有全球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始可争取反共抗俄的胜利。

正如下面所述，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的本质，是为求生存存的，求和平的，又是反极权的，反侵略的，这是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思想相协调，相一致，抑且更为进步和完美。因为民主主义倘带有资本主义的气味，而三民主义则无。所以今日为建立中国的战争思想，只有从三民主义中（国父全部遗教俱可归结于三民主义）来发掘和建立了。

克劳塞维慈氏关于战争的定义说：「战争的基本要素，是两人以上之间的斗争，即决斗，战争不外是决斗的扩大。」跟着说：「战争是为屈服敌人，以实现我意志所用的暴力行为。」国父对于战争这个术语，虽然没有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却说过：「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民权主义第一讲）克氏又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

治的行动，实为一种政治的手段，政治上对外关系的一继续，而以其它手段（暴力行为——浴日注）施行之。」国父亦认战争属于政治的形态，他说：「政治的海陆军力」，跟着又说：「应用政治力去亡人的国家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一是外交。」（民族主义第二讲）所以我想 国父一定读到克氏《战争论》而受其影响的。于此，我可再举出一些例证来：克氏说：「凡为指挥一种战争或一幕战役的重大活动，而取得光荣的胜利，非具有政治上的特别高见不可，所以战争和政治是一致，将帅也是政治家。」 国父说：「现代军人只懂得军事是不够的，军事以外还必须了解政治。」（《政治基础在于地方自治》谈话）又说：「如果说军人不干涉政治，还可以讲得通，但说不懂政治，便讲不通了。用为政治的原动力便在军人，所以军人当然要懂政治，要明白什么是政治。」（民权主义第一讲）克氏《战争论》是世界军事名著，也是一种战争哲学，不特军人应该精读，即一般思想家亦应人手一卷。它是政治家、外交家、愿问及一切与政务有关者的枕中秘本。诚如 国父的好学与博学，尤以指导战争的需要，自不会不知道这部名著，又不会不加以深刻研究，虽说目前未找到更确凿的证据，但依于上述的对照已可以推知其究竟了。但 国父与克氏亦有不同之点，就是 国父不是克氏为战争而战争的论者，乃是为革命而战争的论者，他一面反对「野蛮」与「弱肉强食」的侵略战争，另一面却主张「以战止战」，「为人类作干城，为进化除障碍」的革命战争。（《战争入门序》）亦即为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战争，可见他的战争思想比克氏来得正确和进步。

其次，国父对于战争发生的见解，不是看做偶然的現象，也不是看做经常的現象。他认为有国家即有战争，战争是国家间不可避免的现象，又为一种不得已的举动，他说：「论国家之起源，大概以侵略人之目的，或以避免人侵略之目的而为结合，其侵略人固为战争，即欲避人侵略亦不能避去战争。……以一国而为战争，万不得已之事也。……凡国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战争既毕，仍当复于外交之序。故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行政策所不可阙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时多，用战争手段之时少，用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则，战争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尽，无可如何之谓也。」（《中国存亡问题》）他又认为在革命过程中，战争亦为不可避免的现象，诚以革命是最艰巨的事业，或为推翻统治者，或为打倒侵略者，不是完全采取和平的手段所可奏效，不得已时还要诉诸流血的战争。故国父致力革命之始，即揭橥「趋除鞑虏」的纲领（「同盟会宣言」）。又在手订《建国大纲》上制定「军政时期」为革命建设步骤的第一个时期，即第六条：「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于此又可见国父并不同过去法西斯主义者讴歌战争为「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又不同现在赤色共产主义者以阶级斗争为社会进化原动力，到处发动侵略的战争。至于根据国父最高的理想，战争并不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却有待于大同世界的实现。这个大同世界的内容，正如国父亲书《礼记·大同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便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亦即三民主义最高理想的实现。

国父的战争思想是三民主讲的战争思想，已如前述，而我们基于战争哲学的观点，在国父的全部遗教中，却可以发现他的战争思想是建立于「生存」与「和平」的基础之上，即它的本质是为「生存」与「和平」而战。兹分述如下：

### 一、为生存而战

这可以说是 国父战争思想的核心。《三民主义》的基础是民生哲学。 国父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民生主义第一讲）又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全）又说：「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全）再又说：「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虽说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却是人类求生存的一种手段，亦即说人类社会民族国家遭受生存的威胁——别国的侵略时，则非断然采取战争的手段不可，否则，便不能自卫，维持其生存，而陷于灭亡。至于侵入人国，以掠夺财富，扩大空间为目的战争，则非革命的战争，自然亦非 国父所谓「求生存。」 国父说得更明白：「人类如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

的，保就是自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才能够生存。……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注二）（民族主义第一讲）这里所谓自卫的能力，当然是指武力，唯拥有足以自卫的武力，亦即能战的武力，始能维持民族国家的生存。又说：「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即为求生存——浴日注）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临时大总统告友邦书》）亦即说战则为求民族国家的生存。而非为侵略。又说：「吾人初不以黷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精武本记序》）又，国父于民元解职后，在香港与西报记者谈话说：「惟吾意中国无侵略志，因吾人志尚和平。吾人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即为求生存——浴日注）而非攻人，若果欧人势逼吾人，则吾人将以武力强国。」（「南北统一后之政治与外交方针」谈话）依此可见 国父的战争思想是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为核心，昭然若揭。他发动推翻满清，是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他主张抵抗帝俄，也是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他屡次兴师讨贼，也是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至于我们过去对日抗战，与现在的反共抗俄，也是继承 国父的遗志，为求中华民族的生存。本来鲁登道夫将军在《全体性战争》一书上，也是主张为求生存而战的，他说：「全体性的战争之目的，在于民族生存之维持。」实则他仅为求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在大日耳曼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之下，他可以牺牲别个民族的生存，即他只要自己民族的生存，不要别个民族的生存。我 国父则比他正确和进步，即要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存，同样也要别个民族国家的生存，扶助别个民族国家的生存，正如 国父所主张的「济弱扶倾」。（民族主义第六讲）



## 二、为和平而战

和平与战争本是对立的现象，也是统一的现象。主张和平不能否认战争，主张战争亦不能否认和平。但我们今后的战争，则不可徒为战争而战争，更不可为侵略而战争，应为和平而战争，战则要打破一切不和平的现象而使归于和平，亦即说战争仅为和平的手段，而和平才是战争的目的，唯有这样才是革命的战争。这便是国父战争思想的第二个本质。中国人的天性，爱好和平，国父的天性更爱好和平，不得已而战，乃以和平为目的。民元前一年在香港舟次对胡汉民说：「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今之大患即在于无政府，如能创建政府，则满清之政府固必倾覆，即袁世凯亦未必能支，必不足以为患于新政府，故不宜预防他人之不服，而一意谋以武力争天下也。」（「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即不必用其兵」谈话）于此可见国父不是一个好战者，也不是一个武力崇拜者，其爱好和平的天性溢于言表。民十四逝世的弥留时对同志说：「余此次放弃两广北上，实为和平统一而来，」又反复断续的说：「和平！奋斗！救中国！」益见爱好和平的天性。爱好和平既是国父的天性，至于不得已而战，系为和平而战。国父说：「中华民国之创造者，其目的为和平。」（《实业计划结论》）这是说为打破满清对我汉族的不和平，才发动推翻满清的战争，依于战争的胜利，而创造中华民国，即创造新的和平，达到和平的目的。尤值得注意的，国父发动推翻满清的战争系出于不得已而在和平绝望之后，民元就《临时大总统告各友邦书》说：「自满清盗窃中国，于今二百六十有八年，其间虐政，罄竹难书，吾民族唯有隐忍受之，如倒悬之得解，求自由

而企进步，亦常为改革之要求，而终勉求所以和平解决之道，初不欲见诸流血之惨也。屡起屡蹶，卒难达吾人之目的，至于今日，实忍无能忍。吾人鉴于天赋人权之万难放弃，神圣义务之不容不尽，是用诉之武力，冀脱吾人及世世子孙于万重羁轭。」民十三神户演讲说：「要请欧洲人之在亚洲者，俱以和平方法，退还亚洲人之权利，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便当诉诸武力。」（「大亚洲主义」）这是说和平方法失效后，始可诉诸战争，战争则为达到和平的目的。

其次 国父常赞扬中国人素爱好和平的天性说：「中国人民本甚和平，现在世界上，立国百有数十，雄强相处，难保不有战争发生。惟中国数千年来，即知和平为世界之真理，人人均抱有此种思想，故数千年来之中国，纯向和平以进行。中华民国有此民数，有此民习，何难登世界舞台之上，与各国交际，共谋世界之和平。此种和平运动，即中华民国国民之天职。」（「中国人之天职在促进世界和平」讲词）又指出爱和平为中国一种极好的固有道德说：「中国更有了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民族，只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来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方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赛尔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

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民权主义第六讲）并再三呼吁「维持世界和平」（散见遗教中），我们深望外国人能够了解我民族暨 国父这个优点。同时也希望外国人亦能具此优点，不来侵略我们，又不去侵略人家，共同维持世界的和平。

要之，爱好和平的精神是贯通着 国父整个思想的，其表现于战争上，则为「为和平而战」。我们过去对日抗战及今日反共抗俄，就是争取中国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同时也是发扬 国父倡导和平的伟大精神。

以上系就 国父战争思想的本质，亦即战争的基本观念，以下我且就形式上，亦即战争的对象来谈，这是上述本质的进一步说明，而后者「为抵抗侵略而战」又成为前者「为铲除障碍而战」的说明。

### 三、为铲除障碍而战

国民革命的障碍有三：一曰专制君主，一曰封建军阀，一曰帝国主义，这三大障碍物，如果没有根本铲除，则国民革命无由成功，民族国家亦无从生存发展与和平。但欲根本铲除这三大障碍，除作和平的奋斗外，不得已时还须诉诸流血的战争。所以 国父当进行推翻专制君主的满清之时，便倡率起义，采取战争手段。同盟会宣言说：「满清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自满清被推翻之后，继之而起便是封建军阀，于是便先后实行讨袁、护法、讨莫、讨陆、讨陈、讨沈及北伐曹吴。 国父说：「军事的奋斗，推翻不良的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党员不可存心做官」讲词）又说：「四年以来，爱国之士，讨伐军阀及卖国贼，无非为护法主义及国家生存计，此不能

名为南北之争，实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宣战，爱国者与祸国者宣战而已。」（「就非常大大总统后对外宣言」）又说：「今将开始一新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又说：「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盖必如是，然后国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扫除障碍之故而活泼远行也。」（「北上宣言」）并在民族主义里强调打倒帝国主义，民权主义里强调打倒封建军阀，因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不打倒，则民族、民权主义无从实现，民生主义亦无由着手。过去北伐的成功，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抗战胜利）。可以说国民革命的障碍殆已经铲除净尽。否料，朱毛共帮又继起与俄帝狼狈为奸，盘据大陆，拮据人民，屠杀无辜，摧残民族，出卖国家，成为我们国民革命的新障碍。今日我们正欲打回大陆，肃清共帮，驱除俄帝，就是为铲除国民革命的新障碍，亦可谓：「为反极权而战」，「为自由而战」，因共产太极权太剥削人民的自由了。

#### 四、为抵抗侵略而战

一国当外患之来，很明显的，抵抗就是自卫的生路，屈服就是自死的死路。大凡一个民族国家之亡，是亡于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如抱着抵抗主义，为抵抗侵略而战，亦即所谓「为反侵略而战」，有时虽告失败，终必获胜。近代中国受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达于极点，故 国父在民族主义里大声疾呼民族精神以抵抗之，说：「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又

说：「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的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无论对那一个，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积极的，这种方法，就是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这种方法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极的抵抗，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以维持民族的地位，免致灭亡。」始终未主张侵略人家，不独不主张，且反对之。又在其手订《建国大纲》上订有「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的条文，这是进而确定抵抗侵略为国策的。又 国父《实业计划》一书的结论说：「今则日本之军阀政策，欲以独力并吞中国……今中国已醒觉，日本即欲实行其侵略政策，中国人亦必出而拒绝之。」这是 国父主张「为抵抗侵略而战」的更具体主张，亦即我们过去对日抗战的根据，依于抗战的胜利，果得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亦尽了维持世界和平的义务。

至于俄国处心积虑之欲亡我， 国父早已洞若观火，见于民前十三年撰《支那现势地图》跋说：「中国舆图以俄人所绘者精审，盖俄早具萧何之智，久已视此中华土地为彼囊中之物矣。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险要、城廓人民，较之他国舆地家尤为留意。」今日以大彼得自命，又继承沙皇衣钵的大独裁者斯大林，朱毛共帮已为其所控制，而把中国整个大陆作「囊中之物矣」。不待说，这是我们民族遭受着一次空前未有的大侵略，我们为维持民族生存与世界和平，则非反共抗俄不可，尤应与世界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打倒莫斯科，把 国父抗俄的精神与计划实现于今日！

当民国元年，帝俄侵我外蒙古甚急，制造所谓「库伦独立」，旋以俄蒙协约，迫我承认，野心勃勃，节节进逼，赳赳乎有囊括我

东北各省之势。这时 国父为打破这个危机，便以在野之身，坚决地提出对俄抗战的主张，在其「钱币革命通电」上说：「今者俄人乘我建设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外蒙古，以常情论之，我万无能抵抗之理，在俄人固知之素，而审之熟，故甘冒不韪行之。我国人皆知蒙亡国亡，与其不抗俄屈辱而亡，孰若抗俄而为壮烈之亡。」跟着说：「与其俯首听人之瓜分，何若发奋一战，以战强俄，而固我国基于万代之为愈也。况当此民气正盛，国体方新，战有必胜之道，不战为必亡之阶，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之决也。纵以常理论之，今日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屈于霸道强权而亡，不如一殉人道公理而亡，一战不独不亡，而更可扬国光，卫人道，伸公理于世界也。」 国父为纠正当时北京政府和议派的错误主张，在该电文上又大声疾呼说：「语曰：『能战而后能和』，惟我今日不能战，故俄敢公然侵我领土，若徒然与办交涉，与之言仲裁，悉归无效。」 国父这个伟大的主张，因当时北京军阀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未能实现，致把外蒙古的主权断送于俄人。可见不抵抗主义的危险。至于国父当时抗俄的作战计划，系主张采取长期的作战计划，正如该电文说：「必备屡战屡败而气卒不挠，乃能求最终之一胜。语有之：『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俄有常兵百万，战时兵五百万，我现在练兵五十万，民兵无量数。就俄之现势而观，六个月之内，必难出至五十万兵，而我则于此期之内，可出五十万。于外蒙北满六个月之后，又可加练新兵五十万。然以此而敌俄，在第一年之战，胜负未可知。惟第二年，我当出兵二百万，意料中当可逐俄出满蒙之野，而复我黑龙江沿海州之侵地。然万一仍败，则第三年当出兵四百万，若犹不能得利，则第四年当出兵六百万，则未有不胜者也。在此期内，俄必有财政之恐慌，革命之起义，与我可

乘之隙者甚多。若彼犹不屈服，则期第五年之大举，必出兵至八百万或至千万，必直抵莫斯科圣彼得堡而后已。」真是我们今日反共抗俄的南针。

以上便是 国父战争思想的本质，亦即 国父的战争观，依此而论，自然他是反对军阀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关于前者，他说：「军阀惟知以武力据地盘，以欺诈权利。」（「覆萧翼、杨道馨函」）国父厘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亦说：「事实上，不能禁军阀中之一派不对于他派而施以攻击，且凡属军阀莫不拥有雇佣军队，推其结果，不能不出于战争，出于抢夺，盖抢夺于邻省，较之抢夺于本省为尤易也。」关于后者，他说：「国际战争者无他，纯然一简直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耳。故对此种强盗行为，凡有心人，莫深疾痛恨之。」（《实业计划》结论）又说：「欧洲数年大战的结果，是不能消灭帝国主义，因为当时的战争，是一国的帝国主义和别国的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战争，不是野蛮和文明的战争，不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仍是一个帝国主义打倒别个帝国主义，留下来的还是帝国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关于阶级战争呢？ 国父认为阶级战争，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今日的中国则不能发动此种战争，他说：「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此种之战争，现已发动于各工业国家者，极形剧烈。在工人则自以为得最后之胜利，在资本家则决意以为最苦之压迫，故此种战争，何时可以终局，如何可以解决，无人敢预言之者。中国因工业进步之迟缓，故就形式上观之，倘未流入阶级战争中。吾国之所谓工人者，通称为苦力，而其生活只以手为饭碗，不论何资本家，若能成一小工店予他等以工作者，将必欢

迎之。况资本家在中国寥若晨星，亦仅见于通商口岸耳。」（《实业计划》结论）

此外，我们可以证明 国父也是一个总体战的倡导者，虽说总体战（Totale kriege 有译总力战，或全体性战争）的理论，倡导自德国名将鲁登道夫，其根据是第一次欧战的经验和教训。 国父所拟著《国防计划》一书，亦系根据第一次欧战的经验和教训，虽说该书尚未完成，而国父先逝世，在其拟就的该书大纲草案里，却可窥见 国父早已具有总体战的观念，——把政治、经济、文化诸端和军事一起来论列。（请参阅下章「国防建设」）又从本书「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宣传」诸章来看，更可证明 国父是总体战的倡导者。原来 国父的思想是「迎头赶上去」的，自然他的战争思想也不能例外。这一个总体战的方式，正是我们今日反共抗俄战争的最高指导。

总之， 国父的战争思想是革命的，是救国救世的战争思想，换言之，是以「仁」为中心（注三）并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的三民主义的战争思想。这个光明正大的战争思想是比民主主义的战争思想为进步与完美，（请注意！尚须表现于实际行动，方能发生伟大的作用）最后必能粉碎万恶的共产主义的战争思想。我们应从速把它弘扬于全世界，蔚为民主国家战争思想的主流，争取反共抗俄战争的早日胜利。

（注一）见日本大陆问题研究所所长士居明夫中将著：《美苏战争的预测》一书，一九五二年出版。

（注二）国父所说的「奋斗」，据我的研究，可分为和平的奋斗，军事或战争的奋斗，他说：「军官学校教学生，用枪炮去奋斗，这



个讲习，是教学生用言语文字去奋斗，即和平的奋斗。」（「言语文字的奋斗」讲词）

（注三）国父说：「我们南方革命，大家知道牺牲了多少性命，流了多少鲜血，这是为甚么？无非是想革命成功，造成一个很安乐的国家，让人民可以享幸福，抱这种宗旨去奋斗的军队，才是仁义之师。滇军这次到广东来，继续顾总司令的志气，为革命奋斗，费了很大的牺牲，真是仁义之师，所做的大事，可算是一半成功。如果现在去北伐，收复江西，统一中国，便是要做的大事，完全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讲词）

### 三、国防建设

倘若人类皆爱和平，战争已经废除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也不必再来谈什么国防建设了。

国防建设即是战争准备，现代战争即为总体战。因此一般学者对于现代国防建设恒分为国防政治建设、国防经济建设、国防文化建设及国防军事建设诸部门。惟欲从事于这个新型国防的建设，决不是一蹴而几，也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可有济。必须了解本身与认识对象（假想敌），发挥全力，作有计划的建设。才能强化国防，巩固国防，做到「避免战争」或「战则必胜」——实现国防的目的。

中国是世界一个古国，也是一个大国，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陆有长白山、兴安岭、阿尔泰山、天山、葱岭、昆仑山、喜马拉雅山为天然屏障，海有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香港、海南岛、及东西沙群岛为天然屏障，固然这些地理因素有利于我们国防上的防御，但亦不过是补助的因素而已。正如孙子说：「地者兵之助也。」所以我们不可专恃这个天然屏障来巩固我们的国防。因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由于轮船战舰的使用，便可以打破我们海上的天然屏障。陆上的天然屏障，如天山、阿尔泰山大致多和边界的方向垂直，亦不足以阻止彼此的交通。长白山、兴安岭横亘于东北的边境，葱岭、昆仑山、喜马拉雅横亘于西南的边境，彼此亦有相通的道路，何况今后以飞机的进步，可以横渡海洋，又可以飞越高山峻岭，又依于降落伞部队与空中步兵的使用，随时可以侵入我们的内部。其次我们的境内有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黄河三角洲），东

南平原（长江三角洲），岭南平原（珠江三角洲），两湖平原（包括洞庭湖流域和鄱阳湖流域），亦便于侵入之敌装甲部队的活跃。我们再看：在过去对日抗战中，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敌人便得安然在我沿海登陆。反之，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中，日本为什么不一鼓作气侵入美国本部，主要的不是太平洋的障碍，而是因为没有什么优势的海空军。又看德国的发动欧战，始终未能侵入英伦，主要的不是多维海峡的障碍，而是由于英国海军的优势，及拥有相当的空军，足以控制多维海峡。我们明乎此，就应致力于人为的国防建设了。但在人为的国防体系中，像静的国防力量是不足恃的，正如二次欧战中，列日要塞不足以保障比利时的安全，马奇诺防线不足以保障法国的安全，所以我们在人为的国防建设上，必须置重点于动的国防力量的建设，方足以巩固国防，适应今后战争的要求。

在中国国防建设上，《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一部伟大的国防指导原理。该书劈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指示我们在未战之前，就要致力于国防建设。倘若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而贸然与人家开战，其危险将不堪设想。跟着又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又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再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可惜历代掌握着国防建设大权的君臣们只把它当作一部兵法的书看，鲜有把它的原理通用到国防上，即忽略它在国防指导上的价值。加以支配着历代君臣们的脑筋，又是那些所谓「偃武修文」、「重文轻武」、「以大事小」、「以德服

人」、「佳兵不祥」、「兵凶战危」的思想，益以内战的频仍，国力的空虚，遂使国防建设无从发展。即顶大工程的万里长城，在历代的防御上，亦几等于零。尤以降及宋明之世，废除征兵制度，极端抑武扬文，一则崇尚理学，一则提倡八股，致士林日趋文弱，更造成国防上一个大大的漏洞，所以宋明皆由偏安而至亡国。迄于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华，对于汉人的拮据，无所不用其极，所有兵事不许汉人过问，专事防内，不思防外。洎乎列强帝国主义的侵入，先后惨遭鸦片（中英战争）、丁巳（英法联军战争）、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庚子（八国联军战争）诸役的失败，割地赔款，举国哗然。这时清廷自知以一族一姓之力不足以御侮图存，汉人从此始得过问兵事。说到当时对于国防建设的主张，先后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海防论」，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论」，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时务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论」，毕竟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西洋富强的原因，文化的精神，及中国国情，故所发为议论和主张，均未成为起死回生之药，且因清廷的腐败过甚，（如慈禧太后移海军建设经费来修颐和园等），亦多未付诸实施，故终未把中国国防的力量壮大起来。

「没有国防，便没有国家。」国父因饱受第一次欧战的教训，又目击国防的危机，更感到过去「海防论」、「洋务论」、「时务论」及「维新论」的错误与失败，便决意为中国国防开辟一条新生之路，拟著《国防计划》一书以为宣传，并作为今后国防建设的南针。

国父的国防言论，可以远溯上李鸿章书的「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也可以说是他最初关于国防的主张。此后，民元在广州军界欢迎会上致词说：「今日要务，在乎扩张军备，以成完全巩固之国防，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民二覆陈其美先生《论建设国防武备书》说：「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何也？我国之兵船不如外国之坚利也，枪炮不如外国之精锐也，兵工厂不如外国设备齐完也，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同志谓中国国防不有相当武备建设，此中国不富强之原因，诚是也。故中国政府须勤修军备，然后可以保障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也。文现闻袁君世凯，拟向外国大借外债以为扩张新军备建设之需，果此事实行，则中国有相当新军备建设也。如是则中国富强可计日而待也。昔满清政府将扩张海军建设之费以为建设一大游乐园（指颐和园——浴日注）以作私人之娱乐，吾想今日民主政府，必定努力整理新军备建设，改革中国旧军备也，而不有昔日满清政府之腐败也。现在强邻如虎，各欲吞食我国，若我国不有相当武装自卫，则我国必为虎所食也。故我国须改良武器，然后能自卫也，不为虎所食也。」民十三演讲三民主义时，更指出中国国防的危机说：「因为我们的海陆军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外国随时可以冲入，随时可以亡中国。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他们的陆军，平时可出一百万，战时可加到三百万，海军也是很强的，几乎可以和英美争雄。经过华盛顿会议之后，战斗舰才限制到三十万吨。日本的大战船，像巡洋舰，潜水艇、驱逐舰都是很坚固，战斗力都是很大的。譬如日本此次派到白鹅潭来的两只驱逐舰，中国便没有更大的战斗力的船可以抵抗，像这种驱逐舰在日本有百几艘，

日本如果用这种战舰来和我们打仗，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制我们的死命。而且我们沿海各险要地方，又没有很大的炮台，可以巩固国防，所以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专就军事上的压迫说，世界上无论那一个强国，都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

从上录 国父这些言论，便可窥见 国父拟著《国防计划》一书的动机。至于该书的内容，根据 国父于民国十年七月八日在广州给廖仲恺先生的手札，那仅是 国父拟著《国防计划》一书纲目草案，并非《国防计划》一书的全豹。《三民主义》的自序说：「《国家建设》一书，较前三书为独大，内函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而《民族主义》一册，已经脱稿，《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二册，亦草就大部，其它各册，于思想之线索，研究之门径，亦大略规画就绪，俟有余暇，便可执笔直书，无待思索。方拟全书告竣，乃出而问世，不期十一年六月十六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殊可痛恨！」

国父给廖先生这封信，可当作他拟著《国防计划》一书的「大略规画就绪，俟有余暇，便可执笔直书，无待思索。」倘若不遭陈逆叛变的影响，而他又不是逝世得那么早，则这部国防经典必可依照此纲目完成。

国父给廖先生的手札，原文如下：

仲恺同志鉴：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余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余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即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国防计划、革命方略等）举而行之，以求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焉。不期当时之党人，以余之理想太高，遂格而不行。至今民国建元，十年于兹，中国犹未富强如列强者，皆以不实行余之救国计划而已。余近日拟著一书（《十年国防计划》）以为宣传，使我国全国国民了解余之救国计划也。该书之纲目，笔之如下：

- 一 国防概论
- 二 国防之方针与国防政策
- 三 国防之原则
- 四 国防建设大纲
- 五 制定永远国防政策，和永远以国防军备充实建设，为立国之政策
- 六 国防与宪法
- 七 太平洋国际政治问题与中国
- 八 国防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外交政策、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关系
- 九 国防与实业计划之关系
- 十 发展国防工业计划
- 十一 发展国防农业计划

- 十二 发届国防矿业计划
- 十三 发展国防商业计划
- 十四 发展国防交通计划
- 十五 发展国防教育计划
- 十六 财政之整理
- 十七 外交之政策和战时外交之政策
- 十八 移民于东三省、新疆、西藏、内外蒙古各边疆省计划
- 十九 保护海外各地华侨之意见书
- 二十 各地军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新建设计划
- 二一 都市与乡村之国防计划
- 二二 发展海军建设计划
- 二三 发展航空建设计划
- 二四 发展陆军建设计划
- 二五 各项重要会议之召集，如开全国国防建设会议、海军建设会议、军事教育会议之属，由中央政府，每年举行一次，以为整理国防建设
- 二六 军事教育之改革与训练计划
- 二七 军器之改良计划
- 二八 军制之改革
- 二九 军医之整理及改良军人卫生之建设计划



三十 国防警察之训练

三一 军用禽兽之训练

三二 国防本部之进行工作

三三 仿效各国最新国防建设计划

三四 举行全国国防总动员之大演习计划，和全国海陆空军队  
国防攻守战术之大操演

三五 作战计划

三六 遣派青年军校学生留学欧美各国学习各军事专门学校及  
国防科学物质工程专门学校之意见书

三七 向列强定制各项陆海空新式兵器，如潜水艇、航空机、  
坦克炮车、军用飞机、汽球等，以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  
器与仿制兵器之需

三八 奖励国民关于国防物质科学发明之方略

三九 购买各国军事书籍、军用品、军用科学仪器、军用交通  
器具、军用大小机器等，以为整理国防之需

四十 组织考察世界各国军备建设之意见书

四一 聘请列强军事专门人员来华教练我国海陆空军事学生，  
及教练国防物质技术工程之意见计划书

四二 收回我国一切丧失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让地之计  
划

四三 我国与各国国防实力比较表

- 四四 抵御各国侵略中国计划之方略
- 四五 训练国防基本人才三千万计划，训练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一千万计划
- 四六 完成十年国防重要建设计划一览表
- 四七 新兵器之标准
- 四八 组织海陆空军队之标准
- 四九 扩张汉阳兵工厂如德国克鲁伯炮厂之计划
- 五十 国民代表大会关于国防计划之修改、国防建设意见书
- 五一 欧战战后之经验
- 五二 国防与人口问题
- 五三 国防与国权
- 五四 指导国民研究军事学问之研究
- 五五 实施全国精兵政策
- 五六 军人精神教育与物质教育之比较
- 五七 注重国际军备之状况
- 五八 我国之海军建舰计划、航空建设计划、陆军各种新式枪炮战车及科学兵器机械兵器建造计划
- 五九 训练不败之海陆空军计划
- 六十 列强之远东远征海陆空军与我国国防
- 六一 各国富强之研究

## 六二 结论

以上各计划，不过大纲而已，至于详细之计划，待本书脱稿，方可阅览。余鉴察世界大势及本国国情，而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需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也。若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实行之，则中国富强，如反掌之易也。

手此，即候

毅安！

孙文 七月八日

这封手札中所载《国防计划》一书的纲目六十二项，虽说尚是一篇信笔写来的简单初稿，却具有现代化国防计划的新规模。申言之，它不是十九世纪以前那种纯粹军事的国防计划，已进而把国家的整个活动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部门和军事并列一起，完成全体性的国防建设，来适应现代全体性的战争（即总体战）。他眼光的远大，计虑的周详，实为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辈望尘莫及。

国父这个《国防计划》大纲草案，真是范围庞大，项目繁多，加果完成，必是一部辉煌巨著，与《三民主义》、《实业计划》二书，鼎足而三。我要加以说明和研究的：

首先是第一项：「国防概论」，这是关于国防一般论述，亦可以说是全书的楔子或绪论。第二项：「国防之方针与国防政策」，所谓国防方针是根据国防思想（国防思想根据战争思想），假想敌国及本国各种特殊情形而制定的。国父所要制定的国防方针，是自卫的，不是侵略的，是守势的，不是攻势的，正如四十二项所说：「收回一切丧失疆土，及租借地，租界，割让地之计划」及四

十四项：「抵御各国侵略中国之方略。」又如手札所说：「免受各国兵力侵略」，依此而完成中国之自由独立。所谓国防政策是为实现国防方针的手段与方案，它是随时代环境而变更的。而国防方针则可经久不变，或往往一成不变，两者的关系如此，其不同又如彼。至于国防政策的范围应包括国防政治政策、国防经济政策、国防文化政策、国防军事政策，而以军事为中心。第三项：「国防之原则」，本来在国防原则上，是以使敌人一兵一卒，不得侵入国境为最高原则，英国亚尔夫来多氏说：「真正的国防，在于不使敌人上陆一步。」近代各国军事家亦多主张：「求战场必于国境之外，但这是要拥有强大的武力，例如美国今日的国防，以拥有优势的原子武器及陆海空军，当然可以采用此一最高原则，试看她东边的第一道防线在易北河，西边的第一道防线，在所谓「太平洋防线」，便可想而知。以我们今日的国防力量，自然谈不上采取此原则。惟依 国父的意见，则以采取守势作战击败侵入的敌军为原则。不过今日的国防观念，已由一国的自卫，扩大为一个集团的共同防卫，如欧洲的此利时、荷兰、卢森堡诸小国，由于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国，亦可以保其安全。不过一个国家总要能自强才可。第四项：「国防建设大纲」这是确定国防建设的依据、宗旨、实行的方法与步骤，及所必备的条件与程序，正如建国必须制定「建国大纲」一样。国父国防建设计划的整个内容，依于大纲草案可分别归纳为国防政治建设、国防经济建设、国防文化建设、国防军事建设四部门，并作简单的说明和研究如下：

## 一、国防政治建设

政治要以国防为中心，这是现代政治的趋势。倘若政治建设不合乎国防的要求，或失败的话，在平时足以招致国防的不安，到战时，尤足导致战争的失败。所以大纲中对于政治极为重视，故订有第五十三项：「国防与国权」，国权亦称主权，从事国防的建设，必须先求国家主权的独立完整，要能自由行使，不受人家的支配。第六项：「国防与宪法」，宪法是国家的大本，是说中华民国应建设为一个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俾能发挥全民的力量来建设国防，并使军事国防的进行，不受政治变动的影响。第八项：「国防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央政府之关系。」三民主义与国防的关系，略如上述。五权宪法乃为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建立一个万能政府，负责国防的建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于国防建设，应厘定职权，分工合作，且全体人员均要洁己奉公，增进效率。第三十项：「国防警察之训练」，用以防奸捕谍，维持国家治安，且可作为战时的预备军。第二十一项：「都市与乡村之国防计划」，是为建设全国都市与乡村的国防化。第五十二项：「国防与人口问题」。这是关于全国人口的生殖养育问题，在国防上所需要的是质优量多，但两者比较，质重于量。故应提倡国民体育，预防疾病，增进营养。第十八项：「移民东三省、新疆、西藏、内外蒙古各边省计划」，用政府力量，移民于西北边省，以解决本部人口的过剩，并得充实边疆，开发资源，巩固国防。第十九项：「保护海外各地华侨之意见书」，华侨为革命之母，向来对于祖国有很大贡献。故在国防上应尽量设法（或用外交或用海军）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在海外得以自由生存发展，不受人家的侮辱与宰制。还有第十七项：「外交之政策和战时外交之政策」，平时外交，在取得友邦的协调与援助，以利国防建设。战时外交在孤立敌人，争取与国，

以促进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确立有效的外交政策。总之，我们要尽量利用外交来达到我国防上的要求，却不可忽略外交的后盾——国防武力。

## 二、国防经济建设

经济为国防力之一环，现在一国的经济建设，已由国民经济发展到国防经济的阶段。关于国防经济的定义，据国防经济学者的见解，它是表现于下述的三种形态：第一、平时经济，作战争的准备，其主要目的，仍在满足一般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过渡时期经济，即在战争危机迫切的时候，实行各种准备战时经济的手段，如经济动员。第三、战时经济，即经济战争，主要在满足国防武力，国民经济的需要，及对敌实施经济战。在国防建设上，如果经济没有建设成功，则其它一切建设计划，将难完成，而国防经济的建设，要在完成军事的经济力量。国父说：「大德意志联邦成立之初，本来是农业国，后来变成工业国，因为工业发达，所以陆海军也随之强盛。」（民族主义第四讲）大纲上有第五项：「永远以国防军备充实建设，为立国之政策。」这是指示我们今后的经济建设要以国防军事为中心。第九项：「国防与实业计划之关系」，国父的实业计划，即属于国防经济——平时的国防经济，自然与战时有密切关系。第十项：「发展国防工业计划」，工业分为轻工业与重工业，我国今后对于工业的建设，应侧重于重工业，以便生产新武器，而加强国防军的战斗力。正如俾士麦说：「国防的基干是深植于工业繁荣的沃土中。」第十一项：「发展国防农业计划」，在实现全国粮食的自给自足，准备支持来日的长期战争。第十二项：「发展国防矿业计划」，在尽量开发各地矿产，如开采金银矿产，

以应财政上之需。开采煤、油、钢、锡、钨、锑、铝、铅、锌等矿产以供工业上之用。第十三项：「发展国防商业计划」，在使国内和国外的贸易活动，都在政府的管制之下，俾有助于国防力量的养成。例如奖励大量输入国防用品及重工业的器材原料，使一切国防上及重工业上之基本设施，得以尽速完成。而于奢侈品及非必需品则禁止输入，以节约外汇，但要注意的，必须禁绝奸商污吏的走私漏税。第十四项「发展国防交通计划」，为建设陆上水上空中各种交通网，以便国防上的通讯和运输。第十六项：「财政之整理」，这是 国父有感于当时财政的紊乱，不合乎国防的要求，故提出这个计划，在肃清贪污、确立制度、平衡收支、培养税源、增加收入，俾国防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 三、国防文化建设

文化力量在战争上亦可以取胜，与武力的比较，武力固可以取胜，但武力为保持其所获得的胜利，仍须继以文化的发扬。 国父说得好：「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出于武力发展，继之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民族主义第六讲）可是为发展文化，充实文化的力量，首在实现学校教育的国防化，但亦包括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国防化，旨在把每一个国民养成「国防人」，以参加国防工作及全民战争。第四十五项：「训练国防基本人才三千万计划，训练国防物质工程技术人才一千万计划」，这真是一个迫切而庞大的计划，在常人骤然看来，似乎近于吹牛，诚如现代国防部门之广，国防业务之繁，非养成这么多的人才莫辨，尤以战时国防各部门的动员需要人才更多，故不可不预为准备。第五十四项：「指导国民研究军事学问之研究」在增进

国民的军事常识及技能，其实施方式——或用演讲，或用通讯，或用图书仪器，或设立训练班，或设立各种协会如射击协会、防空协会来促成之。还有。第三十八项：「奖励国民关于国防物质科学发明之方略」，我们知道：科学是国防的基础。今日我国最感落后的就是科学，而欲发展科学，除普及科学教育外，还要奖励专家分途研究，多多发明。现在世界各国科学水平最高的国家，首推美国，科学研究机关，有如林立，不惜金钱的耗费，所以在二次大战中，终于完成了原子弹的发明。至于各国政府对于科学上有特殊贡献或发明的专家，奖予巨金，乃为常事，且有赐以爵位者，如意国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的获得侯爵，有享受国葬之礼者，如德国巴洛尼布氏的逝世，他是尼布可式图版的发明家，又为无线电传真的功劳者。且远在一八八二年陆巴特克福博士远赴印度，发现了虎疫的病原菌，回国时，威廉第二欢迎以凯旋将军之礼，科学坛上，一时传为佳话。国父说过：「恢复我们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外国的长处，就是科学。……如果能够迎头去学，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民族主义第六讲）确是真知灼见。

#### 四、国防军事建设

军事在国防上为重要的一环。上述政治、经济、文化诸部门均要与军事配合而并进。因为国防建设是准备战争，而军事战又是总体战的骨干，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简直无从巩固国防，参加现代战争。先谈军事教育，大纲中第二十六项：「军事教育之改革与训练计划」，我国军事教育向落人后，亟应改革，及树立健全的训练计划，以资养成优良的干部。第五十六项：「军人精神教育与物



质教育之比较」，两者比较，当以精神教育为重，尤以物质装备处于劣势的国军，更应以精神教育为重。第五十九项：「训练不败之海陆空军计划」，欲训练陆海空军成为战而不败的军队，确非易事，有待于优良教育的建设，使指挥官对于战略战术运用自如，士兵对于战斗技能极为娴熟，及全体官兵均有为主义而奋斗牺牲的决心。第三十六项：「遣派青年军校学生留学欧美各国，学习于各军事专门学校，及国防科学、物质工程专门学校之意见书。」此为深造青年学生成为专家来担当军事上或经济上的国防建设等任务。第四十一项：「聘请列强军事专门人员来华教练我海陆空军事学生，及教练国防物质技术工程之意见书」，这是「楚材晋用」的政策，因我国向来缺乏此项专才，故宜酌聘诸友邦，以为顾问或教官。

说到二十八项：「军制之改革」，是主张改革军队的建制及保育制度，以适应国防上的要求。第五十五项：「实施全国精兵政策」，是说今后的建军，应采取精兵主义，在平时兵额宜少不宜多，以免旷耗国帑。相反的，在战时却要求兵愈多愈好，兵多而素质又优良，战则必胜。这也是 国父主张采取「征兵制度」的理由。第四十八项：「组织海陆空军队之标准」，这是属于军队的编制问题。而军队编制的标准，则以拥有兵员兵器，及战术要求，敌军状态而定，且应不断提高标准。中国人做事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标准，在建军上尤应切戒。第二十九项：「军医之整理及改良军人卫生之建设计划」，孙子说过：「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故为维持军人的康健必须讲求改良卫生，而改良卫生，首在整理军医，及确立改良卫生建设计划。第三十一项：「军用禽兽之训练」，如骡马、军用鸽、军用犬

等的训练。第二十七项：「军器之改良计划」，第三十七项：「向列强定制各项海陆空新式兵器，如潜水艇、航空机、坦克炮车、军用飞艇、汽球等，为充实我国之精锐兵器，与仿制兵器之需。」第四十九项：「扩张汉阳兵工厂，如德国克虏伯炮厂之计划。」第五十八项：「我国之海军建舰计划、航空建机计划、陆军之各种新式枪炮战车及科学兵器机械兵器建造计划。」这都是关于兵器之改良，购买和制造的计划，在充实国军的新锐兵器，加强战斗力量。但为制造兵器，及供其它军事上之需，则要有种种工具，所以又有第三十九项：「购买各国军事书籍、军用品、军用科学仪器、军用交通器具、军用大小仪器等，以为整理之需。」还有第四十七项：「新兵器之标准」，这是说国军所用的新兵器，如陆军兵器、空军兵器、海军兵器、化学兵器等，均要有一定的标准，即新兵器的制式要一律，种类要单纯，自制的要有一定标准，外购的亦要有一定标准，以便战时补充。但以未来战争的长期，对于一切武器必须能够自制自给，外国的仅为过渡时期及供仿造而已。至于扩充汉阳兵工厂，如同德国克虏伯炮厂，不过举其一例，其它海空军等厂，亦当要与世界第一等强国并驾齐驱。第二十项：「各地军港、要塞、炮台、航空港之新建设计划」，这是军事建设上一个大规模的计划，工程浩大，需费亦巨。军港为海军根据地，航空港为空军航空根据地，要塞为筑城之一种，通常区分为：（一）陆地要塞，（二）江岸要塞，（三）海军要塞。炮台为设置炮位之所，要塞的一部。至于要塞的功用，在节省兵力，阻塞敌人，消耗敌人，疲困敌人，给予自己的军队以攻击敌人的适当机会。但我们则不可过信要塞的功用，如要认为我们已经构筑有强固的要塞，从此敌人便不敢来犯，那是错误的。世界顶有名的强固要塞，如比国的列日，法国的马奇

诺，英国的新加坡，曾经先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宣告她悲惨的命运，这真是我们一个最宝贵的教训。以上各项皆属国防军事建设计划。亦可分别归并于第二十二项：「发展海军建设计划」，第二十三项：「发展空军建设计划」，及第二十四项：「发展陆军建设计划」之内，这是无所不包的大军事建设计划。

其次，说到第二十五项：「作战计划」，孙子说：「多算胜，（算为作战计划——浴日注）少算不胜。」拿破仑说：「完备的计划为战争胜利之母。」近代各国的作战计划通常由参谋本部策定的，像有名的「史蒂芬计划」，便是德国参谋总长史蒂芬主持参谋本部时所预定的对法作战计划，德国于第一次欧战未能攻下巴黎，打败法国，是因小毛奇没有澈底执行这个计划的错误。二次欧洲大战希特勒的打败法国，也是根据着「史蒂芬计划」而变化运用。可见作战计划在国防上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作战计划」，虽可以解释它包括政治作战、经济作战、文化作战及军事作战等计划，仍以专指军事的作战计划而言为恰当，如陆军作战计划、海军作战计划、空军作战计划、及陆海空军联合作战计划。还有第三十四项：「举行全国总动员之大演习计划，与全国海陆空军队国防攻守战术之大操演。」动员的原意，是最初步的军事行动，亦即最末一次的军事准备，也可以说是建军（装备）的准备完成与作战（集中）的运动的开始。于此足见动员最初的范围，是限于军队的装备，但自普法战争后，动员范围已逐渐扩大，直至第一次欧洲大战，其范围更加扩大，便有全国总动员之说。所谓全国总动员，即包括军事动员与民事动员两部。民事动员，日本称为「国家总动员」，即除军事外之全国动员。所谓全国总动员演习，系在平时将所编成的动员

计划加以实地演习，错误发生即予改正，并求熟则生巧，俾到真正动员的时候，得以迅速确实，为完成全国总动员的准备，以便战时立刻实现全国的总动员。

以上各部门的国防计划，国父原拟假以十年的长期间来完成其重要建设的，故大纲中有「完成十年国防重要建设计划一览表」的第四十六项，不过以科学落后，国防基础薄弱的我国，欲使其变为世界第一等强国，守必固，攻必取，则非十年所可奏效，十年之后，仍须来无数个十年。正如德皇威廉第二所说：「国防是永远做不完的怪物，改善和增进，亦同样的无止境。」虽说威廉的国防观是侵略的，但我们为自卫计，亦须不断地建设下去，因为世界各国的国防建设，有进无止，科学的进步，亦一日千里，倘若我们自甘落后，或中着「一劳永逸」之毒，则所建设的国防，必不足以适应将来战争的要求，无法逃避亡国灭种的命运。所以国父在大纲的第五项中定有「制定永远国防政策」。国父说过：「所谓无敌国外患，是自己心理上觉得没有外患，自以为很安全，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外人不来侵犯，可以不必讲国防，所以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国。」（民族主义第五讲）这也是说国防要作不断的建设的。

此外，第三十三项：「仿效各国最新国防建设计划」，此为取长补短，但须经过消化，可归并于上述四大部门之内。关于国防建设的机构，国父主张设置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国防本部（第三十二项）及召集各种国防会议（第二十五项及第五十项）以为整理国防建设及设计之资。

总之，中国为世界的一环，中国不能离开世界而闭关自守，所以为建设中国的国防，或确立有效的国防计划，固然要「知己」，

更要「知彼」，即要明了国际形势，列强虚实，及其对我态度，谋我奸计。所以大纲中有第四十项：「组织考察世界各国军备建设团之意见书」，第五十七项：「注重国际军备之状态」，第七项：「太平洋国际政治问题与中国」，第六十项：「列强之远东远征海陆空军与我国国防」，第四十三项：「我国与各国国防实力比较表」，第六十一项：「各国富强之研究」，及第五十一项：「欧战战后之经验」，这一项所谓「欧战」，系指第一次欧战而言，今日我们是要进而接受二次欧战及韩战的经验了。但在国防建设上，则不能只是根据今天战争的经验，而忽略了未来战争的远景。

《司马法》说：「国虽强，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是教示我们不可好战，却不可松懈了国防的建设，所以我们在战时要积极建设国防，就是平时也一样要积极建设国防。我们因为过去国防力量的薄弱，所以一遇日本的侵略，只得且战且退。胜利后，未遑建设新的国防力量，又遇俄帝侵略，共产倡乱，大陆沦亡，赤祸蔓延，言念及此，殊可痛恨！今我政府已决意一切从台湾做起，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他日反攻胜利，务须根据国父这个宝贵的遗教，斟酌实际需要，详订实施计划，淬励奋斗，实践力行，使我国防日臻强固，永无外患的侵袭，并维持世界的和平。

## 四、战争与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慈氏的名言，根据克氏的意见，战争为政治的手段，用以贯澈政治目的之手段。前面说过，国父是受着克氏学说的影响的，但克氏是为战争而战争，却不问政治目的的好坏，国父却是为革命而战争，有着伟大的政治理想，这是国父比克氏进步得多了。近代战争是要求政治家要懂得军事，军事家要懂得政治，否则，便不能密切配合，尤以军事是政治的一部门，为政者非懂得战略不可。国父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军事家，这是他伟大的所在，也是我们的楷模。

内政与外交为政治的两大形态，关系战争的胜败所在。倘若内政与外交俱不配合战争，甚至背道而驰，非导致战争失败不可。在这里，我且把国父关于战争与政治的言论亦即战时政治的言论，分为内政与外交两方面来研究。

### 一、内政方面

战争所要求于内政，最要紧的是举国团结一致。因为举国上下及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才可以构成强大的力量，协助战争，支持战争。国父说：「中国现在时势，在危险时代，如各自为谋，不以国家为前提，无论外人虎视眈眈，瓜分之祸，危在眉睫。即使人不我谋，而离心离德，亦难有成。是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觊觎。」（「谋建设须扫除旧思想」讲词）又说：「大敌当前，而内纷不息，事甚无谓，文已电同志，俾泯猜虑，并求事实上之一致。……务严约束，勿复生衅，庶

几同心戮力，共伸天讨。」（「致岑春煊协力讨袁电」）同样在对外战争时，更要促成国内的团结一致，能如是，方不致发生无谓的磨擦，以互相抵销，更不会被人挑拨离间，以自相分裂。国父于民元目击帝俄侵略我外蒙古，便发表「钱币革命通电」，主张对俄抗战说：「故举国一致，誓死靡他也。」这真是我们今日反共抗俄的箴言。

「足食」、「足兵」亦为战时内政的要项，关于足食方面，留待下篇论述。关于足兵方面，在反共抗俄的今日，亟应实行国父向所主张的「征兵制度」，做到人人能战，使台湾成为一个现代「斯巴达」。

要之，不管为谋举国一致，或足食足兵，在内政上首要树立「万能政府」（见民权主义，为民主政治的核心），以为领导和推动战争。又战争所需要全国人民的「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更要有取得人民信仰与拥戴的「万能政府」。要之，战时内政至为繁重，措施的适宜与否，往往足以影响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所以一个战时政府是不能充斥着无能之辈，贪污之流的。其次，战时政府是要实行集权的，人民的一切都要受其管制。（但在今日民主时代，应有限度的）国父说：「譬如今次之世界大战，凡参加此战争之国，无论共和君主，皆一律停止宪政，行军政，向来人民之行动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皆剥夺之，并且饮食营业，皆归政府支配，而举国无有异议，且献其身命为国家作牺牲，以其目的在战胜而图存也。」（《孙文学说》第六章）

## 二、外交方面

外交与军事本为「难兄难弟」，在战争未爆发之前，外交可代替军事，战争一经爆发之后，外交就要协助军事。第一次欧战方酣之际，南非斯末资将军曾说过：「这次战争不仅是单纯的武力角逐，如果我们要把握住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运用外交，如运用其它国力一样。当我们协约国达到满意的和平时，我们最高理想的实现，不仅依赖军事行动，还须凭借外交利器。」战时外交的重要性，于此可见。在普法战争中，普之胜法，固胜于色当一役，亦由于俾士麦和英联奥及对俄调协，使法国陷于孤立，以协助军事。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意之胜英，虽胜于苏费立倭一役，亦由于加富尔运外交手段，联法联英，及对普亲善，得以全力对付奥国，这是两大显著的例证。

国父是一个大革命家，也是一个大外交家，彼在推翻满清的革命战争中，奔走海外，联络友邦，用能博得国际同情，取得国际援助。当在美国听得武昌起义的捷讯，本拟由太平洋潜行返国，亲与革命之战，继念「吾党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大也。」（《自传》）遂起程赴英，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停止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归国。此三事均得英政府允许，方取道法国东归。民国以来，于讨贼各役中，亦莫不运用外交以佐之，藉孤奸贼之势，并取得国际间的援助。又如民十二在广州收回关余，以充北伐经费，北京使团竟令外舰集中省河，百端恫吓，国父从容应付，据理力争，卒达目的。民十三广州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利用商团公然叛变，英领且为张目，致国民政府以哀的



美敦书，阻止政府戡乱，国父乃向英政府提出抗议，卒使英舰不敢妄动，而英领亦因此去职。还有民十二由于联俄，亦促进了北伐初期的发展。

以上是国父外交战成功的事实。其次国父欲本其外交知识经验，著作《外交政策》一书，虽未完成，而关于外交言论，散见于遗教中颇多。民族主义第五讲说：「用政治力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兵力是用枪炮，他们用枪炮来，我们还知道要抵抗，如果用外交，祇要一张纸和一枝笔，用一张纸和一枝笔，亡了中国，我们便不知道抵抗。在华盛顿会议的时候，中国虽然派了代表，所议关于中国之事，表面都说为中国谋利益，但是华盛顿散会不久，各国报纸便有共管之说发生。此共管之说，以后必一日进步一日，各国之处心积虑，必想一个很完全的方法来亡中国。他们以后的方法，不必要动陆军，不要开兵船，祇要用一张纸和一枝笔，彼此妥协，便可以亡中国。如果动陆军开兵船，还要十天或四五十天，才可以亡中国。至于用妥协的方法，祇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边，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签字是一朝，所以用妥协的方法来亡中国，祇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譬如从前的波兰，是俄国、德国、奥国瓜分了的，他们从前瓜分波兰的情形，是由于彼此一朝协商妥协之后，波兰便亡。照这个先例，如果英、法、美、日几个强国，一朝妥协之后，中国也要灭亡。」这是说军事与外交同属政治力的手段，而其「不战而屈」的外交手段，尤为可怕。「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的讲词里就革命战争中的外交说：「革命的成功与否，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起来，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外交力帮助武力，好像左手帮助右

手一样。从前美国独立，革英国的命，所以成功的原因，一半固然由于本国武力的血战，但一半可以说是由法国外交力的智助。如果专靠武力，决是难于成功的。譬如洪秀全革命，由广西打过湖南、湖北、以至建都南京，而终不能成功的原因，大半是由于外交失败，没有外交力的帮助（致招英国戈登帮助满清亲自带兵去打苏州——浴日注），所以革命的成功与否，外交的关系是很重大的。」至于军事的进展亦足以给予外交有利的影响。国父自美洲致邓泽如先生的信说：「经羊城一役之后，外交亦易入手。弟曾着人直说美国政府，皆大表同情。今已使人往英，以说彼中权要，想必能得当。法国政府，则向已有通情者也。如是吾党今日可决英美法三国政府，必乐观吾党之成事，则再举之日，必无藉端干涉之举，且必能力阻他国之干涉也。此又外交之路，因羊城之影响而收效果者也。」

国父认为外交在对外关系上是很重要的，又认为一国对外应先外交手段，然后用战争手段，亦足见维护国际和平的精神。他说：「国家既不可以长从事于战争，而对外国之关系则有日增无日减。于此关系日密之际，不能用战争以求达其存在发达之目的，则必求其它之手段，所谓外交者由是而发生。凡国家之国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战争既毕，仍当复于外交之序。故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然用外交手段之时多战争手段之时少，外交手段者通常之轨则，战争手段者不得已而用之。不得已云者，外交手段既尽，无可如何之谓也。」这个外交思潮，正渊源于孙子所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

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于此我们要注意的，不论在平时或战时，为求外交的胜利，须以国内的一致团结为基础。国父说：「夫欲求外交之胜利，必先谋内政之修明。今内部既分裂如是，何能得国际之承认。……倘西南各省，一致拥戴军政府，承认大元帅，则国内团结既固，对外发言效力自强，断不患外交团之否认，及交涉之不胜利也。」（「致贵阳王文华、刘显世电」）又说：「外交恃内政，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学生要努力宣传担当革命的重任」讲词）又说：「内政不清，外交益多荆棘。有谓外交运用得宜，则内政可徐图改善者，此实未窥见外患之来，由于内隙耳。」（「覆王廷论外交与内政关系函」）可见两者的关系。

国父在外交上一向反对满清时代李鸿章所采取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国存亡问题」）他所厘定的民二国民党政见宣言说：「外交微奥，有应事发生者，未可预定，亦难说明。」却很具体地提出两个基本方针：一曰联络素日亲厚与国，（亦即「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鬪」）一曰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该宣言说：「惟外交方针，则可约略言之：一曰联络素日亲厚与国：今国于世界，孤立无助，实为险象。故必当联络素日亲厚之与国，或缔协约，或结同盟，或一国，或数国，俱为当时之妙用。一曰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吾国现势，非致力对外之时，故宜维持列国对我素持之主义，使之相承不变，而得专心于内政之整理。」亦即前者为与利害相关的国家结成同盟，以取得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援助。后者为维持中立国家素日对我所采取的公平主义，如尊重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维护我国之反抗侵略运动等，使之相承

不变。惟在反共抗俄的今日，不祇要维持之，还要发展之，我们应利用外交来孤立敌人，增强自己，促进战争的胜利。

其次，为使外交运用得宜，争取外交战的胜利：

第一、要明了情况：民二国民党政见宣言说：「当吾国之积弱，非善用外交，不足以求存。然欲运用外交，非具世界之眼光，不足以尽其用。中国向来外交，无往而不失败，盖以不知国际上相互之关系，一遇外人虚声恫吓，即惟有让步之一法，是诚可伤心者也。」尤以办理战时外交，更要洞识当时各国千变万化的实情，及国际间复杂错综的利害关系，因此必须建立健全的外交情报网，以求「知己知彼」，才能确立有效的对策。

第二、要争取自主：一国的外交，不宜媚外，亦不必畏外，不宜盲从人家，亦不可附庸人家，一定要独立自主，尤以战时外交为然。正如 国父说：「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中国存亡问题」）方能操纵自如，争取胜利。又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彼不能保其自主之精神，何取乎有此国家乎？……中国欲于此危疑之交，免灭亡之患，亦惟自存其独立不屈之精神而已。」

（全）又说：「吾国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后，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与得失之所在，殊可叹也。今后吾国之外交，对于海军国，固当注重，然对于欧亚大陆之俄德二国，更不能不特殊留意，不宜盲从他国，致为人利用也。」（「外交上应取的态度」谈话）又说：「中国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为外国人废除不平等条约，必须要中国有力量，如果中国一日没有力量，那些旧约便一日不能废除。这个道理，殊不尽然。要问外国能不能废除旧条约，就要问我们有没有决心去力争。如果大家决心去力争，那些条约便可以废除，好像

最近的华盛顿会议，外国人便主张放松，从前的凯马契约，外国人也主张实行。我们中国人都是不争，都是不要。假若全国国民一致要求，这种目的，一定可以达到的。」（「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讲词）其强调外交自主的精神可见。我国过去抗战的外交，即由于能够发扬 国父这个遗教，独立自主，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行中途妥协，故能争取最后的胜利。在今后反共抗俄的战争中，更应如此。

第三、要把握利害：国与国间的分合，系以利害为前提，其合由于利害的相同，其分由于利害的冲突，绝不是感情道义所可维系，必须有着利害关系，然后才有感情道义可言，尤以战时外交为然。英国人说：「英国无永久之友，亦无永久之敌，只有英国之利益。」孙子说：「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真是道破外交的真形。 国父在外交上向重信义和道德，但对现实的外交则重视利害。他说：「夫两国之联盟，匪以其条约而有效者也，真正原因，乃在其利害之共同。英国本无急切与德国冲突之必要，业如前章所已言。此次交战，既不能达摧抑最强国之目的，英国为保其存在，不得不弃所欲得之利益，以保其所已得之利益，而德国苟以英国之助，得其所欲得之利益，即为利害共同，而联盟之事自生。譬诸意大利，本与法为近属，且得法之助以立国。而一旦争非洲北岸之地，与德、英有共同利害，则加入三国同盟以敌法。及其战士以后，利害与奥冲突，而对法缓和，则又复活其同种之感情，与建国之旧恩。故知国际恩怨要约。两不可恃。同种云者，亦不过使利害易共同之一条件，其它感情上之事实，随时而变更，非可规律久远之政策也。欲两国之真正利害共同，必能有割舍

之决心。所谓协调者，各着眼于永久之计划，于将来两国发展所必须者以交让行之。……世人有疑此者，请视日俄，日俄以倾国之力相搏，事才十截，日俄之宣战，距朴次茅斯条约，不过八年有余，日俄媾和之际，吾在东京，亲见市民狂热，攻小村和议特使为卖国，以桂总理为无能。焚警舍，击吏人，卒倒内阁，舆论未闻有赞成和议者，曾几何时，而人人以狂热欢迎俄人之捷报。夫感情随事而逝，亦随事而生，一国当时之外交，必决诸恒久之利害，决不能以暂时之感情判之，以日俄之前事，可以判英德之将来矣。」

（「中国存亡问题」）再说：「大凡立国必须与利害相关之国，携手进行，方能进步，利害不相关之国，纵彼欲与我相亲，但是不可以与之亲近者。从前满清政府……不知利害相关的道理，纯是远交近攻之政策。……一经亲俄，天山以西帕米尔高原一带，已非我有，延至今日，蒙古又将不见了，这就是利害不相关之国相亲之害。……今日谋巩固中华民国，必须注重外交。」（「学生须以革命精神努力学问」讲词）所以我们在现实的外交上，一定要透视和把握着彼此间的利害，依此而讲求应付之方，自可迎刃而解，尤以战时外交为然。

最后，近世以来，世界各国的善用外交者，莫如英、德，英国在第一次欧战中，既把德国的盟友意大利拉过来，又把中立国的美利坚卷入漩涡，并肩作战，卒收战胜之果。但在二次欧战之初，因对俄外交的失败，使德国得以大胆发动西线之战，而自己遂罹重大的损失。

德国在二次欧战中，既联意以制法，又联俄以避免东西两面作战之苦，而得集中力量解决西线各国，旋转锋攻俄，欲求速战速

决，但因赫斯飞英的失败，遂使攻俄之战一败再败，至于亡国，于此，足见战时外交运用的困难，但根本的原因，实由他们外交政策的错误，弄至无法补救。今日我们反共抗俄，国际形势虽是对我日益有利，但我们还要善用外交，外交将给予我们无限的助力，外交将促进我们战争的胜利。

## 五、战争与经济

经济是军事的基础，足以决定战争的继续，亦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败。其表现于古代战争上，已相当显著，《孙子兵法》一书是两千多年前的著作，其中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惟现代战时经济的动员则非古代局部的动员可比，它是要彻底地由平时经济体制改变为战时经济体制，即整个的动员，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

在 国父遗教中，关于战争与经济及其有关言论很多，我在这里姑分为——财政、工业、粮食这三方面来研究：

### 一、财政方面

近代战争是金钱的大需要者，也是金钱的大量消耗者，简直成为天文学上的数字。像普法战争，双方的战费共计美金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日俄战费共计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共计二〇八、三〇八、〇〇〇、〇〇〇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共计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所以近代战时的支出，尤其是长期战争的支出，不是任何财政学者于事前所预想得到的，这个原因是由于：一、动员人数的庞大，二、军需品消耗的增加，三、物价的上涨，及战时各种新事业的举办。

德国经济学家说：「战争的决胜，是决定于剑，也是决定于金，尤其是金在战争的进行中及终结时更表演着不可轻视的作用。」日人中泽三夫在其所著《战争》一书曾慨叹道：「日俄战



争……日本的现金准备，仅有一亿余元，所以在讲和会议上，不能强硬主张我意志的原因，不外为财政困难所压迫，真的金钱为战争所不可缺之一。」所以一国的对外战争为赢得胜利，在财政上应作充分的准备，及战时的彻底动员。

国父在倒清的革命战争中，关于军费的需要，其解决的办法，是采取募捐、借债及发行军用票等项，就中以获得华侨的捐助为多，不过当时所需要的数字并不大。国父于推翻满清之后，不久，适逢帝俄虎视眈眈，欲并吞我外蒙古，这时国父极力主张对俄抗战，并主张「钱币革命」，即以「纸币代金银」，以解决对俄抗战的财政困难问题，他说：「第一、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今日我之不能言战者，无过于财政困难。自南北统一后，则谋借外债，以救我金融之恐慌。然至今六国之借款无成，若一有战事，则更复无望。然则就财政上言之，无论有战无战，财政问题之当解决，必不容缓也。文于谋革命时，即已注意于此，定为革命首要之图。乃至武昌起义，各省不约而同，寝而北军赞和，清帝退位，推行之顺适，回出意外，故所定方略，百未施一。民国大定后，财政虽困，以为皆可以习惯之常理常法以解决之，便不欲以非常之事而惊国人也。不图借债无成，而俄祸又起，存亡所关，不能不出非常之策以应之也。钱币之革命者何？现在金融恐慌，常人皆以为我国今日必较昔日穷乏，其实不然，我之财力如故，出产有加，其所以成此穷困之象者，则钱币之不足也，钱币为何？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此代表之物，在工业未发达之国，多以金钱为之，其在工商已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钱千百万倍，则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

如金银之夺往昔之布帛刀贝之用。……由此观之，纸币之行用有方，流弊不生即如彼，而利益之大又如此，况值非常之变，非先解决财政问题，必不能言战。乃有热血之士，徒责政府之无能，而不为设身代想，殊不共谅当局人为难之甚也。当此强邻迫处，蚕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壮语所能抵御，非有实力之对待不可，是宜政府与人民同心同德，协力进行钱币革命，以救今日之。」（「钱币革命通电」）

本来在欧美各国早已实行币制革命，而 国父这个伟大的主张，直至民国二十四年方得实现，即所谓「法币政策」的成功，（禁止纸币兑现，白银收归国有，并规定以中、中、交、农四行的钞票为法币）过去抗战之所以能够持久，端赖财政支持的力量，实行法币政策的结果，亦即实行 国父素所主张钱币革命的结果。虽说当时通货膨胀达于极点，却能支持至于胜利，并未拖垮战争，这不能不算是不幸中之幸。

国父说：「倘财政之困难能解决，则军事敢说必有把握。」（民十二「覆叶某囑解决东征军费函」）可见他对战时财政的重视，及财政影响军事之大。又说：「此后外部，完全不成问题，所有的还是内部问题，这个内部问题，简单的说，就是财政问题。」（「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讲词）又说：「政府为担负这样多的军饷，财政是很困虽的。……这个银行之所以能够开办，就是因为借了外国资本一千万，……发行纸币，要维持这种纸币的信用，便要商界、工界、农界和政界、军界同力合作，来培植这种鸡母和谷种的发达，使可以生出许多鸡蛋和新谷，这种鸡蛋和新谷，又可以再做种子，再生出鸡母来生蛋，再长成新谷来做米，这种丛生不

绝的生长，是毫无止境的，是毫无限量的。到了那个时候，军界和政界便不怕穷，工商界和一切人民，便不怕没有资本，这个银行更是利益无穷。」（「银行最高的信用是现兑」讲词）这是 国父迫不得已借外债来开设银行发行纸币以供军用的，凡此均可见国父决战时财政的苦心。

此外 国父在财政上主张征收直接税说：「资本家的入息极多，国家直接征税，所谓多取之不为虐。从前旧税法，只是钱粮和关税两种，行那种税法，就是国家的财源，完全取于一般平民，资本家对于国家，只享权利，毫不尽义务，那是很不公平的。德国、英国老早发现这种不公平的事实，所以他们老早便行直接征税的方法。德国政府的岁入，由所得税和遗产税而来的，占全国收入约自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英国政府关于这种收入，在上次欧战开始的时候，也到百分之五十八（按英国在欧战期间，所得税收入增加七倍，遗产税增加二倍——浴日注）。美国实行这种税法，较为落后，在十年之前，才有这种法律，自有了这种法律以后，国家的收入，便年年大形增加，在一九一八年，专就所得税一项的收入而论，便约有美金四十万万元。」（民生主义第一讲） 国父这个主张，直至七七事变我政府于同月廿一日颁直接税暂行条例，八月廿二日公布施行细则，方树立了「直接税体系」，使租税重心，由间接税移于直接税，因而增加收入，支持长期的抗战。

依于上述足见 国父对战费的筹措，是采用发行、增税、借债及募捐等办法，正与现代各国战时财政政策相符。今日我们反共抗俄，在财政上虽感不足，地方券额内外发行将达五亿元，但币值相当稳定，税收亦有增加，且得源源而来的美援——经济援助、军用

援助，其基础颇属巩固。不过还要彻底动员，促进生产，节约消费，鼓励国民捐献，海外华侨输将，及博取更多的美援，方能配合反攻大陆的要求。于此应附带一提的：因为战时社会的动荡，物价的高涨，生活的困难，每易使财务人员营私舞弊，侵吞中饱的，故必须澈底厉行 国父向所主张「实行惩戒官吏失职」（「国民党政见宣言」）的政策，以肃清贪污，使财界明朗化，做到涓滴归公，这样自可提高政府的威信，而博得人民的信仰与拥戴。鲁登道夫将军说：「人民既为国家而牺牲其金钱，则战时公债一丝一毫，应用之于公，而不应用之于私，应用之于国事，不应以之肥私囊。若有侵吞公款之行为，无异于政府自为盗贼，掠夺民财，其应防止之也，自不待论。世界大战中德人之应募公债者，既为牺牲一己，原期于维持民族生存，而其结果如何乎？由世界大战之经验观之，惟肃清政治上之弊窦，然后能保国民之一致团结，此在财政上尤为重要。」

## 二、工业方面

工业在现代战争上，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财政。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所以能屡建奇勋。主要的是得力于本国工业的发达，德国的领土虽然狭小，但在很小的领土之内，能建立庞大的军队，与敌国作战达数年之久，就是赖于工业上能够供给德军所需要的步枪、大炮、机关枪、飞机和技术。又如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能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也是由于平时工业的发达，一到战时，便能大规模动员，生产大炮、飞机、坦克等精锐武器来源源接济各盟国作为反攻轴心国家之用，尤以原子弹的发明为美国科学与工业上的一大成功。

中国工业的落后，由来已然。所以，国父于上李鸿章书中便提出发展工业的主张说：「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民国以来，更倡导不遗余力，因有《实业计划》一书的发表，同时目击国内质本、工具及人才的缺乏，认为欲发展中国工业应求助于外国。他说：「欧、美二洲之工业发达，早于中国百年，今欲于甚短时期内追及之，须用其资本，用其机器。若外国资本不可得，至少亦须用其专家、发明家，以为吾国制造机器。无论如何，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实业计划》第五计划）又说：「吾国既有天然之富源，无量之工人，极大之市场，倘能藉此机会，而利用欧美战后之机器与人才，则数年之后，吾国实业之发达，亦能并驾欧美矣。」（《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一文）然此非我的创举，外国亦复如是。国父说：「俄国之制造厂、兵工厂，皆用英、美人为之，日本、意大利两国，其关于制造事业，亦多由英人主持。」（「欢迎外资与门户开放」讲词）惟主权要操之于我，方不致受外人的宰制。国父说：「鄙人主张用外人办理工商事业，及订立一定之期限，届期由我收赎，并非利权永远落于他人之手也。」（全）又说：「倘知此为兴国之要图，为救亡之急务，而能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孙文学说》第七章）可是欲发展工业，必须同时发展矿业，如煤铁等，因为煤、铁同为近代工业的两大原料，没有钢铁，则陆海空兵器，无从制造；没有煤炭，则

一切军需工厂的机器亦无从发动。至于石油的开采亦至必要，倘若缺乏石油，则在工业上所生产的兵器如飞机、坦克、兵舰等，均无从活动，变成死物。所以 国父在《实业计划》上，亦计划大规模发展石油矿业。虽说《实业计划》为平时工业建设的计划，但平时工业，为战时工业的基础，亦即战时工业的准备。平时工业尤以重工业没有发达，一遇战时的动员就要捉襟见肘，无从适应战争的需求。现在欧美各国的战时工业大半寄托于和平工业之中，因为和平工业可以改变为战争工业，例如商船厂可以改制兵舰，汽车厂可以改造飞机发动机，火车厂可以改造大炮，普通机器厂可以改造步枪机关枪，造纸厂可以改造抛射药，颜料厂可以改造炸药，造币厂压片厂可以改造枪炮弹壳等。同样战争工业亦可以改变为和平工业，国父说：「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辗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车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和平器具。」（《实业计划绪言》）可见 国父提倡发展中国工业的用意。

国父说：「军器一门，我们从前用是弓箭刀枪，试问现代战争，能用不能用？试问现代战争，不用外国枪炮，能胜不能？」（「同胞要同心协力做建设事业」讲词）又说：「由于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便知到从前的弓箭刀枪，不能够和外国洋枪大炮相抵抗。」（民权主义第五讲）又说：「德意志联邦，成立之初，本来是农业国，后来变成工业国，因为工业发达，所以陆海军也随之强盛。」（民族主义第四讲）这是说战争与兵器的关系，兵器与工业的关系。今日台湾的工业力量还是很薄弱的。如为配合将来反攻大陆的要求，必须遵照 国父的遗训，动员工业，发展工

业，并欢迎外商投资。一面大量生产武器，另一面争取更多的「军援」。

### 三、粮食方面

粮食影响于战争的重大，由来已然。唐将张巡孤守睢阳，屡战屡胜，终因「罗掘俱穷」，为敌所破。在此以前，像历史家陈寿所撰《诸葛亮传》说：「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粮尽而还。……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得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在此以前，孙子主张：「困粮于敌」，及强调：「军无粮食则亡」。又如拿破仑的天才，当作战的时候，遇有粮食问题者，必痛斥以「不要谈粮食」，因犯有这种疏忽，终不免惨败于莫斯科的饥寒交迫之中。以上系就军粮而说，至于民粮亦有同样的重要，德国在第一次欧战中，因粮食的恐慌，弄得人民个个吃不饱，暴动遍于全国，便促成德国崩坏了。有人说：「粮食是战争的生命。」又有人说：「粮食是决定战争支持力的因素，又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实非虚语。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向以农立国，对于粮食本可自给自足。可是因为地利未尽，及运输不便，而人口却一天一天的增加，故年丰而太平时，尚可自给，一遇岁歉而战乱时，就不免发生恐慌。考我国粮食仰给外国由来已久，如唐书陈懋仁的《泉南笔记》，就有洋米输入的记载。近百年来，因天灾人祸的交煎，尤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我粮食愈不能自给，每年仰给于洋米为数甚巨(如民十九年达二千万石左右)。国父早见及此，于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地尽其利」的「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为「富强大经，

治国大本。」于民生主义里又强调：「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又说：「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吃饭问题不能解决，民生主义便没法解决。」可见他对粮食问题的注意。又在全主义里说明粮食与战争的关系，举第一次欧战中德国为例证说：「未经欧战以前，各国政治家总没有注意到吃饭问题，在这十年之中，我们留心欧战的人，研究到德国为甚么失败呢？正当欧战剧烈的时候，德国都是打胜仗，凡是两军交锋，无论是陆军的步兵、炮队和骑兵队，海里的驱逐舰、潜水艇和一切战斗舰，空中的飞机、飞艇，都是德国战胜，自始至终，德国都没有打过败仗。但是欧战结果，德国终归于大败，这是甚么原因呢？德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吃饭问题。因为德国的海口，都被联军封锁，国内粮食，逐渐缺乏，全国人民和士兵都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终归失败，可见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德国的粮食，在平时已经是不够，当欧战时候，许多农民都去当兵士，生产减少，粮食更是不够。所以大战四年，归到结果，便是失败。由此可见全国的吃饭问题是很重要的。」（第三讲）

可是欲求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必须从增加生产方面着手，国父在民生主义里指示我们七个增加生产的方法，即机器、肥料、换种、除害、制造、运送、防灾等问题，兹分别摘要说明如下：

1. 机器问题——用机器耕田，生产可加一倍，费用可轻十倍或百倍。用机器抽水来灌溉田地，非常便利。

2. 肥料问题——用化学方法来制造肥料，用电来造人工硝，用水力来造便宜的电，农业生产，自然可以增加。



3. 换种问题——用交换种子方法，使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产力可以增加。

4. 除害问题——（一）植物的害——用科学方法除去秕草和利用秕草。（二）动物的害——用国家力量，研究除害虫方法。

5. 制造问题——（一）中国制造方法：晒干，腌咸。（二）外国制造方法：将食物煮熟，或烘热，制为罐头。

6. 运输问题——（一）运输不便的损失：中国财富无形中因运输不便而消耗者甚大，过剩的生产成为废物，如极重要的粮食，时常因运输不通，而使吃饭问题不能解决。（二）解决运输粮食的问题：（1）水运：恢复运河制度。原有的修理，未来的开辟。海上运输，更是要用大轮船。（2）铁路：到处联络起来，各处人民便有便宜饭吃。（3）车路：穷乡僻壤，通自动车，以救铁路之穷。（4）挑夫：虽不经济，但自动车不能行的地方也可以补救。

7. 防灾问题——（一）水灾：（1）治标方法——浚河、筑堤、大水不至泛滥。（2）治本方法——多种森林蓄积大量的水。（二）旱灾：（1）治标方法——机器抽水，用于地势高水源少的地方。（2）治本方法——种植森林蓄积大量的水。

其次说到粮食消费的管理：国父于手订「地方自治开始实行之法」第二事的「立机关」中，又主张设置「粮食管理局」，实行粮食公卖，其所订办法是：「粮食一类，当有地方公局买卖，对于人民需要之食物，永定最廉之价，使自耕自食之外，余人得按口购粮，不准转卖图利，地方余粮则由分局转运，售卖于外。」于此足证明 国父对粮食消费，是主张采取管理政策的，在战时尤为必

要。这样，自可杜绝地主奸商的囤积居奇，而粮价得以安定。现代世界各国在战时对于粮食的消费都是采取管理政策，第一次欧战中各参战国如此，二次欧战中各参战国也是如此。国父关于第一次欧战德民粮食消费管理的效果，曾有如下的说明：「近代国家之行民生政策者，以德国之组织为最进步，而此次欧战一开，则德国海面被英封禁，粮食时虞竭乏，社会忽起恐慌，人民备受种种之痛苦。至两年以后，乃始任巴特基氏为全国粮食总监，巴氏乃用科学之法，以经理粮食，而竭乏之事，始得无虞，恐慌之事渐息，而人民之痛苦亦渐减，由德国乃能再支持二年之久，否则早已绝粮而降服矣。」（《孙文学说》第一章）今日我政府在台湾已实行粮食管理政策，年产粮食一百五十四万吨，已超过日据时代年产一百四十万吨之最高纪录。故粮价相当稳定，倘能再加改善，粮价更可持平，可见 国父政策的正确。

第一次欧战时，英人特奈尔氏上书英国首相路易乔治说：「我们根本的错误，就是以为粮食不是战争的军器，而农村不是兵工厂。」真的战时生产粮食的「兵工厂」与制造枪炮的兵工厂有着同等重要。所以我们今日在台湾，由于粮食的充裕，军民吃饭问题的解决，我们不要忘记终岁勤劳的农民，农民在后方流汗的贡献，其功并不下于前方流血的士兵。不过为使农民高兴去耕田，提高他们生产的兴趣，还得实行国父这个伟大的遗教：「中国的粮食生产既然是靠农民，中国的农民又是很辛苦勤劳，所以中国要增加粮食的生产，便要在法律政治上制出种种规定，来保护农民。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

平的。我们要增加粮食生产，便要规定法律，对于农民的权利，有一种鼓励，有一种保障，让农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障农民的权利，要怎么样令农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关于平均地权的问题。前几天我们国民党在这高师学校，开了一个农民联欢大会，做农民的运动，不过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点。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民生主义第三讲）现我政府在台湾已根据 国父这个遗教，实行「三七五减租」，以保障农民利益，并使多得收成。至于「耕者有其」，亦正作初步的实施，例如年来公地由放租到放领，又采取限田政策，即将实施「扶植自耕农条例」，其顾及广大农民的利益如此，自可争取他们来支持反共抗俄的战争。

此外，关于对敌经济作战，在遗教中，我发现他提过二个方式：一为经济封锁，一为经济绝交（均见《三民主义》）。现就经济封锁稍加说明：经济作战最有效的力式，就是海军封锁，即直接封锁敌国的海洋交通，以断其对外贸易关系，但须有强大的海军来执行。第一次欧战开始后，英国即以海军主力控置北海，封锁了斯干的那维亚半岛，使货物不能经过荷兰、丹麦与挪威输入德国，举凡是否战时违禁品，只要是输入德国的，或德国输出的，都被没收，使德国经济起了极度恐慌。同时德国对协约国，尤其是英国，也施以经济封锁的报复，但因德国海军力量不够，不能同英国一样的作水上封锁，只是实行深水封锁，即以潜水艇封锁英国，使英国亦受很大的痛苦。二次欧战，英国对德又以强大的海军做水泄不通般的封锁德国，德国亦用潜水艇袭击英伦，同时双方又采用各种方

法来破坏敌方的封锁，例如德国利用西班牙的中立地位转运由美洲输入物资，英国实行武装护航，以防御潜艇的袭击。说到我们反共抗俄，以台湾的地理环境，四面环海，又有海军巡逻及第七舰队协防，当然不怕中共、苏俄封锁，而我政府早已对中共、苏俄进行经济绝交，尚待恢复经济封锁。此刻三次大战未爆发，美英诸国对中共、苏俄已经实行战略物资禁运。他日大战爆发，中共、苏俄因先天不足，经济困竭，我们民主国家应予以彻底封锁，促其早日崩坏。

## 六、战争与宣传

宣传战或心理战在现代总体战中，其重要性并不下于武力战，说到它的历史，像尚书所载「甘誓」、「汤誓」及「泰誓」，如果不是后人杜撰的话，那么战争的使用文字宣传，早已开始于数千年之前。汉高祖包围项羽于垓下，令军皆作楚歌，以打击楚军的斗志，项羽闻之大惊失色，只得突围而逃，演成乌江自刎的惨剧。诸葛孔明平南蛮，采用马谡提供的攻心战术，对孟获七擒而七纵之，使其心服不敢复反，因以造成北伐无后顾之忧。这都是历史上宣传战的实例。此外，像唐骆宾王的《讨武曩檄》，石达开的《讨清檄》，洪秀全的《誓师檄》及《布告天下檄》，都是千古名文，字字如电，字字如磁，迄今读之，犹足令人兴起！

在欧洲方面，关于宣传战的历史，据彪黑氏（Buchen）说：「自有印刷术发明以来，各国为取得舆论对本国的有利，用印刷的战争，是和武力战争并行着。」腓特烈大王于亚勒西亚之战，是先发宣言，后开战。拿破仑对于宣传战更为注意，曾说过：「一个新闻社的力量，胜于一个师团的兵力。」自由战争，同盟国在战地设有印刷所，发行战地新闻。

但宣传战成为有组织的实体而起了划时期的发展，却是第一次欧战期间的东西。在那次大战中，协约国与同盟国互相报复以宣传战，尤以协约国方面为大规模，不断地针对着德国的弱点作巧妙而猛烈的进攻，因而促成德国的兵变与革命，德国只得投降了。二次世界大战，双方均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战，当时盟军在这一方面的成功，曾导出艾森豪威尔元帅说过这样一句话：「毫无疑问，

心理作战业已证明了它有权利在我们军事兵器中，占有一个崇高的地位。」战后，苏俄大独裁者斯大林为加紧完成征服世界计划，便以宣传为唯一武器，据专家的估计，每年所用的宣传费达十亿美元，分布于各国的宣传员达六七百万人（所有全球共产党员均为当然宣传员）。我们在大陆上的失败，实先败于其所指挥下中共的宣传战。美国近来对于宣传战（通常用「心理战」一词）亦已急起直追，设立「心理作战战略局」，于远东及北大西洋联军总部则设立「心理作战处」，在韩国第八军团亦设立了一个和东京总部相似的心理作战处，积极对中共展开宣传攻势，除使用炮弹射发传单及飞机散发宣传品外，尚使用有两种宣传新武器——喊话坦克、喊话飞机。前者车上装有扩音器，驶近火线，喊话能使二哩外清晰听到，后者系于夜间懒懒地飞绕于共军阵地的上空，由女宣传员就扩声器——发出的声音掩过引擎的声音，向地面的共军士兵与官长作一种具有魅力的讲话，指出他们的痛苦，劝导他们向联军投降。其结果，依于战俘审讯的显示，自动投降的战俘，其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受心理作战的影响，而在俘获战俘中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宣传在古今战争上的地位及其效果已约略如上述。国父致力于现代中国革命运动，自不会忽略了最有力量的作战方式。故他一经决定「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便「以学堂为鼓吹之地」（《自传》），此后更发挥集体的力量以扩大宣传。国父曾就当时宣传战的经过撰文说：「余于乙未举事广州，不幸而败，后数年，姑命陈少白创《中国报》于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后，革命宣传骤盛。东京则有戢元成、沈虬斋、张溥泉等发起《国民报》，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主张革命。」

邹容之《革命军》，章太炎之《驳康有为书》，尤为一时传诵。同时国内外出版物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胜数。人心士气，于以丕变。及同盟会成立，命胡汉民、汪精术、陈天华等，撰述《民报》，章太炎既出狱，复延入焉。《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主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由是各处支部，以同一目的，发行杂志日报书籍，且以小册子秘密输送于内地以传播思想，学校之内，市肆之间，争相传写，清廷虽有严禁，末如之何。」（《中国革命史》）至于当时宣传的方针，不外是同盟会宣言上所揭示的「一、驱除鞑虏，二、恢复中华，三、建立民国，四、平均地权。」及《民报》上所标明的六大主义：「一、颠覆现今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维持世界真正和平，四、土地国有，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泊乎 国父发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诸著作后，本党的宣传武器始备。

国父是中国现代革命「军事奋斗」的领导者，也是「宣传奋斗」的领导者，他具有宣传演讲的天才，出口成章，不假预备，尤能把握对方心理，连讲二、三小时毫无倦容，至于议论精辟，尤有余事。 国父致力「宣传奋斗」达四十年，其所得经验与教训至多，又遭逢第一次欧战及俄国革命的成功，（国父说：「本党此次改组，乃以俄国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协同军队来奋斗。……吾人由反对俄国各报纸所得之事实，则英兵由北冰洋上陆时，俄兵不加抵抗，自行引退，留下种种印刷品，问其何故来打俄国？列强既与德国和好，何以今日再有征俄之举？各国兵士，

当时以为往俄与德战，不知为与民战也。以此质诸上官，上官无词以对，兵士遂即引退，或激成兵变。」——「军队战胜与党员奋斗讲词」）更使他对宣传战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宣传战上留给我们不少教言，正是我们今日反共抗俄宣传战的南针。

## 一、宣传战的效果

国父认为宣传战在战争上与军事战并重，有时比军事战尤为重要。国父说：「从前把枪炮的力量比宣传的力量看得太重，少用宣传那一方面去奋鬪……讲起效力来，宣传事业同军人事业，实在是一样的大，和一样的重要。向民众宣传，就是同向敌人的猛然进攻一样。」（「言语文字的奋斗」讲词）又说：「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本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宣传这种武器比军队还强。」（「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讲词）又说：「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再说：「革命成功极好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用一成。」（「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讲词）再又说：「国内外为争开国民会议，打的电报有几千几万张，这种和平的争法，好过用武力的几千兵几万兵。」（「学生须赞成国民会议」讲词）因其重要，便有惊人的效果。国父说：「宣传这种武器折服一人便算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靠不住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讲词）又举辛亥革命为例说：「今日蒙报界诸君欢迎，甚幸！此次中国革命（指辛亥革命——浴日注）数月成功，皆报界言论鼓吹之力。」（「报界应鼓吹借款修筑铁路」讲词）又说：「就武昌起义说，表面上虽然是军事奋斗的成功，但当时在武



昌的军队，是清朝训练的不是本党训练的。因为没有起义之先，他们受过了我们的宣传，明白了我们的主义，才为主义去革命。所以这种成功，完全是由于宣传奋斗的成功。」（「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讲词）再举讨伐陈逆炯明为例说：

「数日前，有北京贵同业某君见访，于致贺广州胜利之后，慨然谓笔墨之力，终不如枪炮之灵。实则依鄙人所见，笔墨之力，确极伟大。此次广东之事，看来似是枪炮之功，实则笔墨之效，大不可没。缕缕述之，事殊神妙。陈炯明之在广州，干涉言论，无所不至，广州报纸在暴力之下，固不敢有所主张，即香港新闻纸，亦以许多关碍，不克自由发挥。然而香港有画家数人，痛心于陈氏之作恶，相约以其擅长之艺术，描摹陈氏之罪恶，绘影绘声，栩栩欲活，市民争相购买，或用作广告，或用作装饰，有聚而围观者，有相与品题者，数月以来，已成香港之流行品，而讨陈之概念，深入人心。虽陈家将到香港者，鉴于街谈巷议及家悬户备之情形，亦悚然于人心之既去。且以滇军发难，一战而下广州，迨陈炯明退往惠州，所部犹不下一万余众，乃通电独立，或宣布脱离关系者，即其平日认为腹心手足之士卒，至欲负隅反攻而不能，《香港画报》平日之浸润感化，着深有力焉。吾人今日固不能抹杀彼讨陈诸将士之功，然笔墨之权威，要亦不可否认。今兹粤中之事，二十日而解决，前十日可谓系枪炮之勋劳，后十日实笔墨奋斗之效果也。」

（「发挥笔墨之权威以与军阀搏战」讲词）过去北伐的胜利，实由当时我们的宣传压倒北洋军阀官僚的宣传。此次大陆的失败，则由于共军的宣传压倒我们的宣传，痛定思痛，亟应重温 国父的遗教，思所以发扬于今日。

## 二、宣传战的对象

宣传战实施的对象，可以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在对内方面，如对人民，则在感化以本党的主义， 国父说：「如何以党员打胜仗，就是凡属党员，皆负一种责任，人人皆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遍于全国人民。此种奋斗，可谓之以主义征服，以主义征服，是人民心悦诚服，所谓『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就是这个道理。」（「国民党过去失败之原因与今后努力之途径」讲词）今日则须配合反共抗俄的宣传。对军人则在使其变为有主义斗士， 国父说：「广东以后把四境肃清了，或者要休息两三个月，在这两三个月中，他们必须做宣传的功夫，让这几十万兵，都明白我们何以要革命的主义，个个明白了主义之后，他们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样，他们的能力，必定同七十二烈士一样，出去打仗，便有胜无败，便可征服吴佩孚。」（「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讲词）在今日亦须配合反共抗俄的宣传。在对外方面，主要的是对敌方，尤其敌方的军队，于此，国父有一个最英明的提示：「吾人当努力宣传于一切军队中，使了然其自身之地位，变反动的兵力为革命的兵力。」（「抚辑平民士兵案」） 国父又举例说：「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目的的道理，完全是由于满清军队的自动，一经发起，便马到成功，那些清兵有自动力的根本原因，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他们受了宣传，都赞成我们的主义，所以便不来和我们反抗。像这样用敌人的军队，来做我们的事业，所收的效果，该是何等的大

呢！」（「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讲词）这也是今日所谓「化敌国的军队为敌国的敌人」的新战法，在我未反攻大陆前，或反攻大陆时均应遵照 国父这个伟大的昭示，来加强对中共的宣传作战，宣传作战便是攻心。 国父说：「能攻敌人之心，就是没有枪没有弹，也可以打胜仗，也可以统一中国。」（「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所以，我们能够攻下共军的心，把共军取争过来——不说是全部，仅有一半，则打倒共产政权就很容易了。此次韩战中，所用的喊话飞机，可以说是对敌宣传作战的一种最有效的宣传武器，我们应从速计划运用。

### 三、宣传战的种种

此外，宣传战在实施上尚有许多问题须同时解决，始方可收获豫期的成果。第一、要有宣传作战计划。 国父说：「诸君去年到今，笔墨上用力不少，然或不免于浪费，盖作战须有计划，攻击必有目标。」第二要有宣传方法，宣传材料，明了敌情，临机应变及能够发生感化的作用。 国父说：「我党均须每日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纯熟，然后才能战胜一切。」（「军队战胜与党员奋斗」）又说：「如军队打仗然，打过后须补充子弹，今党员出外宣传，亦当如之。每星期到此补充材料，则宣传事业自易着手。」（同）又说：「诸君所用的宣传方法，就对人而论，应该由近及远，先对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家人说明，再对亲戚朋友和一般普通人说明，就措词而论，所说的话，应该亲切有味，要选择人人所知道的材料。」（「女子须明白三民主义」讲词）又说：「革命主义，既知人生为最终之目的，故必须周知敌人之情形，尤须明了士农工商之状况。对待此类人们，非可杀之也，实须生之。如何方可

以生之。则须知其痛苦所在，提出力法，痛陈主义，乃能克敌致果。此乃无敌之雄师，无人能抗之者，在乎我党能善用之否耳。如遇农则说之解脱困苦的方法，则农必悦服。遇工遇商遇士各种人们亦然。」（「军队战胜与党员奋斗」）又说：「感化就是宣传，大家担负这种任务，所用的方法，必须临机应变。好像现在因为关余问题，外国人用兵士来示威，我们要和他们反抗，便要应用民族主义。」（「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又说：「我们宣传主义，不特是要人知，并且要感化民众，要他们心悦诚服。我们若果能感化民众，民众能够心悦诚服，那才算是我们宣传的结果，那才算是达到我们宣传的目的。若是徒然知，而毫不被感化，便是毫无结果，没有结果，便不是我们的目的。要感化人，那才算是宣传的目的。」（「言语文字的奋斗」）第三、要有宣传人才，人才决定一切，宣传战自亦不能例外。国父说：「到了知道怎么样去宣传，那便是宣传人才，要有很多的宣传人才，非要办一个宣传学校，慢慢的养成不可。」（「党员不可存心做官」讲词）而负责宣传战的人员，则要有诚意和恒心。国父说：「学问和口才本来是宣传的方法，如果要够感动人，究竟以什么为最重要呢？我们要感化人最要紧的乃就是诚。古人说：『至诚感神』，有了至诚，就是学问少，口才拙，也能感动人。所以『至诚』有最大的力量。若是我们在宣传的时候没有『至诚』的心思，便不能感化民众，有『至诚』的心思，无论什么人都能够感动。」（「言语文字的奋斗」）今日欧美宣传家都一致承认「真实」为宣传的要则，亦一致承认「真实常能获胜」，而反对说谎与虚伪，因为这样常会被人家拆穿的。国父所说的「至诚」，比「真实」则更为根本，因为真实是至诚的表现，唯有至诚才能取信人家，并感动人家。又

说：「诸君担负宣传的任务，应该有恒心，不可虎头蛇尾，今日热心奋斗，明日便心灰意冷。因为要人心悦诚服，不是一朝一夕，一言一动，能够收效果的，必要把我们的主义，潜移默化，深入人心，那才算效果。我们要能够收到这种效果，便非请诸君对于宣传，做继续的工夫不可。如果不能继续做去，便是不明白革命的道理。假若真明白了革命道理，便有恒心。因为革命是有目的，要达到一定的目的，便不致中途废止。」（「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这是说干宣传的人要有持久的精神，也是说宣传战是一种持久战，不是一种速决战，它的功效往往不像以枪击人那么显著和快速，而是要从潜移默化中去说服人家，战胜人家。所以宣传战要先于武力战而开始，武力战一开始更要作适切的配合。要之，用军事专家来治军，同样亦要找宣传专家来办理宣传，依于专家们的设计和指挥常可决胜于千里之外。

在反共抗俄中的宣传战是要急起直追了，国父说：「我们从前手无寸铁，何以会革命成功呢？就是由于宣传力。革命以后，大家有了军队，有了政权，以为事在实行，不必注意宣传。岂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传一道，可惜大家都忘记了，现在我们要反省才好。」前面说过，此次大陆的失败，由于中共的宣传压倒我们的宣传，今日我们更要加倍反省才好。须知他日反政大陆，专靠「军事的奋斗」是不够的，国父说：「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专靠兵力，虽百战百胜，亦不得谓之成功。」（「国民党过去失败之原因与今后努力之途径」讲词）还要注重「宣传的奋斗」，不论在反攻前，反攻时，反攻后，「宣传的奋斗」都是很重要的。今日大陆上的老百姓个个都厌共了，个个都

在祈祷我们早日反攻大陆，宛若大旱之望云霓。共军由于韩战的惨败，亦已厌战，时起哗变，这正是我们宣传的良机，我们不要辜负这个良机，我们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战总机构。（人才多，经费多）努力从「宣传奋斗」上来争取共区的同胞，瓦解共方的军队，促成共产伪政权早日崩溃！

## 七、建军要图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一个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恒决于武力的强弱大小。故建军之事，便成为古今中外每一民族国家的大事。尤以丁兹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时代，吾国拥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以为自卫，难免野心国家的覬覦。自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迄八国联军之战，每战皆败，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我武力的孱弱，亦即清廷建军的失败。倘若当时建军成功的话，则陆海军均具强大的战斗力，那里会打败仗，不特不会打败仗，恐怕连列强也不敢轻启战端。故 国父自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便常常以建军为倡导，他说：「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现在共和粗建，须以兵力为保障。昔南非洲有某某共和国，以无兵力，卒被人吞并，可见共和国家无兵力亦不足以救亡。」（「共和须以兵力为保障」讲词）又说：「我中国未革命以前，列强环伺，欺凌侵并，无非以我国武力不足。今日民国正革命草创，欲中国成为巩固之民国，非有精强陆军不可。故民国前途依赖我军人之力正多。今日要务在于扩张军备，以完全巩固之国，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军人之本分」讲词）又强调兵力关系民族国家的兴亡说：「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包括兵力——浴日注），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民族主义第一讲）至于欲完成革命大业，亦须拥有武力，创建好的革命军，国父说：「国事未

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即是武力，如何创有组织或驾驭原有之师旅，皆须以敢死得力之同志为本位，然后坚固不摇，战胜一切。」（「致邓泽如书」）又说：「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甚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极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讲词），但为完成革命而建军，其军须与民众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国父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北上宣言」）即第一项是说军爱民，民敬军，军民合作，打成一片。第二项是说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非私人的武力，为保障人民的生命与利益而作战，自可取得人民的爱护与支持，那有何战不胜！今日我们反共抗俄，正待积极建军，扩张军备，国父这个伟大的遗教，我们应由研究而实践。

综合 国父建军的意见和主张，可分为下述各点：

## 一、整理军政

在建军上，整理军政实为要图，国父于民二目击军政不修，其所厘定的「国民党政见宣言」极力主张整理军政说：「今日处于武装和平世界，对外方面，军备亟须扩张，然扩张军备，当自整理军备始。盖扩张军备之举，须待诸三四年后，而今日入手方法，则



在整理军政，军政整理，而后始有扩张可言也。」关于整理军政的方法有五：

1. 划分军区：于行政区域之外，另划分全国为数大军区，独立处理军事，使军民分治，易于实一行。
2. 统一军制：今各省军队之编制，亦至不一，纷歧错乱，非军事所宜。故当使全国之军队，按一定之编制，俾军事归于统一。
3. 裁汰冗兵：军备须应扩张，而冗兵则不可不裁。盖兵备贵精，其操练不勤，老弱无用者，理宜一律裁尽也。冗兵既裁，然后于其强壮者训练纯熟，使之成军，始可以为扩张基础。
4. 兴军事教育：欲扩张军备，则当求良好之将校。吾国今日之将校人才，异常缺乏，故此数年中，亟宜振兴军事教育，以养成一般将校人才。
5. 扩充兵工厂：吾国今日军备上较大缺点，则为军械不足，兵工厂祇有数所，而制出品为数亦微，今日即欲扩张军备，然无器械，与徒手无异。故宜极力扩充兵工厂，先使器械丰富。

这五大主张，因当时本党非执政的政党，未能付诸实施，到了今日仍具有重大的意义。今日我政府正准备反攻大陆，除「划分军区」外，而关于「统一军制」，「裁汰冗兵」，「兴军事教育」，「扩充兵工厂」诸端，均经分别切实施行。就中如「裁汰冗兵」，即在汰弱留强，增进新生力量，本年轻将军中老弱士兵办理除役，

计被除役之老弱官兵，共有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五名（官占少数），分别予以转业，或安插于机关当公役，或安插于农场垦区耕作，使人人皆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政府整军的成绩，也是本党过去政策实现于今日。关于「扩充兵工厂」，因我欲反攻大陆，则所需的兵器弹药是大量的，战场消耗也是大量的，光靠外援，有时而穷，仍须自力更生，以全力发展军需工业，扩充兵工厂，提高生产能力，重兵器固难一时自给自足，轻兵器亦应做到自给自足。

## 二、练兵要点

整军之外，练兵亦为建军要务。兵法说：「兵在精，不在多。」精兵全靠教练，教练的不好，系乎战争的胜败至巨。尤以今日武器进步，技术的专门，战术的革新，及政治思想的复杂，人格道德的低落，更使我们非重视练兵问题不可。国父说：「练兵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又说过：「新到之武器，当用以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均见「致蒋中正函」）于此，我们要注意的，现代练兵的标准，每个士兵都要训练他们有充当班长，以至充当排长的能力，他们有了较高一级的能力，才会做出更好的动作。并且要训练他们有各个独立作战的精神，因为现代武器的进步，在场战场上不仅连长不能照顾全连的士兵，就是一个连长也照顾不了一排士兵，又要训练他们都具有不怕死的精神，以免临阵缩，望风而逃。故须假以相当长久的时间。「不教民而战」固不可，即教不精而战亦不可。国父说过：「当兵的人，必要受过了许久的训练，然后才能应战。到了临阵的时候，还有计及生死利害，违反他职守的。近来文明国的士兵，虽有死守职务，不计利害的，但是他们的天性纯厚，还是不及蜜蜂。至于中国的士兵，更是比不上。俗话说：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要他们成好士兵，必须经过许久的训练，才勉强有用，如果说忠心一层，和蜜蜂比较，更是差的远。蜜蜂赋有天生合群的性质，一群之中，各司其事，不必加以训练，是自然而然的。人亦赋有多少天生合群的性质，但须加训练，然后合群的性质才有进步，进步到极点，还是不及蜜蜂。蜜蜂实行天赋的特性，勇往直前，毫无顾虑，人每因后天的训练，没有娴熟，容易丧失先天的特性。」（「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讲词）这是就精神训练方面来说的，精神的训练，在养成其忠勇合群的性格，以一当十的斗志，不成功即成仁的精神，即如国父「军人精神教育」所讲的内容（详见下章），自然非短期所能完成，须假以相当长久期间。今日我们准备反攻大陆，此一准备期间似非很短，故应切实利用来作充分完满的训练，一面提高其革命精神，一面娴熟其战斗技能，使个个都变为精兵锐卒。

于此，与练兵有关的编制问题，国父提示了一个很宝贵的意见说：「今日开始练兵，犹不能行我所定编制，若谓练成之后，士兵官长都成了习惯，而后再行改制则更难矣。此为我所定之制，则欲练成之后，可以应我方寸之运用也。倘开练之时，已不能行我之制，则练成之后，我亦无心用之矣。今为应我所用之故，特托嘉兰将军将我卫士练至一营，以为他军之模范。兄谓我编制规模太大，若果因此何不练至一营或一团为单位，以一营等一团，以一团等一旅，有何不可？我想人家不欲行我之制者，则全为故习所囿也。本其日本士官保定军官之一知半解，而全不知世界大势，不知未来之战阵为何物，而以其师承一成为不易也。因此故，我更要今日之军人舍去其故习，而服从我之制度，斯将来乃能服从我之命令，听

从我指挥也。如果今日教学生则存一成见，教成之后，何能使之为革命军负革命之任务。试观北洋之军队，训练非不精，补充非不备，而作战则远不如败残之杨化昭、臧致平，以彼二人曾与南方稍有革命行动之军队接触，而无形中学得一二革命之战术也。此间今日所练之军队，如果将来能听我指挥，则我必导之去以一攻十或以一攻百也。此等任务，更非常兵法所有。倘今日开练之始，不行我制，待至练成时，谓能听我指挥，我决不信也。」（「致蒋中正函」） 国父这个改革编制的主张，例如一个步兵师，共有兵数三八、九九二名，官数一、一六二员，（注）其人员之多，战斗力之强，实为一较大单位的编制。今后国军的编制，尤其今日准备反攻的部队，固要充实其人员，尤要加强其火力，改善其装备，务使一连一排有一连一排的战斗力，一团一营有一团一营的战斗力，方能达成任务。不过我们要知道：军队的编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进化的，即依于兵器的进步，战术的革新和假想敌军的编制而进化改变。

### 三、官兵生活

在建军上，关于官兵的生活问题应作合理的解决，方能鼓舞士气，安定军心。 国父于民十三向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的「辑抚平民士兵案」，其中有一项说：「革命军揭国民党之旗帜，为人民而战，以从事于捍卫国家，克服民敌者，当受国家之殊遇。兵士于革命胜利之后，国家应给以适当之土地，使复归于善良之农民。」又经 国父厘定的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政纲规定有：「将现时募兵制度改为征兵制度，同时注意下级军官及士兵之经济状况，并增进其法律地位，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严定

军官之资格，改革任免军官之方法。」固然，这个政纲的范围是很大的，但我们从这个政纲及上述的提案，可以看出国父对于官兵的生活问题非常重视。而这个生活问题，是包括服役与除役、退役的生活问题。政纲中所说的「注意……经济状况」，系指服役时的生活问题，如薪饷如何提高，衣食如何改善等。提案中所说的「给以适当之土地」是指除役退役后的生活问题。至于「施行军队中之农业教育及职业教育」，这是为增进其改善生活的技能的。今日我政府在台湾已注意及此，也可以说正在根据国父的遗教来实行，除最近已颁布「战士授田条例」，使一般战士皆知战后复员时，均有田地可耕，自己及家属生活可得保证外，又推行「克难运动」，以增进军中生产，且每月均有鱼、肉、油、豆等物配给，眷属亦有配给，军中康乐设备亦比前充实。倘能再加改善，更可安定军心，而鼓励士气。

#### 四、兵工政策

国父于民十一目击军阀各据一方，拥兵作乱，认为欲谋中国的和平统一，必须先行裁兵，而安插被裁之兵的政策，便是化兵为工。他主张说：「军兴以来，兵额较前增至倍蓰，此等兵士来自民间，为不法武力所驱使，非其本意，一旦淘汰，使之骤失所业，亦所未安。宜以次悉改为工兵，统一编制，一切如旧，收其武器，与其工具，每日工作，约六小时至八小时，先修治道路，次及其它工事。工兵月饷，较现时倍加，将弃月饷百元以上者加之，其百元以下者加倍。此外则其工作所产之纯利，以一半归于国家，以一半归于工兵，论人数均分，自无差等。如此则一转移间，易战事为工事，兵不失业，无挺而走险之虑，工事日繁，有生产发达之象。然

后善收外资，投之实业，以起积年之疲弊，谋社会之繁荣，转危为安，悉系于诸。」（「工兵计划宣言」，民十一发表于上海）并于十二年初陆续发表「和平统一宣言」、「裁兵筑路」、「欲救广东宜从裁兵、禁赌及政良吏治着手」及「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等讲词，及「裁兵为统一和平之根本条件」谈话，作积极而广泛之号召，虽然这个主张以当时军阀的勾心斗角，各怀鬼胎，未能实现。迄民十三于「抚辑平民士兵案」中又提议说：「本大会并认本党总理所主张之兵工政策，及实业的建国方略，为适合于中国改造之政策，负努力宣传及实行之责任。」亦未实现，直至今日始为我政府推行于台湾，不过由于时势不同，今日所推行的兵工政策，不是由裁兵来化兵为工，而是运用守台的部队于备战的余暇，来从事兵工建设。自推行以来，诸如水利工程、铁路公路的修筑，以及垦荒等，均收获丰硕的成果。既节省了政府很多建设经费，安定了社会工价，增进了军民感情，而官兵的副食费亦均得增加，尤以一般官兵受此建设上的训练后，其所得经验与技能足供反攻大陆后建设之需。

以上系就陆军而言，因当时建军以陆军为主，故在遗教中亦以关于这一方面的言论为多。此外，关于空军及装甲部队，国父亦曾作过初步的建设（详见本书「绪言」章）倘若当时财政许可的话，他必作大规标的扩张。这是国父鉴于这两种新兵种在第一次欧战时的惊人战果，尤以在未来国际战争上必占最重要地位，国父对于海军素有研究，所得印象亦至深，因为护法之役靠海军，他说：「护法事业，凡三波拆，六年之秋，余率海军舰队，南去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举余为大元帅。」（「中国革命史」）又

说：「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文实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其余未来之舰，亦不为彼效命，我已操制海之权矣。」

（「南下护法致邓泽如函」）广州蒙难，退入永丰舰，与陈逆炯明相持于白鹅潭达两月之久，也是靠海军。尤其他游历世界各国时，目击列强之强在于海军，民元已开始号召建设强大海军说：「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齐驱并驾，在世界称为一等强国。」（「兴船政以扩海军」讲词）今日我们为反共抗俄而建军，仍应运循着 国父这条路线而迈进！

（注） 国父革命军步兵编制表：（其余炮兵、飞兵（代骑）、工兵、辎重车、机关枪、甲炮车未定）

编 制	组 成	兵 数	官 数
伍		6	0
列	6 伍	36	1
连	3 列	108	4
营	6 连	644	21
团	6 营	3, 888	129
旅	3 团	11, 664	388
师	3 旅	38, 992	1, 162

此表兵数定实，官数可酌量再加。

## 八、军人精神

孙武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又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拿破仑说：「战争胜利，四分之三依于精神要素，而依于物质之情况决定者，不过其四分之一。」

克劳塞维慈氏说：「精神力为军事最重要因素之一，战争全部因素无不受精神力所贯注，而为其操纵。」

哥尔兹将军说：「歼灭敌人之战斗员，其价值较消灭敌之勇气为小，失败主义者若充斥于敌之全军中，则胜利即在吾人之眼前矣。」

福煦元帅说：「我欲为胜者，必须保持战胜敌军之精神力，指挥官必须有此精神贯注于自己之部队，故指挥会战者，乃粉碎敌之精神力，以至于最高度之谓也。」又说：「必胜之意志乃胜利之第一条件，兵卒应以此为第一要义，同时指挥官亦必须以较高之决心，贯注于每一个兵卒之精神中。」

普通的军专家尚且如此重视精神力，何况 国父是革命的军事家，中国现代革命的领导者。当民国十年取道广西北伐，师次桂林时，为振作全军的战斗意志，强化全军的 精神力量，于翌年一月集合当时所统率的滇、粤、赣各军将校给予 剴切 详明地演讲：「军人精神教育」，这一部演讲词，为 国父的宝贵遗教，在世界兵学上具有不朽的价值，另成一新体系，虽名 军人精神教育，实包括一般



的哲学思想与伦理思想，不特可作为革命军人的基本教科书，且可作为一般国民身心修养的座右铭。

### 一、精神重于物质

蒋百里先生说：「在军事教育上本来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做『外打进』，一种叫做『里向外』。『外打进』的方法，就是从外表仪态的整齐严肃，行动必须规规矩矩（孔子教颜渊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为求仁之目的），以浸润之，使心志和同，养成纪律，至于『里向外』的方法，这是拿破仑所发明的，教育方法是启发其爱国心，自尊心，使人人乐于为国牺牲，但外表则不甚讲求，故帽子不妨歪戴，军礼不必整齐，然而实际作战，便能得到非常的成绩。当法国在大革命时，人民不管自己对于枪会不会开放，但是一听到『祖国危险了』的口号，成千成万的人便自动的拿起枪杆上前线与敌人作战。法国有一张图画，是纪念革命时代人民爱国的心理，其图为一家族，有绝美的太太，有极可爱的小孩，同男人正在一桌吃饭，忽然门口飞进一张纸条，纸上写了『祖国危险了』几个字，于是男人就放下饭碗夺门而出，踊跃赴战场应敌。那时法国四面都是敌人，而且敌人的军队都经过长期的训练，论武器亦较法国民军优良得多。但是法国民军作战的精神，个个勇敢非凡，所以在拿破仑未出世之前，法国一个国家，已经可以抵抗全欧洲的敌人。」（注）

考 国父研究拿翁兵术，最有心得，他的倡导军人精神教育，也许受到『里向外』的教育方法的影响。原来精神与物质是不可分的，是互相影响的，两者比较，精神是活的，是可变的，物质（武器装备）是死的，是不可变的。换言之，精神力量是无穷的，不是

用数字所得而计算，物质力量是有限的，却可以用数字正确的计算出来。而且创造物质是人的精神，使用操纵物质也是人的精神，故在战争上精神是比物质为重要，也就是说明精神教育比物质教育为重要。固然一国军队的精神力与物质力两皆优越为至善，但美国以物质条件最优越的国家，艾森豪威尔元帅尚且强调：「士气是胜利的一个超越因素。」至于物质缺乏的国家，其军队更应注重精神，以补物质的不足，自不待说。国父致力国民革命，他一面统率劣势装备的军队，以与优势装备的敌人搏斗，另一面又看到将来对外抗战，因为我国产业的落后，势必以劣势装备的军队，与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乃特别注重于军人精神教育的倡导，确是看穿战争决胜的机微。至于我们过去在大陆的失败，乃先由于精神的崩坏，失败主义的弥漫，这是人人所共知共见的，更足证明 国父理论的正确。

国父这部遗教，洋洋万余言，分为五课：

#### 第一课精神教育：

第一节精神教育之要旨说：「欲身任非常之事业，则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此非常之教育为何？即军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然革命精神，何自来耶？是在精神教育，诸君之所以为军人，非为有军人资格乎？非为曾受军人教育乎？否则执途人而目之曰：『军人！军人！』如何其可！今兹所述之精神教育，即欲诸君灌输此精神于脑中，须臾弗离，虽至造次颠沛之间，守而勿失，夫然后可以为军人，可以言革命，可以卜成功，否则反是。」

第二节精神之定义说：「人为万物之灵……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

而不知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为之。二者相辅，不可分离，若猝然丧失精神，官骸虽具，不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失，而体亦即成死物矣。」

更在第三节精神与物质力量之比较上，以武昌起义为例，证明精神力为战胜之本说：「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既如前述，故全无物质亦不能表现精神，但专恃物质则不可也。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质方面，若言北伐，非曰枪枝务求一律，则曰子弹必须补充，此外种种武器，亦宜精良完备，一若不如此，则不能作战者。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此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为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何以知其然也？试以武昌起义为例：当日满清之武器，与革命党人之武器，以物质能力论，何啻千与一之比较。革命党人独不虑以卵敌石，乃敢毅然为之者，因其时汉口革命机关业已暴露，党人名册亦被搜获，士兵之入党者，均为查悉，悉数调往四川，仅有炮兵、工兵两营，留驻武汉，其中同志尚多，有熊秉坤者，新军中一排长耳，见事机已迫，正在大索党人，以为若我不先发制人，终必为人所制，死耳，置于死地而发生，不如速发难。因将此意，告诸同志，金以无子弹对，后熊秉坤向共友之已退伍者，借得两盒子弹，分授同志，革命之武器所恃者，仅有此数。枪声一起，炮兵营首先响应，瑞澄、张彪相继逃窜，武昌遂入革命党人之手。彼满清方面军队非不多也，枪弹非不备也，当革命风声传播之时，瑞澄且商诸某国领事，谓若湖北有事，请其拨兵舰相助。布置如此周密，兵力如此雄厚，乃被革命党

人以两盒子弹打破之。诸君试思，两盒子弹，至多不过五十颗，即使一一命中，杀敌不过五十人，能打破武昌乎？余以为打破武昌者，革命党人之精神为之。兵法云：『先声夺人』所谓先声，即精神也。准是以观，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可以武昌一役决之。此第就本国而言，已有此先例。试再言外国：前此意大利人，有加利波利地者，为一有名之革命家，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当其渡海攻城也，以一千人与三万敌人，相持四五日，卒由他路抄袭入城。此在战略上战术上无论如何，均不能取胜，而事实之相悬殊若此，将谓以少胜众乎？乃精神胜物质耳！又如日俄战争，俄国出兵多于日本数倍，未战之先，咸以为日本之于俄国，不啻驱羊豕以犒虎吻，必无幸也。何以战争结果，卒至俄败而日胜？此无他，俄之败，败于无精神，日之胜，胜在有精神而已。诸君不观夫牛与童子乎？牛之力量大于童子，人皆知之，而童子能以一绳引牛，东则东，西则西，牛乃不能夺其一角一蹄，以与童子抗，而甘心俯首，惟命是听者，是何耶？童子有精神，牛无精神，故童子之力量虽不如牛，而能以精神制驭之，此犹显而易见之例也。依上述各例，则知此次北伐，亦惟恃有精神，即能制胜。可勿问敌人子弹多少，我之子弹多少，但问我之精神如何。若无精神，子弹虽多，适以资敌，一旦临战，委而弃之，非为敌人运输战利品乎？故两国交战，能扑灭敌国之战斗力者，即在扑灭敌人之精神，而使失其战斗能力。兵法有言：『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攻心者，务先打破敌人之精神，取得城池，犹其后也。去年粤军回粤，既下惠州，桂军闻风破胆，先自逃窜，我乃兵不血刃，长歌而入广州城矣。此足见物质不可恃。所谓『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其道何在？精神为之也。」

虽然精神重于物质，而在长期战争中，对于物质实有同时改善的必要。因为物质不足，每易影响到精神的沮丧。所以我们于强调精神之外，还要力求物质的改善，不待说，这是维持精神，振作精神的最实际的方法。最近英国二十五位科学工作者合著《战争与科学》一书，曾有下列的阐明，可供参考，该书说：「一般说来，有两个条件是和士气振作有关的：一个是士兵的物质条件，如食物、营房和军器供给必须好，否则溺职的事是难免的。第二是士兵自己必须明白他是为什么而战，同时要他相信战争的方向是对的。前一个条件是基本的，短时期缺乏粮食休息或弹药，虽可用心理上的因素来对消，但不能维持长久，饥饿疲乏的兵，绝不是以饱待饥的兵的对手，在这点上说来，士气的问题变成了给养和组织的问题了。现在民气也和士气一样重要，而食粮对于两者都是基本的东西。」

## 二、军人的精神力

第四节军人之精神说：「现时之中国，前途险象，较前尤甚。南北分立之局，扰攘数年，未能统一。北方内部，且复各树私帜，加张作霖、曹锟、吴佩孚等割据地盘，拥兵自卫，政治之坏，过于满清，人民转徙流离，如在水深火热之中，待援孔亟。援之之法为何？须用革命之手段，用革命之手段，则须负革务之责任。革命之责任者，救国救民之责任也。……诸君固皆曾受军事教育者，当知军人之职志，在防御外患，在保卫国家，今先问中华民国是否为完全独立之国家，不受外国之掣制？以余观之，固犹未完全独立也。国会虽选出本总统，而内乱尚未戡定，各省之在北方势力范围者，尚居多数。北方已丧失对外之资格，而正式政府，又未经各国承认，当此危亡绝续之交，非先平内乱，而以革命救国不可，以革命

救国，非有革命精神不可。无革命精神，则为法属之安南，终受势力屈服。有革命精神，则为英属之爱尔兰终得崛起自治。此外再征诸印度及高丽，益知革命精神之必要，印国久受英国压迫，近亦引起反动，其革命思想与前不同。」跟着又画龙点睛地指出军人精神的要素有三：——一曰智，一曰仁，一曰勇及决心。即「欲使之发扬光大，非有决心不能实现。但所谓决心者，须多数人决心，合群策群力而为之，非少数人所能集事。」方能铲除反革命势力，改造中国为「新世界」。不待说，这是全书的骨髓。兹将第二课讲「智」，第三课讲「仁」，第四课讲「勇」，第五课讲「决心」的内容，摘要列表如下：

智										
定义	来源			军人之智						
有聪明，有见识，又须合乎道义，并随时进步	由于天生	由于力学	由于经验	别是非		明利害		识时务		知己彼
	与「生而知之」略同	与「学而知之」略同	与「因而知之」略同	军人须卫民，利于民则为是，不利于民则为非	军人须卫国，利于国则为是，不利于国则为非	利害与是非相因而至 是则为利，利可为 非则为害，害不可为		时 势 时势成熟可为，否则不可为	势 势力之顺逆，与难易之比较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仁				
定义	种类			军人之仁
博爱、公爱、己饥己溺	救世之仁	救人之仁	救国之仁	实行三民主义，救国救民
	舍身救世	乐善好施	为国牺牲	
	宗教家之仁	慈善家之仁	爱国志士之仁	

勇						
定义	种类				军人之勇	
不怕，军人之勇一有主义，有目的，有知识	大勇	小勇			长技能	明生死
	真正之勇	獠狻之勇	血气之勇	无知之勇	应娴熟游勇战术的技能	能鼓起勇气
	成仁取义	一忿忘身	暴虎冯河	螳臂当车	命中，隐伏，耐劳，走路，吃麤	不畏死，为国效死

决心	
不成功即成仁	
成功	成仁
造出庄严华丽国家共享幸福	共殉吾党光辉主义成为志士
皆为惊天动地之革命事业	

我们从以上的表解，已可明了智、仁、勇及决心的主要内容，现可进而研究智、仁、勇及决心的渊源问题。关于国父所说的智、仁、勇，有人说渊源于兵圣孙子，始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也有人说渊源于哲人孔子，《中庸》载：「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孙子兵法》为军事哲学的书，《中庸》为政治哲学的书，如果说它纯粹地渊源于孙子，却缺了「信」「严」两项，说它直接地渊源于孔子，却又用在军事上。其实国父对这两部名著都很有研究的，故不如说他是摄取两家的学说而立论。此外国父又参照新兵学加上「决心」一项，而建立他军人精神教育理论的新体系，且其内容又是全新的，不同于孙、

孔及其它兵书上的解释，这是他的独创——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来独创的。

智、仁、勇是中国的军人魂，亦即中国军人的武德，它以仁为中心，故可使智勇不致陷入歧途。所以缺乏仁之武德的军人，决不是健全的军人，果如他拥兵的话，必变为军阀，战争的话，不是为争权夺利，便是为侵略征服。这都是 国父所极端反对的。所以我们中国军人的武德，不是日本的武士道（军人精神）所可比拟，因为日本的武士道偏重于勇智，丢了最重要的仁，过去日本军阀只得走上侵略老路。拿破仑亦谈智勇不谈仁。他说：「为大将应具之种种理想的才能，极难具备于一人。实际上为大将最需要者，同时最能扬名者，即智勇双全。若有勇而寡智，则往往不慎，而生意外。若有智而少勇，则意想之事，往往不能作。」所以他在欧洲极其量亦只尽其蹂躏的能事而已。举世奉为兵学大师的克劳塞维慈氏，他对于智勇分析得最为详明，读者可看他的名著《战争论》。至于我译的《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一书，其中有一段说：「军事上的天才，即凭于智力、感情、勇气及其它各种心力的合一，以从事军事活动的卓越军事指导者。世人惯将单纯而勇敢的军人称为军事上的天才，这是不对的，殊不知智力比勇气尤为重要。虽是下级指挥官，苟欲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亦必须具有优秀的智力，其阶级愈高，则所需要的智力亦愈大。」但他却不谈「仁」，并且强调「战争为无限界的暴力行为」，徒造成德国军人好战成性和暴虐无道，这不能不说是克氏战争理论的一大缺陷。至于萧米尼、威利逊、杜黑、福煦、鲁登道夫等的著作亦犯有同样的缺陷。于此，可见 国父兵学思想的不同凡响，及我国兵学的特色。本来仁的战争



观念，在我国古代有一种说法——「不杀人」，叫做仁，其实这仅是片面的，它的出发点，应为拨乱反正，济弱扶倾。又如《司马法》的仁本篇说：「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可也。」国父所谓仁，应为如此，所以他仁的战争观念，决不仅仅是那片面「不杀人」之仁，也不是春秋时代宋襄公之仁——「不重伤，不擒二毛」，因为这是妇人之仁，是小仁，非大仁之仁，更非国父之所谓仁——救国救世之仁，实行三民主义之仁，站在完成三民主义的革命立场上，纵是彻底歼灭敌人亦非不仁，这是我们应该彻底认识的。

总之 国父所讲的智仁勇，是三位一体的，缺一不可，尤以仁为中心，殿之以决心，以为实行发扬智仁勇的原动力，益见完整而有力。就是说军人如果缺乏决心，则智仁勇，也是徒然。但决心生于信仰三民主义，为实现三民正义而牺牲我们自己，就是个人的「成仁」。革命军人能够个个决心「成仁」，则革命事业必「成功」。所以「成仁」与「成功」是一件事情。再就个人而说，决心成仁者，往往未成仁而先成功，决心成功者，往往未成功而先成仁，成功固伟大，成仁更伟大。远如唐之张巡、宋之文天祥、明之史可法，近如此次抗战中之姚子青、张自忠、戴安澜等，戡乱中之张灵甫、黄伯韬、刘戡等，这种轰轰烈烈的「成仁」，简直成为中华民族的军神，千秋万岁后，犹令人闻风兴起。

固然，智仁勇及决心为每一个将校所必备，就是每一个士兵也要具备，不过在程度上各有差别而已。至于程度的高低固与先天有关，尤系乎后天的学习与修养，所以我们革命军人决不可自暴自弃，应不断地努力学习与修养，提高自己的智力、仁力、勇力，及

锻炼自己的决心。这样就是士兵亦可成为将校。今日反共抗俄战争所课于我们军人的精神力实在太大了，倘若我们个个都具有高度的精神力，则失败主义自可遁形，必胜信念自可增强，反攻大陆，光复大陆，端在乎此。

（注）见蒋百里先生：〈兵学革命与纪律进化〉演讲词。

## 九、军队纪律

「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军队必须有严肃之军纪，然后精神上之团结力得以巩固，战斗力之持久性得以确保。盖战时各部队之任务不同，其境遇亦各有差别，从一定之方针，取一致之行动者，厥为军纪是赖。」——《作战纲要草案》

军纪是军队的纪律之谓，亦犹社会的规律，国家的法律。社会没有规律则不成为社会，国家没有法律不成为国家，自然军队没有纪律也不成为军队。军队是一种武装的机体，对于国家社会负有庄严神圣的使命，惟其使命重大，自然需要极严密极完善的纪律，来维持其生命，健全其本身。至于平时军纪，它是战时军纪的基础，倘若平时军纪不良，必致影响战时军纪的维持，战时军纪如不能维持，则上下凌乱，各自为谋，正如乌合之众——忽聚忽散，乱飞乱集的禽类之群，以这样的军队去打仗，纵有良好的命令，必无法执行，纵有必胜的战略战术，亦无从达成，唯有战败而已。战败就是军队的覆灭，团体覆灭，个人亦不保，所以军人的生命、荣誉、功业是系乎有组织的军队，而维持军纪，则须自每个人遵守纪律始，如果个个军人都肯遵守纪律，则军纪必致荡然无存，而个人一切也必随军队的没落而没落了。说到纪律的遵守，不容有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有始无终的行为，亦无阶级之分，彼此之别，及特殊的例外，上自统帅，下至士兵，均要一律遵守，尤其阶级愈高的官长，愈要身体力行，以为部下表率。法国《新军论》作者卓莱氏说：「革命政府对革命军之官长与兵卒，本真正共和之诚意，为一国同仁之赏罚。赏厚于兵卒，而首于官长，长官厚而兵卒不平矣，

不平则鸣。如是或官兵相攻讦于部队中，或军队攻讦政府，而军纪坏矣，故欲保持军纪，须赏罚公平也。」

古今中外的将帅对于军纪，均极重视。尤其是战时的军纪，更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例如穰苴之斩庄贾，晋文之斩颠颉，刘邦之斩丁公，孔明之斩马谲。发为理论的，如兵圣孙子列「法令执行」为七计之一，又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用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腓特烈说：「余战胜利，皆军纪之赐也。然战争既久，军纪稍弛缓矣。国家繁荣安靖，皆军队有纪律之故。罗马人及高卢人之刚健，日耳曼民族之狡蛮，终能征服世界者，军纪严肃之故也。」拿破仑说：「纪律肃严，乃从败衄、杀伤、污辱中救护军队者也。军队之污辱者，比死刑尤酷也。」鲁登道夫说：「战时军纪较诸平时尤为重要，在民族的生存之奋斗中，对于违反军纪者，应用一种特别法律，加以迅速严格之惩罚，否则，纲纪一毁，军力亦不保矣。」

国父在革命战争中，对于军纪亦极重视。他说：「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就能够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如果学生军人要讲自由，便像中国自由的对待名词，成为放任放荡，在学校内便没有校规，在军队内便没有军纪，在学校内不讲校规，在军队内不讲军纪，那还能够成为学校号称军队吗？」（民权主义第二讲）又说：「儻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机关不能统一，则执事者无专责，势如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是故所贵夫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如机械然，百轮相错，一丝不乱，而机械之行动，乃臻圆满。……而在职为军人或官吏时，则非牺牲自由，绝对服从纪律，万万不

可。」（「自由之真谛」讲词）又说：「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士兵的都要服从，照原命令去共同前进，若是能前进，或者将错就错，也能打胜仗。如果一部的军队看出了命令不对，便单独行动，以致牵动全军，不能一致前进，弄到结果，不是首尾不能相顾，自乱阵线，便要被敌人各个击破，全军就要覆没了。」（「党员之奋斗同于军队之奋斗」讲词）又说：「像滇军有一位师长，因为金钱纠葛，便被部下的兵士押起来，此风一开，如果我们还不另筹良法，作长久之计，那么，所有现在的军长师长旅长以后都是危险的。讲起道理来，那位师长是应该押，是不应该押？照军法说：长官如有吞食士兵的军饷，须要我把他押起来，那才算是正当。而现在他偏做自己部下士兵的囚徒，这是成甚么体统呢？现在世界上士兵敢杀长官的，只有俄国，他们的士兵，当起革命的时候，去杀皇帝和保皇党的长官，推究他们的原因，是在要行革命主义。如果滇军士兵，把长官押起来，也是为行主义，那么，我是很佩服的。但是只为金钱问题，便弄得士兵目无军纪，是实在不对的！」（「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

国父对军纪的重视，已如上述。而为维持军队的纪律，见于实际上的，如民元就临时大总统后，曾令陆军部说：「顷据上海太晤士报载南京之兵士现象，均系实情。该报向表同情于民国，今为恳切之忠告，若不切使警戒约束，不惟贻笑外人，后患何堪设想！该报所载下级军官及高级军官，终必同受其危险者，诚非过虑。为此令仰陆军部速即颁行军令，责成各军司令以下将校，切实奉行，以后各负其责任。并附译该报所论之文，给与各军将校传阅。须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然后能保军人之名誉也，壮民国之干城。我

金陵军队，不乏爱国健儿，断不容以少数不规则之行为，致坏我军人全体之名誉也。速将此令通知之。」又，电孙毓筠嘱饬皖北各军严守纪律说：「顷得伍代表转来电称：『据倪藩司电称：皖北革命军，以革命为名，招集土匪，六安、凤阳所属，及颖、霍两县，在城则苛捐勒派，在乡则掳掠奸淫』等语。查我军素称义师，中外共见，倪电所称，难保无诬蔑之处。请转饬皖北各军，务宜严守纪律，认真训练，以保义师之名誉，勿令敌人所借口。甚为至要！」民十二所颁布的帅令：其一是「……各部军队，着就现驻地点驻扎，自经规定以后，各部军队，非奉本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行动，致滋纷扰。该总司令等（指杨希闵、刘震寰等——浴日志），务各督率所部申明纪律，保卫地方，以期无负本大元帅抚兵恤民之至意！」其二是：「近日查各师旅部有缉获奸细，即自行处决，市内广众大场之中，而竟然陈尸数日者，殊于文明人道，大相违背。着该总司令严行禁止各师旅部自行处决人犯，所获奸细，务令解至司令部办理之。又查各处之有无兵而犹用某某司令等名目，以招摇舞弊者，着队司令严令拿办。」其三是：「兹有不法之徒，专投入各军队，领有军章为护符，无恶不作，致人民与军队日生恶感，此与大元帅救国爱民之旨，大相违背，今特派大本营侦探长李天德严为侦察，如查得该匪徒之机关所在，即行报告卫戍总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并公安局协同缉拿严究。」此外定为条文的有：

## 一、倒清时代的军纪

国父在同盟会时代，为推翻满清，对革命军所颁布的「军律」极为严肃。计开：

1. 不听号令者杀。

2. 反奸者杀。
3. 降敌被获者杀。
4. 私通军情于敌者杀。
5. 泄漏军情者杀。
6. 临阵退缩者杀。
7. 临阵逃溃者杀。
8. 造谣者杀。
9. 私逃者杀。
10. 任意掳掠者杀。
11. 强奸妇女者杀。
12. 焚杀良民者杀。
13. 杀外国人焚折教堂者杀。
14. 勒索强买者，论情抵罪。
15. 私斗杀伤者，论情抵罪。
16. 遗失军械资粮者，论情抵罪。
17. 获敌军资粮军械，藏匿不报者罚。
18. 私入良民家宅者罚。
19. 盗窃者罚。
20. 赌博者罚。

21. 吃鸦片者罚。

22. 纵酒行凶者罚。

## 二、倒袁时代的军纪

国父在中华革命党时代为打倒袁逆世凯，而约束将士，所颁布的「军律」，亦极严肃。计开：

1. 不听号令者枪毙。
2. 临阵退缩者枪毙。
3. 泄漏军情者枪毙。
4. 私逃者枪毙。
5. 反奸者枪毙。
6. 抢掠者枪毙。
7. 焚杀良民者枪毙。
8. 强奸或强占妇女者枪毙。
9. 收受贿赂，勒索资财者枪毙。
10. 寻仇报复，捏词诬陷者枪毙。
11. 擅用私刑，擅捕良民者枪毙。
12. 结伴持械互斗者枪毙。
13. 捏报名额，虚领饷项者枪毙。
14. 杀害外国人，焚折教堂学校医院者枪毙。
15. 造谣者枪毙。



16. 贩卖人口，或掳人勒赎者枪毙。
17. 强买强卖者禁锢。
18. 斗殴伤杀者禁锢。
19. 遗失或浪费军械弹药者禁锢。
20. 掳获敌军军资军械物品，藏匿不报，私有售卖者禁锢。
21. 私入良民家宅者禁锢。
22. 赌博或开设包庇者禁锢。
23. 吸食鸦片烟局者禁锢。
24. 纵酒行凶滋事者禁锢。
25. 滋闹娼寮戏馆者禁锢。

上述军纪真是秋霜一样大严肃，也许，国父是根据于孙子所说：「施无政之令」的原则。他日我们反攻大陆亦当如是，惟有如是才能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北上宣言」）但是严肃的军纪会使官兵的精神，陷于机械呆板，且有时而穷，正如古人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故必须养成全体官兵均能活泼地从内心上自动遵守纪律，才是最进步的军纪，亦即军纪的真精神。蒋百里先生说：「近代战争要人自为战，并且每个人都要由内心的自觉来遵守纪律，这才是近代最进步最高的军纪。」又说：「现在军事上由于兵学革命，纪律非出于自动不可，比方现代战争，一个连长在战场上无法可以照顾全连人，所以连长在平时要教导士兵，到了战时，在战场上能照他所讲的自动去做，这算是一个好连长。空军的纪律尤其要出于自动，倘使飞行人员不能自动

的遵守纪律，司令官要他去担任某种任务，他却驾了飞机在天空乱飞一阵回来，至于是否达到任务，司令官耳目不能看到，自然不得用知。所以我说空军的纪律，必要出于自动，才算是一个现代的空军战斗员。」（注）

但怎样才能够养成全体官兵有遵守纪律的自动精神呢？唯一法门是统一全体官兵的主义信仰，——对于三民主义都有深切的信仰，因为三民主义是军纪的根源，是军纪的中心，倘若全体官兵于任何时都决心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三民主义而牺牲，则他们便可以自觉自动的遵守纪律，而纪律也就可以自然地得到维持，国父昭示我们说：「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变成革命军，便是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变成敢死队。为什么要大家为三民主义变成敢死队呢？因为为三民主义去奋斗，就是死了，也是成仁取义，所谓「仁义之师」。这种死法，是为主义而死，不是为金钱而死。」（「革命军不可存心升官发财」讲词）又说：「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革命军，如果变成了革命军，便可替革命主义去牺牲，以一当百，百当万，同心协力去定中国。……他们明白了主义之后，他们的精神，自然同七十二烈士一样，他们的力，必定同俄国的兵士一样，出去打仗，便有胜无败，便可征服吴佩孚。」（「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当然这样的军队，是自动地遵守纪律的军队，也是说明三民主义是军纪的根源，军纪的中心。

今日国军在台湾的纪律是比大陆时代进步得多了。因此便得人民的敬爱，并博得国际人士的好评。不过我们还得要有一个最高的目标——养成官兵的主义信仰，使他们个个都有自动遵守纪律的精神。

（注）见蒋百里先生：〈兵学革命与纪律进化〉演讲词。

## 十、战略战术

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正如母子一样，战术依存于战略，又随战略所指示的方针而行动，战术的行动可以影响战略的成败，而正确的战略却常能给予战术致胜的基础。至于战略战术的定义，几乎每一个兵家都有他的界说，萧米尼说：「战略系在地图上作战，对战争全局打算的方术；战术系在战场上直接指挥部队的方术。」克劳塞维慈说：「战术为一战斗间使用战斗力的学术，战略为使用多数战斗以达到战争目的的学术。」毛奇说：「战略系在地图上运用理想，决定方针，统率全军以行作战的方术；战术系在实地的战场，指挥一部份军队，以行作战的方式。」哥尔兹说：「战略系指挥全军之术，战术系指挥部份军队之术。」这都足供我们对于战略战术意义的了解。以下我且来研究 国父的战略战术。

### 一、战略方面

现在我们根据 国父的言行来研究他的战略战术，可以说他在对内的革命战争中所采取的战略是攻势，即「战略攻势」，在对外革命战争上所主张的是守势，即「战略守势」，至于战术则以采取攻击为主，我且先论他的战略。

国父在对内的革命战争中，所采取的战法，像民元以前的进攻满清，是一种奇袭式的攻击，亦可称为游击战。（详见本书「绪言」）民元的兴师北伐，是采取战略攻势，民十一、十三的两次北伐以及历次的讨贼军事，也是采取战略攻势，即以精神力比敌处于优势的革命军（然人数武器比敌处于劣势），作连续的进攻，求敌

而歼灭之。西方兵家说：「虽说数目上的优势，为任何企图胜利者所不容忽视的原则，但数目较少的一方，仍有进攻并击败敌人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之下，优势之所在，或为指挥人力物力较少者之智力，或为将士用命。」（注一）可作为 国父这个战法的脚注。见于遗教上有：

一、民元布告全国同胞书说：「凡我各省军民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效诸葛一生谨慎之行，守吕端大事不糊涂之旨，运筹宜决而密，用兵贵神而速，自能垂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

二、民四发表讨袁宣言说：「一旦义旗起呼，义动天地，当以秦陇一军，出关北指，川楚一军，规划中原。闽粤旌旗横海，合齐鲁以捣京左。三军既兴，我将与诸君子，扼扬子江口，定苏浙以树东南之威。犁庭扫穴，共戮国贼，期可指日待焉。」

三、民六护法之役电襄阳黎联军总司令暨全体将领说：「执事据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势，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若复东取武汉，断敌归路，而西南大兵，奋击于前，更使逆军匹马只轮不返。前此失在姑息，除恶未尽，以致奸人迭出，变乱频仍，今兹务定正本清源之策，为一劳永逸之计。」

四、民十一讨陈电覆陈护黄说：「分路进兵，以期破贼。」

五、民十三关于讨陈及北伐致蒋中正先生的信，其一说：「望兄鼓励各人速出，一由东江击破陈逆而出福建，一出江西，则川湘各军必争先而出武汉，而中原可为我有。否则不论奉直谁胜，西南

必亡。际此之时，能进则存，不进则亡，必然之理也。」其二说：「江西得救，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会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足平也。」于此可见 国父是采取拿破仑「分进合击」的战略原则。此外，他亦采取我国古代兵法所谓「先发制人」的原则，因为欲采取攻势，其动作必须先发制人，争取战争最初的胜利，由最初的胜利，而发展为整个的胜利。他说：「余倡议讨袁，惜南方同志持重，不敢先发制人，致遭失败。」（《孙文学说》第六章）又见陈英士致黄克强的信说：「中山先生在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发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调兵遣将，行动极称自由，我惟有出其不易，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已确鉴，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但战略攻势的采取，并不限于革命者或侵略者，革命者为完成他的革命目的，亦须采取攻势。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闪击欧陆各国是采取攻势，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亦是采取攻势。因此，他们都是先发制人，施以猛烈的闪击。于此我再要引申的，攻势与守势，并不是极端对立的，虽说「较强的一方恒采取攻势，较弱的一方恒采取守势」，但在某种情形之下，攻势可转为守势，守势也可转为攻势。不过在攻击的一方未达目的而转为守势时，却会给予守势的一方以反攻机会。守势的一方，为力求保全自己人力物力，和对方实力在攻击中消耗之后，终获决战的机会，而取得最后胜利。所以我们可以说，攻势固可以取得胜利，守势也可以取得胜利，正如毛奇所说：攻势是「到达目标的直路」，守势则是「兜着很大的圈子」。

其次，关于对外抗战的战略，国父基于当时的情势是主张取守取势的，亦即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因为敌人来侵，施行攻势作战，利在包围歼灭，速战速决，而我因军力比敌劣势，自然要施行守势作战以制之。但国父所谓「守」，决不是绝对的「守」，永远的「守」，是以反攻为最后目标的「守」，克劳塞维慈说：「凡自信是寡弱的，不得不先处守势，但守势的结果，不可归于消极。若守者之力已渐大，则常转变为积极目的，速把守势弃掉，一至抵抗到相当程度，即自然须变为攻势。所以守势作战是循自然之进行，必始于守势而终于攻势。若因最初处于守势环境而限于一般被动的抵抗，始终不行攻势运动，这是不合理的。若不问事态如何，始终墨守守势，决不转为攻势的，那是更不合理。因为守者专靠站在原来的地位来打退敌人而不转为攻势的军事行动，是和以绝对被动的守势思想来行会战一样的不合道理。」国父的主张正和克氏相同，即先取守势，俾取得充分的准备，养其全锋，俟敌疲惫，然后乘机大举反攻。当民初帝俄侵略我外蒙古日急，国父主张对俄抗战，意谓在战略上应先采取守势，即所谓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俟第五年练兵八百万至千万，然后转为攻势，直抵莫斯科、圣彼得堡。（详见「钱币革命通电」）今日我们反共抗俄，在战略上就是采取守势，一俟时机成熟，当转为攻势，反攻大陆，与诸民主国家会师莫斯科。

此外，还应特别举出的，国父在战略上（或用兵方略）有两项较具体（并带有弹性）的指示：其一是：「此后战略宜大变更，集中全力速趋省城为上策，集中全力以扑灭麻子为中策，缩短战线，以保势力，而待援军亦为一策。惟不忍舍去土地，与敌相持，

分薄兵力则为下策。望兄速酌施行！」（覆陈某告战略三种电）其二是：「竞存不日动，各宜先后继起。舰队若遇被令分防，宜立即集中江门，与附近各营同时起事。并令少部队与数小舰进攻三水，握而守之，以断其交通之路。以大队水陆并进，取香山、顺德握而守之，以容奇为舰队根据，以大良为部队大营，以甘竹、勒楼、黄连、紫坭、菜蕉、门中一带之水为防线，水陆军握而守之，为持久计。此防布置妥当，即分兵进取虎门、东莞、石龙一带为右翼，以绝彼东江之交通。然后分东西路水陆夹攻：西路取道官窑、石门，水路以攻石井，东路取道广九铁路，进攻长州、牛山各炮台。得手进攻河南、花地，与西路联络，而包围佛山、陈村敌军，尽缴其械。如此省城可不攻而下矣，此作战方略之大要也。务望与舰队同志谨识而执行之！」（「再致李绮庵指示作战方略电」）于此亦可见 国父确是一个大战略家。

## 二、战术方面

克劳塞维慈说：「战争唯一手段，无论为攻势，为守势，而决定战斗者，厥在战术。所以一切战略计划，皆以战术之成果为目的者，盖以战术之成果，为胜利根本原因也。」福煦元帅说：「战略自体不能存在，须赖战术，始能发挥其价值。」战术之重要，于此可见。在这里，我们首先应知道国父关于战术的论述：

第一、关于战术的发生： 国父认为它是发生于战斗的事实。他说：「现在的军人都是说入学校，研究战术学，学成了之后，为国家去战斗。照这种心理来讲，当然是先有言论，然后才有事实。但是照世界进化情形说，最初人同兽斗，有了几百年，然后那些毒蛇猛兽才消灭。在那个时候，人同兽斗，到底有没有战术呢？当时



或者有战术，不过因为没有文字去记载，便无可稽考，也未可知。后来人同人相争，国同国相争，有了两万多年，又经过了多少战争呢？因为没有历史记载，所以后世也不知道。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有那本兵书。就是现在的战术，也是本于古人战斗的事实，逐渐进步而来。自近来发明了无烟枪之后，我们战术便发生一个极大的变更。从前打仗，是兵士看见了敌人尚且一排一排的齐进。近来打仗，如果见了敌人，便赶快伏在地下放枪，到底是不是因为有了无烟枪，我们才伏在地下呢？是不是先有了事实然后才有书呢？还是先有书然后才有事实呢？外国从前有这种战术，是自南非洲英波之战始。当时英国兵士同波人打仗，也是一排一排的去应战，波人则伏在地下，所以英国兵士，便受很大的损失。伏地战术是由波人起的，波人本是由荷兰搬到非洲的，当时的人数只有三十万，常常和本地的土人打仗。波人最初到非洲，和本地的土人打仗，土人总是伏在地下打波人，故波人从前吃亏不少，便学土人伏地的战术。后来学成了，波人和英国人打仗，英国人也吃亏不少，所以英国人又转学波人的伏地战术，后来英国兵士回本国，转教全国，更由英国传到全世界，所以现在各国的战术理都采用它，由此可见是先有事实，才发生言论。不是先有言论，才发生事实。」（《民权主义》第一讲）

第二、关于战术的革命：拿破仑说过：「没有十年不变的战术」。克劳塞维慈也说过：「没有一成不变的战法」。从历史上看：战术的变化，在专用徒手肉搏的时代，是「点的战术」，到了

用戈予弓矢的时代，便变为「线的战术」，再到用枪炮兵舰陆上海上的时代，又变为「平面战术」，泊乎现代，由于飞机的出现，使空中亦变为战场，更进化为「立体战术」。这不过是就其大概而言。至于战术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所变的只是解释及其应用方法，这又是不可不知。自然 国父对于战术的认识，不是永久不变的论者，且以受到拿翁、克氏理论的影响，所以他说：「专就兵学讲，外国的战术随时发明，随时改良，所谓日新月异。所以拿一百多年以前的外国兵书，今日没有人还拿去用呢？那是没有的。不但是一百年以前的兵书，没有人拿去用，就是十年以前的兵书，到了今日也是无用。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成一个大变动。换句话说讲，就是外国的武器和战术，每过十年，便有一次革命。外国最大的武器，和价值最贵的武器，就是水上所用的战斗舰。现在外国的战斗舰，每艘要值五千万以至一万万元，能够值这些钱的船，才叫做一只兵舰。外国物质的进步，以武器为最快，武器的进步，又以战斗舰为最快，战斗舰的变动，最多不过十年，在欧战以前的战斗舰，至今已成废物。不但是海军的战斗舰有这样的大变动，就是陆军的枪炮也是日日进步，每十年一次变动，每十年一次革命，每十年一次翻新，现在我们所用的枪，在外国已经成了无用的废物，欧战时各国所用的枪炮，到了今日也算是旧式。……不像兵船操典，过了十年，便成无价值的废物。由此便知外国的物质科学，每十年一变，革命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大不相同。」（《民权主义》第五讲）又说：「武器与战术固有关系者，以中国论，昔用之弓箭，而今用枪炮，武器不同，战术亦随之而异。」（「军人精神教育」）可是战术的进化，固是跟着武器，而武器的进化又跟着什么呢？当然是科学。他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之上的，不

是政治哲理，完全是物质文明。因为他们近来的物质文明很发达，所以关于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种种设备，便非常利便，非常迅速。关于海陆军的种种武器弹药，便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有这些新设备和新武器，都是由于科学昌明而来的。那种科学就是十七八世纪以后，倍根、牛顿那些大学问家，所主张用观察和实验研究万事万物的学问。」（《民族主义》第四讲）

国父认为我国在现代战争中，应先讲战术，他说：「自海禁既开之后，与英战，与法战，与日战，与联军战，未有不败者，非无枪炮，不谙战术故也。苟谙战术，则昔日安南之黑旗，法国患之，南非洲杜国之农民，英国患之。」（「军人精神教育」）但他却反对囫囵吞枣，依样画葫芦地抄袭外国的战术，他说：「此次欧战发生，每一日中所用子弹，实不知其几万万也。在激烈战斗时，每日所用，有至十数万万发。然以其效力计之，则非万弹以上，不能中一人也。因彼之战术，乃以子弹遮拦敌人，使不得前进，故多在二千米达以内用之。若在八千米达以外，至几万米达时，则须用重炮，亦如用步枪然，多在以子弹遮拦敌人之前进。此外空中以飞机战，水底以潜艇战，类皆愈出愈奇，尚有露天地洞，与闭天地洞，为炮弹所不能及者，两方兵士相遇，则以徒手搏击，甚至开战时，阒若无人，不知其战斗地点，在于何处者。推其所耗子弹极多，以吨数计，总在几千几百吨以上（每吨合中国一十六担八）。此种战术，中国决不能学，因彼之制造子弹有加无已，且发弹系以机械，不费人力。现有最新式机关枪，一分钟可发一千五百颗子弹者，以一百颗为一盒，计算每一分钟可发十五盒，彼固不求一一命中，务在多发子弹，堵截敌人而已。」（全）惟在革命战争中的战

术应探取攻击或防守呢？今日我根据追随 国父的老同志说：国父的战术是以采取攻击为主的（注二），并且我们根据他如下的电令亦可以看出来：

其一、电令许某：「陈天太部已出四会矣。现战情已变，江门军当全数出三水、芦苞，向高塘、新街方面进攻，以速扫灭击省城之敌（指陈炯明逆军——浴日注）为先，然后再为第二步进取。」

其二、电令胡汉民传令永丰舰长：「现杨总司令令希闵亲率滇军由龙岗出击淡水平山之敌，该舰长搜击海上偷渡之敌，毋使漏网。并相机与杨总司令联络，协同动作。若无线电不通，着盐运使派安北舰传令，并助永丰击敌。」

其三、电令虎门廖司令湘芸：「我追击军大破残敌于石滩之东，现已占据福田石龙之线，残敌向惠州溃退，虎门各部，着速出击，以扫荡石龙南东之残敌为要。」

于此。我们要明白的，战术攻击固配合战略攻势，亦可配合战略守势。但是在现代战争上，倘若被迫而取战略守势，战术亦以防守为主，死守阵地的挨打主义，这样，牺牲固重大，更无从战胜敌人，势必为敌人所迂回包围或中央突破，而招来全军的覆没。古兵法说：「以攻为守，乃自保也。以守为守，乃自毙也。」正是此意。故为击退敌人，歼灭敌人，战胜敌人，必须采取攻击主义，对敌实行前攻、后攻、左攻、右攻、或袭击、扰击、诱击、伏击、截击、侧击、尾击、追击，亦即放弃「以静制动」的战术原则，政取「以动制动」的战术原则，方可获胜。

又，国父在战术上最喜用「奇兵」（有时亦包括战略）他说过：「用兵忌攻坚，尤贵出奇。」（「致石青阳与黄复生从速图陕电」）这是采用我国古代兵家孙子「以正合，以奇胜」的原则。民十二东江之役，电朱培德许某等指示说：「望显丞抽一劲旅抄敌人后路为要。」电刘某指示说：「望兄能调一队至白沙堆，一以绝敌人后路，二可保我航线，闻敌人食粮辎重，皆在风门坳附近，若兄能照此行事可悉夺之，则博围可解，我军实亦加利莫大也。幸速图之！」但用奇兵以「神速」和「秘密」为要件，能如是，才可以出敌意表，博得辉煌的战果。

此外 国父在战术上（亦即以攻击为主）尚有两大贡献如下：

一、游勇战术：此种战术，即现今所谓游击战术，国父于进行推翻满清时，即用此种战术。国父对于安南之黑旗用以抗法及南非洲杜国之农民用以抗英的游勇战术，素有研究，当民国十一年兴师北伐，驻节桂林，曾召集各军将校讲演「军人精神教育」，谓「此种战术颇适用于中国，若以北方交战，尤为相宜。」根着举出此种战术的五种技能：一曰命中，二曰隐伏，三曰耐劳，四曰走路、五曰吃麤，并作如下的说明：

1. 何谓能命中？军队之有无战斗力，以能杀敌与否为断，故命中为第一要件，但以命中论，即外国军队，亦未必擅长。……若游勇战术，则与之相反，彼视子弹如生命，非必中者，不轻施放，而有五十颗子弹，便已十分满足。以现在军队论，每一兵士，至少有二百颗以上子弹，何以一言北伐，犹以为少，岂命中之技，尚不及游勇耶？诸君须知子弹之接济与补充，有在后方者，有在前方者，游勇之重视子弹，因其子弹，只有此数。非遇敌人，则无补充

之机会，故不在后方接济，而在取诸前方，此不独游勇为然，即如粤军自援闽以至回粤，其子弹皆取自敌人多，而不专恃后方接济，其明征也。若在无枪炮而用弓箭之时代，射箭比放枪更难，而古时有百步穿杨者，即在能命中，否则临阵之际，最多随带三四十枝箭矢，若无命中能力，即不啻无的放矢，祇须数分钟间，矢尽而已亦就擒，又焉能战？枪炮亦然，不能命中者，则子弹之消耗多，而杀敌之效力微，前者北京天坛之战，段祺瑞军队耗去三百万子弹，而张勋之兵死伤，合计不过一百七十余人，此则由于不能命中之故。由是观之，子弹之有效，在能命中，不能命中者，子弹虽多，皆为废物。近时兵士，往往轻于放枪，不问命中与否，放枪时，甚有高抬两手，或紧闭眼睛者，此何异于无的而放矢！须知子弹最为宝贵，中国既无若干大兵工厂，不宜学欧洲战术，以子弹为遮障，宜学游勇战术，视子弹如生命。但平时须练习射击，务求命中，不使虚发，此为军人之勇，有恃无恐之第一要件也。

2. 何谓能隐伏？即避弹方法，但此种避弹，非如义和团之用符咒，乃系利用地形，为人身之屏蔽。余在安南时，常以此询诸一般游勇，彼云：「人立地上，靶子颇大，敌人一望即知，故须藉地形以为埋伏之所，或藏在石头后，仅露其首，以便靶子缩小，敌人无标的可寻，我尚可从容窥探其举动。即在子弹如雨之际，尤宜深自闭藏，勿庸惊窜，因此时前后左右，必无敌人踪迹也。」游勇之所述者如此，彼盖得诸经验，而与操典中所谓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却相暗合。故隐伏亦为技能之一。

3. 何谓能耐劳？此与隐伏相关联者，我亦问诸游勇，彼谓：「隐伏秘诀，祇是『不动』二字，至少须耐十二小时之劳，直至夜

深，始可潜行。因子弹之速力，异常快捷，人虽有追风之绝足，必不能过于子弹，走避易为所中，不如耐心隐伏，较为安全也。」此外尚有实例可讲，前此黄克强在钦廉起事时，有一次仅剩四人，逃在山上，敌之围攻者，约六百余人，然彼实不知仅有四人也。来攻时，皆用二一十人为前锋，而此四人者，如何抵御？据其事后所述：敌人未来时则隐伏不动，俟彼来袭，在五十步左右，始行开枪。每开一排，必死敌二三人，连开三四排，敌人之死者十余人，卒以脱险。此一役也，即全在命中、隐伏与耐劳之技能，否则以四人敌六百人，宁有幸事耶！

4. 何谓能走路？现时中国尚未有完全铁道，行军之际，专恃走路。练习之法力，须日行二十里，十日以后，每日递加五里，如此则不觉劳顿，而脚力自健。彼游勇战术，亦即以善走称。尚有实例可征，北军一到南方，每以山岭崎岖为苦，南军则如履平地，快捷异常，是为我之所长，敌之所短。故曰走路一端，亦为技能之必要，不可不注重也。

5. 何谓能吃麩？游勇所恃之粮食，即此炒米一种，每人携十觔，可支六七日，不至苦饥，遇有作战时，且无须费造饭时间，此亦为游勇之特长，胜于正式军队者。去年湖南援鄂之役，其始占据地方不少，卒因后路补充缺乏，乃至于败。粮食亦为补充之一，倘能如游勇之吃麩，则于行军极为简便，既免飞莠挽粟之苦，而给养亦不患烦难也。

以上五种技能，是 国父在距今刚刚三十年前所说的。较之今日游击战上所用的技能，虽很简略，仍可作为今日活跃于大陆上游击队之用。今日我们应加紧发展大陆上有枪或无枪的游击队。

二、非常战术：这种战术，亦称革命战术，系主张「用我军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用我军的一万人，可以去打破敌军十万人。」甚至「用一个人打百个人，用一百个人打一万人。」本来寻常战术，都是主张以优势的军队对劣势的军队，或以相等的军队而战，至低限度亦不过以二对三的军队相战，像天才兵学家克劳塞维慈在他《战争论》上，也是强调「兵数的优势为战略上第一原则」，战略如此，战术亦如此。其论拿破仑的作战说：「拿破仑常以大会战制胜，他是近代绝无仅有的名将，除一二会战未能以多兵制敌，不得不用超绝智力而取胜之外，他都以集中较敌优势的兵力或稍稍劣势兵力为常法。」可见国父的战术思想，比普通兵家的战略战术思想为进步，他日我们反攻大陆必须发扬 国父这一种战略战术思想。今日所谓「以寡击众」亦应作如是观。 国父说：「甚么是叫做革命军呢？革命军和寻常军有甚么不同呢？不同地方，小而言之，革命军的一个人，常常能够打一百个人，至少也能够打十个人。大而言之，用我军的一千人，可以打破敌人一万人，可以打破敌人十万人。像这样以少数常常能够打破多数训练很纯熟，武器很精良的军人，才叫做革命军。……现在广东有十多万兵，都不能说是革命军。因为他们都是一个人去打一个人的。如果我军一万人遇到敌人一万人，才敢去对阵，若是遇到了两万敌人，便不敢前进。像这样的军队，有甚么用呢？怎么可以说是革命军呢？至于本大元帅今天所谓的革命军，是一千人能够敌一万人，像有这样大力量的军队，在诸位军事家看起来，或者以为不可能的事。大概照寻常的军事经验讲，我军无论练得如何精良，总要用几倍人去打敌人，才可以操胜算。譬如用三万人去打一万人，才可以说是把握。如果敌人有三万人，我军祇有二万人，便不能说是把握，至



于敌人有一万人，我军也祇有一万人，更不能说是有把握。像这样的军队，是寻常军，不是非常的革命军。世界上有非常的时机，能够做非常的事业，便要有非常的革命军，才可以成功。诸位将士不信，祇考察十三年以前的革命历史，革命党和清兵奋斗，没有那一次不是以一敌百，用一个革命军打一百个清兵，是很平常的事，如果不然，便不能算是好革命党。诸位将士是湘军，是从湖南来的，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克强。有一次，自安南入钦廉起义，当时到钦廉来抵抗革命党的清兵，有两万多人，黄克强带的「革命军」不过两百人，所有的武器不过两百枝枪，用那样少的人，和那样多的清兵，打两个多月仗，到后来弹尽而援不至，还可安全退出。照这一次战争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人，像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像这件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所以本大元帅要大家以后能够打胜仗，做非常的事，便要变成非常的革命军。像黄克强那次在钦廉打仗一样，如果不然，就是枪好弹多，还是送把敌人，自己没有用处。」

（「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讲词）再说：「现在的军队不是革命军，祇有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在广州起义的军队，才可以说是革命军，当他们起义的时候，在广州的清军，有满洲的驻防军，有李准的水师，张鸣岐的陆师，总计算起来，不下五六万人，革命军的人数不过二三百人，那里有今日这样多的军队呢？当时的武器不过是手枪炸弹，那里有今日这样好的长枪大炮呢？那样少的人数，只用手枪炮弹，一经发动，便攻进水师各行台和总督衙门，后来因为约定的外援，没有赶到，便完全失败，死了七十二人，葬在黄花岗。所以黄花岗所葬的七十二人，就是那天打死了的革命军，就是舍身成仁的烈士，所以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才不愧称为革命军。假如

当时我们的革命军有三千人，或者敌人祇有三千人，那一次革命，便可以成功。但是当时广州的清兵不只三千人，有了五六万人，我们的革命军方又没有三千人，只有三百人，众寡太相悬殊，所以结果归于失败。至于以战论战，当时城内之战，可算是成功。」

（「革命军不可想升官发财」讲词）再又说：「普通的战术，用一个人去打一个人，便以为了不得，古时的兵法，都是说：「十则围之，倍则攻之。」近时的兵法用一个人打一个人非守即退，像这样的兵法，古今才叫做正常的战术。……辛亥革命，在广州起义之后，又有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结果是成功。推到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当时在武昌汉口的革命党，总共还不足三百人，真正革命党不过是几十人，所有的枪，都没有子弹，临时到处搜索，只得到两盒子弹，一共不过五十颗，革命党分到了五十颗子弹，便在城内的工程营发难，城外炮营，立时响应，便拉两门炮进城，遥攻总督衙门，赶走瑞澄，占领武昌。至于当时驻在武昌的清兵，有第八镇的新兵，有长江的海军，又有巡防营的旧陆师，总共不下两万多人。革命军祇用几十个人，去打两万多人，可以说是用一个人打五百个人。广州起义，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结果是失败。武昌起义，用一个人打五百人，结果是成功。都是以极少数的人，打极多数的人。广州是失败，在武昌便成功，所以革命的奋斗，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奋斗，是古今中外各国兵法中所没有的。祇有革命历史中才有这种创例。……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事业，不

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海陆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加入革命党，但是有许多留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智识军人，是甚么心理呢？仔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用一百个人打一万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这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革命，推翻满清，是谁造成呢？成功的时候，固然是有许多军事家的赞助。但是穷脉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出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推到当时一般有智识的军人，以为用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种道理，便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因为那些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是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很少。辛亥革命之所以大功告成，是由于全国已经发生了革命之后，段祺瑞便结合一般军人，联名通电赞成共和，才能够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革命党因为降格相从，容纳他们的意见，收罗这一般军人以后才收军事上的顺利。所以辛亥革命之成功，实在没有真正军事学识的。」（「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于此可见 国父在用兵上是重质不重量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军队个个都有「为革命主义去牺牲」的攻击精神（武器为次要条件），像这样的革命军，「以一当十」，自可杀敌致果。这是有战例证，并非夸大之谈，观于上述，便可了然。何况革命军对敌作战，胜固战，败亦战，从屡败屡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倘若当我一千人与一万的敌人相遇，或一千人与一千的敌人相遇，便心寒胆散，甚至弃械逃遁，像这样的军队，根本不配作战，更谈不上参加革命的战争。所以我们今后在练兵上，尤其为反攻大陆，更应训

练每一个士兵都有为主义而奋斗牺牲的「以一当十」的攻击精神，那么就比较容易取胜了。又从我们古代兵学上来看，像《孙子兵法》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或「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或「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这些原则，当然可以达成「非常战术」。再从现代战争来看，虽说战略以寡击众，战术仍要以众击寡。但在战斗上以寡击众而获胜的亦不少，要在如何运用而已。更可见「非常战术」的正确。

德国哥尔兹将军说：「关于战略战术，从事著作者，无论何人，非其所述原则中考虑本国特别事情，提供吾人以国民的战略战术，则不能谓之真有所贡献于国家。」真的，中国今后的战略战术是不能再徒事抄袭了，必须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国父的战略战术是最适用于中国革命战争，我们今后应加以发扬光大。

（注一）见英国福尔区著《现代战争论》。

（注二）据李仙根、赵超先生等口述。

## 十一、战史述评

首先我要说的，是 国父对战争时代的划分。关于历史上战争时代的划分：有人分为：（一）点的战争时代，（二）线的战争时代，（三）平面战争时代，（四）立体战争时代。至于近代的战争，也有人分为煤力时期、油力时期、电力时期、原子时期。这都是就战争上所用的工具或助力来制分的。 国父则从人类历史进化上把战争划分为如下的四个时期：

- 第一个时期——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
- 第二个时期——人同天争，是用神权。
- 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
- 第四个时期——是国内相争，人民同君主相争。在这个时代表之中，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

以上的划分，见于《民权主义》第一讲，就中「人同兽争」及「人同天争」的两个时期，仅是战争的起源，唯有第三个第四个时期的战争，才算是真正的战争。而且 国父在这第四个时期，有一个理想，认为基于民权革命的成功，即民主政治的实现，足以避免将来国内的战争，像今日世界民主国家，军队是对外的，所有政治问题均由议会上来解决，那自然没有内战的发生。英国如是，法国如是，美国如是（自建国以来，仅发生过一次所谓「南北战争」。）同讲说：「就中国历史讲，每换一个朝代，都有战争，比

方秦始皇专制，人民反对他，后来陈胜、吴广起义，各地都响应，那本是民权的风潮。到了刘邦、项羽出来，便发生楚汉相争。刘邦项羽是争什么呢？他们就是争皇帝，唐汉以来，没有一个不是争皇帝的。中国历史常是一治一乱，当乱的时候，总是争皇帝。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中国几千年来所战争的都是皇帝一个问题。我们革命党为避免将来战争起见，所以当初发起的时候，便主张共和，不要皇帝。现在共和成立了，但是还有想做皇帝的，像南方的陈炯明是想做皇帝的，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广西的陆荣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此外还不知多少人都是要想做皇帝的。中国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兵权大的就争皇帝，兵权小的就争王争侯，现在一般军人已不敢大者王，小者侯，这也是历史上竞争的一个进步了。」固然依于民权主义的实现，可以避免由政治上发生的内战。而依于民族主义的实现，亦可以避免种族间的战争。而依于民主主义的实现，亦可以避免由经济上而发生的阶级战争。从这点上，更可见 国父三民主义的伟大。

战史是兵学的泉源，也是将校的教师，历代兵家名将对战史皆有深刻的研究。孙武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可以说是黄帝击败蚩尤，与唐、虞、夏、商、周五代及春秋用兵的结论。克劳塞维慈所著的《战争论》，是研究腓特烈大王及拿破仑战史的结晶。他如吴起、韩信、关羽、岳飞、戚继光、汉尼拔、毛奇、兴登堡等的战胜攻取，亦莫不由于研究战史为其基础。又如拿破仑说：「欲成为伟大的将帅，唯一的手段，应把握着兵术的秘诀——研究战史。」华甸堡伯爵说：「历史的智识决不是搜集一切实例，以供我们必要时发见其足以模仿的适例，便算完了，乃是凭实习所获得的精神训

练，使我们于不知不觉中容易认识正确的目的，且可改进我们以前那低劣的无意识的天赋本能，使成为有意识的力量。」普克尔将军说：「军队若缺乏战争的经验，则可以战史为教育的基础，更属必要。……战史虽不能代替实际的经验，然足为实战的准备，在平时研究战史，乃学习战争与决定兵术原则的真正手段。」战史的重要可见。

## 一、关于本国战史

国父为领导中国革命，当然对战史要有深刻的研究。因此，在遗教中，可以找到他许多关于中外战史的言论。国父对中国历代兴亡史、战争史，尤以太平天国战史为最烂熟，这大概是基于推翻满清的需要，正同洪秀全的革命一样。关于这点，我前接到一位老同志由渝给我的信说：「总理生平最烂熟者为太平军战史，对于进兵攻城得地之战法及地理，往往如数家珍。其材料除得自私人纪录，及官书外，外人所著关于太平朝事迹，几应有尽有。尝言革命用兵与国家用兵之战略不同，太平战法大可采用，并批判其胜败之由。」（注）国父为汉公著《太平天国战史》一书撰序说：「虽以罗曾刘郭号称学者，终不知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岂天未厌胡运欤？其当时战略失宜，有以致之欤？」这是对太平天国之亡的一种感慨。在《民权主义》第一讲里更深入地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说：「从前太平天国便是前车之鉴，洪秀全当初在广西起事，打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建都南京，满清天下大半归他所有。但是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讲起原因有好几种：有人说他最大的原因，是懂外交，因为当时英国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想和洪秀全立约，承认太平天国，不承

认大清皇帝。但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后，只能见东王杨秀清，不见天王洪秀全，因为要见洪秀全便要叩头，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见，便到北京和满清政府立约。后来派戈登带兵去打苏州，洪秀全因此失败。所以有人说他们的失败，是由于不懂外交。这或者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未可知。又有人说洪秀全所以失败，是由于他得下南京之后，不乘势长趋直进去打北京，所以洪秀全不北伐，也是失败原因之一。但是依我的观察，洪秀全所以失败，这两个原因都是很小的。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杨秀清当初带到南京的基本军队，有六七万精兵，因为发生争皇帝的内乱，韦昌辉便杀了杨秀清，消灭他的军队。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后来大家把韦昌辉消灭。当时石达开听见南京发生了内乱，便从江西赶去南京，想去排解，后来见无可为，并且自己也被人怀疑，都说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军队带到四川，不久也被清兵消灭。因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做皇帝，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杨秀清那四部份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国势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于杨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错。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后来到了南京，经杨秀清、韦昌辉内乱之后，便想不再封王了。后因李秀成、陈玉成屡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势，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们或靠不佳，于是同时又封了三四个王，使他们彼此号相位等，可以互相牵制。但是从此以后，李秀成、陈玉成对于各王便不能调动，故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那种失败，完全是出于大家想做皇帝。」



这是从政治上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就是说政治的失败足以致军事的失败。

其次，关于中国近代对外的战争，例如论中法战争说：「镇南关一战，中国还获胜仗，后来因被法国恐吓，中国才和法国讲和，情愿把安南让与法国，但是刚在讲和前几天，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法国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中国还是求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尝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战例，凡是战胜之国，一定要表示战胜的尊荣，一定要战败的割地赔偿，你们中国战胜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真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先例。」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是由于满清政府太糊涂。」（《民族主义》第二讲）又论庚子之役说：「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此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甚至于像欧美的洋枪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利害，所以发生义和团来反抗欧美。义和团的勇气，始初是锐不可当的，在杨村一战，是由于英国提督西摩带了三千联军，想从天津到北京，去救那些公使馆，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在义和团一方面，可说是肉体相搏。西摩因为被他们包围了，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人，血

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到西摩带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直进北京。便要退回天津等候，另外请了大兵来帮助，才能够到达北京，解各国公使馆的围。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民权主义》第五讲）从这一述评，可见武器在战争上的重要性，亦可见「勇锐之气，殊不可当。」

## 二、关于外国战史

国父对外国战史亦很有研究，尤爱研究各国革命战史，如英法的民权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及俄国的革命战争（散见《三民主义》及各讲词中，姑略）。他为周应时《战学入门》一书撰序说：「世之善战者，有得于天才，有得于学问，如铁木真之起于游牧，而能扫荡欧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天才独胜者也。如莫鲁克（即毛奇——浴曰注）之运筹帷幄，决胜先机，一战而胜丹，再战而摧奥，三战而败法，此学问特长者也。至于拿破仑乘法法国革命之运，统饥寒之残卒，与奥战于意大利之野，以少击众，连战皆捷，转危为安，及后几奄全欧，其用兵之妙，古今无匹，此才学兼长者也。」足见他对铁、毛、拿等战史亦研究过一番。至于论第一次欧洲大战，散见于遗教中较为详尽，他说：「前几年的欧洲大战，这次战争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战争。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战争呢？因为这次战事扩充影响到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被

卷入漩涡之中。这次大战争所以构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逊民族和条顿民族互争海上的霸权，因为德国近来强盛，海军逐渐扩张，成世界上第二海权的强国，英国要自己的海军独霸全球，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权的强国。英德两国都想在海上争霸，所以便起战争。二是各国争领土，东欧有一个弱国叫做土耳其即突厥。土耳其百年以来世人都说他是近东病夫，因为内政不修明，皇帝很专制，变成了衰弱的国家。欧洲各国都要把他瓜分，百余年以来不能解决，欧洲各国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发生战争。故战争的原因，第一是白种人互争雄长，第二是解决世界的问题。如果战后是德国获胜，世界上的海权，便要归德国占领，英国的大领土便要完全丧失，必成罗马一样，弄至四分五裂而亡。」（《民族主义》第四讲）这是就欧战发生的原因而论。关于此，又说：「像这次欧洲大战，便有人说『打太阳』的地位，因为欧洲列强多半近于寒带，所以起战争的缘故，都是由于互争赤道和温带的土地，可以说是要争太阳之光。」（第一讲）次述欧战的军事动态：其一、关于构筑阵地方面说：「吾今欲请学者一观近日欧洲之战场，当德军第一次攻巴黎之失败也，立即反攻为守，为需要所迫，数月之间，筑就长壕，由北海之滨，至于瑞士山麓，长一千五百里，有第一第二第三线各重之防御，每重之工程，有阴沟，有地窖，有通道，有栈房。工程之巩固繁复，每线每里比较，当过于万里长城之工程也。三线合计，长约不下五千余里，而英法联军方面，所筑长壕亦如之。……而欧洲东方之战线，由波罗的海，横亘欧洲大是，而至于黑海，长约三倍于西方战场，彼此各筑长壕以抵御，亦若西方，其工程时间皆相等。」（《孙文学说》第四讲）其二、关于使用兵器方面说：「当欧战的时候，法兰西本国以北的许多地方，都被德国军队侵入，人民的产

业化为乌有，房屋也打破了，在那个地方两军相持三四年，不但是房屋没有，就是一草一木都找不出来，成了不毛之地。这是甚么原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打仗，是用子弹分胜负，每打一次仗，一日要用几十万几百万子弹，欧美现在打仗，不用子弹分胜负，要用炮弹分胜负，每日所用的炮弹，总是以几千万计。我们现在的战争，在他们看起来，是拿破仑的战争，是几百年以前的战争。他们现在的战争是甚么情形呢？在战线以内的人，不在地上走，要在地底下走，在战线之内挖了许多隧道，去接济前方的补充。他们现在用炮，好似我们用枪一样，我们打了胜枪，是说缴枪，他们便不说缴枪，要说缴炮，每次最多的时候，要缴五六万炮，要缴几十万机关枪。」（「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讲词）此外关于最后裁兵复员说：「这次欧美联军一共有几千万的兵，不到一二年之后，大半以裁去的道理，便是用这个安插的方法。本大总统这次回粤化兵为工，便是利用欧战各国裁兵的方法。」（「和平统一化兵为工」讲词）至于分析日本武力派的发动战争尤为一针见血。他说：「当彼日本之武力派，尚以战争叫为民族进取之利器，彼参谋本部是计划十年作一战争，一八九四年以一最短期之中日战争，获最丰之报酬，于是因之而长其欲。日俄之役，获大胜利，所得利益亦非较小。最后以一九一四年之大战争，复加入联军以拒德国，而日本以出力最微，费财至少，竟获一领土，大如未战前之罗马尼亚，人口众如法国之山东。由此观之，在近三十年间，日本于每一战争之结局，即获最厚之报酬，无怪乎日本军阀，以战争为最利益之事业也。」（「实业计划结论」）

以上所述的都是关于过去的战争，至于未来的战争呢？国父于此亦有一个观察，我想附带一说。

虽说「未来是不可知的，」「人类的眼光不能透视将来」，但是人类总是用尽观察力与想象力打破这个闷葫芦，来寻找答案。先知先觉者对于将来之变化虽未能作详尽的豫言，但检讨过去，把握现在，总可以推知将来的趋势，政治如此，军事亦如此。

国父对于世界未来战争趋势的观察，不同于一般战争小说家的描写，也不同于一般星相家的预言，他依于世界进化的情势，认为将来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亦即以思想主义为中心的战争。这是兵学上一个共通的原理，可用以说明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用来说明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国父说：「就欧洲战争的历史说，从前发生国际战争，最后的欧战，是德、奥、土希诸同盟国，和英、法、俄、意、美诸协商国，两方战争，经过四年的大战，始筋疲力尽，双方停止。……以后的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那些强暴的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拚命一战。推到全世界，将来白种人，主张公理的，黄种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种人主张强权的，和黄种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大战之趋势。」（《民族主义》第一讲）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国家战胜极权国家，亦可以说是公理战胜强权。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却又出现了一个专讲强权国家——赤色帝国主义苏俄，即苏俄在大独裁者

斯大林的统治之下，完全改变了革命成功初期「抑强扶弱，压富济贫是专为世界上伸张公道打不平的」（全）作风。不特凌弱且侵强，不特压富且欺贫，专在世界上伸张霸道，制造不平，欲以蚕食的方式征服全世界。所以现在全世界各民族国家不分白种人或黄种人或其它种人，凡受其侵略者莫不同病相怜，联合起来作坚决的抵抗。像苏俄这样不断地侵略各国，势务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一场大战中，由于我们主张公理的民主国家——思想正，力量大，必可战胜那主张极权的俄帝集团，如果再没有强权者的继起，则世界从此可臻于永久和平康乐之境。

（注）冯自由先生于三十年七月由渝给我的信。

## 十二、结语—知难行易的军事上证明

国父的革命战理，真是博大精深，我的研究，暂止于此。惟对「知难行易」的学说，我想在这里试从军事上给它一个证明。这个学说是有其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凡知皆难，凡行皆易」的一贯学说。国父为建立他这个学说，便著《孙文学说》一书。不惮其烦，连篇累牍，列举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大例证，使人人容易了解「行之非难，知之维艰」的道理。并打破过去「知之非难，行之维艰」的谬说。又从人群的进化上作进一步的证明，就时的方面分为：「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由科学发明之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此三时期，以第三个时期为历史发展最难的时期，足证知为难，行为易。就人的方面分为：「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此三系人，在古今社会上都以第一系人为数最少，亦为知难行易学说之左证。还有，国父所谓「知」，决不是泛泛的知，空谈的知，乃「真知」，即科学的知。正如国父说：「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又说：「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决无所难。」其意在勉人力行。

依上所述「知难行易」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在军事上找到证明：发明射击原理较实行射击难。策定作战计划较执行作战计划难。设计架桥难于执行架桥。设计要塞难于构筑要塞。定典范令难，行典范令易。（你看典范令不知是积多少次战役的经验教训及

多少专家的心血而成）推而至于发明飞机、大炮、坦克、雷达、飞弹及原子弹等亦比制造和使用为难之又难。至于军事的进化亦可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及「知而后行」的三个时期，即由古代的「不知而行」时期，进化到中古的「行而后知」时期，再进化到近代科学发明之后的「知而后行」时期。就军人说，亦可把最高统帅普通军官及士兵各阶级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及不知不觉者，由于此三系军人相需为用，协同一致，当可完成战胜攻取的任务。凡此均可证明军事上的一切，亦为「知难行易」。在这里我们更应明白的，像《孙子兵法》十三篇与克劳塞维慈的《战争论》，实为千古不朽的两大兵典，历代名将的功业虽有驾乎两氏之上者，理论上而能驾乎两氏者实无一人，亦足证「知」的难能可贵，孙、克两氏为先知先觉的兵学大师。又从孙、克两氏的理论来看，如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克氏说：「苟欲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亦必须具有优秀的智力，其阶级愈高，则所需要的智力亦愈大。」亦可证明「知」的重要性。其次像孙臆的减灶计、田单的火牛计、韩信的背水阵、孔明的空城计、李愬雪夜入蔡州、拿破仑的越阿尔卑斯山、汉尼拔导演的康纳歼灭战、兴登堡指挥的坦能堡歼灭战，这都是证明他们是先知先觉的名将，为历代军人所罕见者。又，当先知先觉的统帅所策定的战略战术来杀敌取胜，部属因限于后知后觉或不知不觉，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直至战胜之后，仍有不知其所以致胜之道，正如孙子说：「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所以一个军队在先知先觉的统帅指挥之下，全体部属只有恪守纪律，奉行命令，绝对不容有所怀疑犹豫于其间。



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真是千古不刊的定理，此学说推演出的结论：一是「能知必能行」，一是「不知亦能行」，一是「有志竟成」，都是我们革命军人应当把握着的。先说「能知必能行」：前面已说过 国父所谓「知」，是真知，即科学的知。国父又说：「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对于一件事，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仔细去研究，研究屡次不错，始认定为知识。」（「国民要以人格救国」讲词）所以我们军人的智识学问，不是徒在书本上死读死记，及在课堂专心听讲，所可切于实用，须从实地观察，实地演习，或在实战中去理解它，去把握它，然后才不会重蹈赵括徒读父书的覆辙。克劳塞维慈说：「一切智识虽然大半得自推究事物的性能，而一切事物的效用必待经验而后知，尤其是军事智识的基础在经验，所以兵学是经验的科学。例如火药的效用，如离开经验只凭想象与测算，实难得知其真相。所以自古以来，一切物质兵器的效果，必须反复试验。子弹藉火药之力一秒钟飞行千尺，固可用测算而知，然其受空气与重力的阻碍命中目标实际的效果，必由经验而后知，物质的效果如此，精神的效果也是一样。」又说：「所谓危险，所谓劳力，所谓情报，所谓障碍，都是战争特质的元素，从它们妨害战争动作的作用上而观，可总称为障碍，要如何方能克服这种种障碍，一言以蔽之曰：『习惯』，惟有惯战能使身体忍耐大劳苦，惟有惯战能使精神抵当大危险，惟有惯战能使判断不为眼前印像炫惑。例如吾人初入暗室，瞳孔放大，吸收所有的发光体，渐渐能辨别诸物和明处一样，惯战的情形大概是如此的。战争的习惯，也可以由平时适当的演习，得着类似实战的经验，这要在演习中使各种障碍的一部份出现于实际，使指挥官磨练其判断力与用意的周到，可以得很大的利益。」这样所得的军事智识学问，才是真

知，科学的知，自然可以达到「知之必能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的境地。所以我们革命军人今后的求知，决不可读死书，应从演习上去求知，绝不可怕战，应从战场上去求知。这样的知，才是百战百胜的「知」，才是建功立业的「知」。

虽然「能知必能行」，但「不知亦能行」（包含知不完全的意思）。比如对敌人情况不明的时候，如下最大决心，实行冒险攻击，亦可以压制敌人，并可以从攻击等行动中去获得更真切的情报，以为我进一步行动的根据。假设我们因对敌情不大明了，必待取得更完备的情报然后动作，固会错过「战胜之本」的宝贵时间，反会给予敌人以获得关于我更真切的情报的机会，又会丧失敏捷攻击及初步获胜的利益。至于「有志竟成」，这是教我们要完成任务，建功立业，必须立下坚定不移的意志，发挥整个精神力量来实践力行。否则敷衍塞责，畏难怕死，决无成功之理。所以 国父说：「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通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依此而论，我们此次反共抗俄，就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大事，又为先知先觉的最高领袖领导大家一致奋斗到底，必可取得最后胜利，将如 国父发动推翻满清，中经十次失败，终底于成。

最后， 国父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以超卓的天才，远大的眼光，高深的学问，丰富的经验，精勤的努力，在立德立功上是不朽的，在立言上也是不朽。他的战争理论，继承中国固有兵法的精神，吸收世界各国兵学的精华，加以自己的实践独创而成。他

本着他的战理战法，推翻了满清，又完成了每次讨贼军事的胜利，所以他的战理战法，是必胜的，又是救国救世的。这是五千年来的中国兵学上的一大飞跃，也是说明反共抗俄战争依此而行必可得到最后的胜利。

我们要研究和发扬 国父的革命战理！

我们要运用和实践 国父的革命战理！

## 附 1

### 自 序

李浴日

《中山战争论》1942 年

我们不要害怕战争，我们应迎接为民族国家求生存、谋解放的革命战争！

我们不要讳谈战争，我们应在纷歧错杂的战争思想界里，把我们革命的战争理论体系建立起来！

中国的开国史，是黄帝驱逐蚩尤的历史，亦即中国战争史的第一页，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大半是战争史，我们的祖先大多数过着战时生活。蒋百里先生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真是指出我们民族国家盛衰兴亡的所在。

从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看，从五年来的抗战过程看，现在我们是急需建立一种战争理论了。但这个重大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复古不行，标新不是，为兵学而兵学不可，为侵略而兵学更不可，却不知它早为我们的革命导师——国父孙中山先生给我们根本地解决了，他的战争理论，是实践的，从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出来，是革命的，为革命而建立战争理论。

中国今后的一举一动是要有真理的指导了，否则，陷于盲从和盲动，固无成功可言，且会招来不良的结果。何况战争为人类生死在线的活动，为民族国家挣扎于盛衰存亡之道的最高表现，自然史要有真理的指导，国父的战争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战

争的真理，所以阐扬它来建立中国今后的战争理论体系，实为必然的归趋，又为我们当前的急务。

在黄冈山上，放眼远眺，便是蜿蜒的山岳，矗立于天际。冬天的夜里，山上野火四作，火为风煽，正如火龙的飞舞。我的四周是一片青翠的松林，风从天上来，松声作古乐般的弹奏，在这个环境里，使我常作深思，使我想起应继我的《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商务版）之后来写一部《中山战争论》，但这个整理和阐扬的工作，却比《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为难，何况又属于创举，但我相信精神力是可以征服一切困难的，于是拼挡俗，着手编纂，经过去年一个夏季的奋斗，终把初稿写成，秋凉携稿长征，由韶赴渝，再事博访周谘，以为补充，春初南飞，在黄冈山上，又下数月工夫，方告脱稿，但因参考材料的缺少，及时间的限制，致未克尽量发挥，细为推敲，为抛砖引玉计，便匆匆地付梓了。在这里，我应感谢给我匡助的友好，并诚恳地就正于海内外的高明！

国父的战争理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此以前为「孙武兵学」时代，从今以后，当为「孙文兵学」时代，从「孙武」到「孙文」，顾名思义，真是中国兵学上一个趣味的奇迹。今日我们读他兵学理论，在字里行间感觉到蕴蓄着一种无限的生气和浩气，这是「民族复与」之气，中华民族的人们今后应浸淫熏陶于是气之中。我们再看他历次指挥作战的精神，其大仁大勇大智，实可作为我国军人的传统精神。像英国海军以纳尔逊的精神为传统精神，法国陆军以拿破仑的精神为传统精神，德国以腓特

列为传统精神，这样才能把我同的革命军、国防军的基础像钢铁般的建立起来。

中华民族今后是要在「铁的时代」里奋斗而争取他的生存、解放和发展了，数千年来「重文轻武」之风和「文武分离」之习是其彻底地给它涤除了，今后应为笔与剑的合作，但剑应列于第一位。唯有剑才可以制服一切恶魔，唯有实行 国父的战理战法才可以使剑获得光辉的胜利！

**李 浴 日**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序于国父两次誓师北伐的圣地韶关